

目 录

一钱诛吏	1
皇帝御赐“铁御史”	4
执正不回 系时安危	9
方琼打侄	13
清白传家状元郎	17
守正执法 刚直不阿	21
御史拒贿宰贪官	26
刚正不阿 秉公除霸	33
百折不回尚正义	35
“三部”尚书南昌拒贿	39
清正爱民 守洁终身	42
明代清官李太清	47
打击权势 扶贫济困	51
不畏人知畏己知	56
坚贞不屈 毁家抗日	59
一个在河南廉政勤政播种文明的咸安人	61
民国第一清官石瑛	65
董必武的家书	71
清苦治学的红色教授	74
十块银元	79
不沾一粒红军粮	83

开明士绅廉勤县长	87
赤子红心叶重开	91
清正做人 廉洁齐家	95
钱瑛回乡	100
“平凡”人的“不平凡”	106
铁面万一	111
陈寿昌廉洁闹革命	115
无私无畏叶发全	118
廉洁奉公的教育家	122
淡泊一生的老红军戴荣生	125
少年英雄红“法官”	129
用生命诠释忠诚信仰	132
一心为民的开国将军	137
张体学省长在咸宁廉政勤政轶事	140
扎根大幕山的“林农厅官”	147
倾尽一生报党恩	152
严于律己的金融战士	159
甘于奉献传佳话	163
红心胜白银	168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171



张咏（946—1015）字复之，号乖崖，谥号忠定，濮州鄄城（今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人。北宋大臣。太平兴国年间进士，累擢枢密直学士，真宗时官至礼部尚书，诗文俱佳，是北宋太宗、真宗两朝的名臣，尤以治蜀著称。其文集被命名为《张乖崖集》。

一钱诛吏

太平兴国五年，张咏考中进士，初授崇阳知县。张咏带着书童徒步前往崇阳上任，暗暗立志要做一个为民请命的清官。

张咏来到县衙，吩咐师爷将衙内全部人员召到院中，一是想了解县衙办差人员情况，另外想和大家认识一下。

不一会儿，三班衙役来到院内站列两旁，张咏与众衙役一一见过。张咏问师爷：“人到齐了吗？”师爷答道：“除管理库房的赵钱尚未来到，其他大小吏目都到了。”张咏又问：“赵钱为何未到？在衙中任职几年？”师爷急忙走上前来，小声对张咏说：“大人，这个赵钱是鄂州刺史周兴的表弟，在衙内担任库吏，任职五年。”正待张

咏继续问话时，赵钱缓步走来，见张咏布衣打扮，还以为是为来衙门告状的，未予前来拜见。师爷忙对赵钱说：“这是新上任的县令张大人，还不快快拜见？”赵钱急忙低头作揖：“赵钱拜见张大人。”岂料作揖时，鬓巾中却掉落了一枚钱币。张咏问：“为何来迟？”赵钱依倚自己是鄂州刺史的表弟，内心里根本没把这个新上任的知县放在眼里，便敷衍说：“我在库中整理账目，所以来迟。”张咏又问：“你为何将一文钱藏于鬓巾中？”赵钱对此拒不承认。张咏斥责道：“众目睽睽，本官亲眼所见，这一文钱明明是你低头时掉落，却不敢承认，必是你将官库中银两盗藏于头巾之中。”赵钱见难以自圆其说，便自言自语到：“不就一文钱吗？”张咏怒斥道：“虽只有区区一文，按大宋律法不该重处，但你身为库管吏目，监守自盗，就该杖责。”随命衙役杖责十板。

赵钱以前在衙内仗势惯了，今天当众受此杖责，便恼羞成怒：“就一文钱，何至受杖？即杖打我，你还能把我斩了不成？”张咏本想初到县衙，碰到这种事，教训他一下就算了，没想到赵钱受到杖责没有丝毫悔意，反有挑衅之心，十分愤怒：“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像你这样的蛀虫，本县定斩不饶。”

遂命师爷录下口供，命衙役将赵钱绑了，打入大牢，待上报提刑司，秋后处斩。师爷本想替赵钱说情，见此情景也不敢再开口。在场的衙役内心折服，深感张咏是个刚正不阿之人，同时又暗暗怀疑，赵钱毕竟是顶头上司周兴的表弟，今天把刺史的表弟打入大牢，明天会不会又放出来呢？众衙役左顾右盼无人上前。大家也

想看看这位新来的县太爷到底怎样处置赵钱。

张咏见无人上前，走到案前，拿起惊堂木啪地一拍，说道：“难道还要本官亲自动手吗？”众衙役见县令大人震怒，才一拥而上，把赵钱绑



中华书局出版的北宋时期张咏的文集

了关进大牢。从此，崇阳境内大小吏目再无人敢贪。至今“张咏杖责一文贪吏”的故事还在民间流传。

张咏在其任上，始终清廉为官，体恤民情，且政绩斐然，多次受到朝廷嘉奖和百姓赞誉，职务也累迁至工部尚书、礼部尚书。

大中祥符八年，张咏病逝，享年 70 岁。

史载：“张咏知崇阳县，为政清廉，治县有方，关注民生，扶植农桑，恩威并用，惩贪官污吏，扬清廉之风，民畏而爱之”。

有诗赞曰：

一日一钱千日千，
蚁穴不堵堤必坍。
嫉恶如仇斥顽吏，
惩贪治腐扬清廉。

(崇阳县史志研究中心)



吴中复（1011—1078）字仲庶，通山县洪港镇车田村人。北宋名臣、诗人、书法家。仁宗景佑年间进士。初任峨眉县令，后任潭州通判、河东都转运使、监察御史、右司谏，后擢天章阁待制，并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江宁府。仁宗御赐“铁御史”。

皇帝御赐“铁御史”

弹劾两宰相

吴中复任监察御史时刚正不阿，大公无私，执法如山。很多贪官奸臣受到惩治，连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树大根深、党丰羽满的宰相也受到了罢免。

仁宗皇佑年间，有个叫梁适的宰相，曾经为施行法令、疆土统一、内政管理有过突出贡献，很得仁宗皇帝赏识和倚重。可是他本性贪腐，以权谋私。随着他的资历加深，贪婪的本性就愈加突出，这是当时朝廷清政所不能容忍的。然而，这样一个功劳显赫，又得到皇上倚重的人，对于他的一些不齿行为，满朝文武大臣都看在眼里，却不敢多言。

为了弄清事情原委，吴中复派心腹御卒活动于梁适府内，御卒发现一些州道大员经常往返于梁适府上，不时抬着大木箱。这些官员要么是为了包揽修河筑堰工程而来，要么是为了追加建桥做庙银两登门。一天，吴中复的御卒向梁府送奏章，他来到大厅中，见内厅有人谈话，于是放轻脚步悄悄从门缝望去，见张知府正开着木箱，里面全是雪亮的银两。张知府对梁宰相说：“承蒙大人关照，这是一点小意思。”梁宰相满脸笑容，回道：“府台大人勿要客气，你那庙堂的银两拨付到位了吗？”张知府回道：“到位了，到位了。”御卒将所看到的情形向吴中复作了报告。后来，吴中复发现张知府的人包揽了不少大型工程，而且这些工程造价特别高。吴中复将这些情况告诉仁宗皇帝，仁宗皇帝回复说：“朕也听过马遵大臣反映了他的事。”仁宗皇帝接着问：“爱卿，你说唐朝自天宝以后治理就乱了，这是么原因？”吴中复回答道：“皇上，治乱全在得相与否啊！”仁宗皇帝沉思着，忧愁着说：“这可如何是好呢？”吴中复回答：“贪黷忤权，亡国之祸。”接着，吴中复将朝中几位大臣一一找来，他们都陈述了梁适以权谋私的事实。仁宗皇帝终于下定决心，罢免了梁适的宰相官职，改做郑州知州职位。

嘉佑年间，刘沆初任致力于官吏管理，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治吏之策。他办事效率也很高，经年不决之案在他手中数日就可了结。内侍挟诏欺民之事，他敢直言面奏，因而很快任了宰相。后来，刘沆身兼多职，有碍政体，主事不力。御史中丞孙忞、御史范师道均存异议而奏请皇上，刘沆则以“御史任满二年则出之往

例”报复异己。御史台纷纷劝谏，进而朝廷大论辩，吴中复与御史张升极力弹劾刘沆挟嫌报复。仁宗准奏，罢免刘沆宰相，担任工部尚书任应天知府。

一时，满朝倡导直声之风，吴中复成为清流领袖，宋仁宗飞书御赐“铁御史”。后来吴中复屡办大案，监察有功，一路提擢，进龙图阁直学士、任江宁知府。到了南宋，国家频危，为激励仕林，峻厉风节，理宗皇帝在吴中复少时读书处，敕建北台山龙图书院。

为民遭贬谪

神宗皇帝推行青苗法，初衷是在老百姓粮食青黄不接时，官方放贷以解百姓之急。让百姓享实惠，让国家得收入。然而到了基层，官员图政绩，强行摊派高利放贷，造成大量农民破产，地主土地更加集中，穷人变得更穷，富人变得更富，军队因军饷含银量下降而变得虚弱。

关于青苗法实施的利弊众说纷纭，吴中复决定到乡村中去了解一下，看老百姓怎么说。一天，他来到乡村朋友家，朋友兴奋不已，吴中复告诉他，此行是以平民身份暗察民情，请朋友引路，朋友会意一同前往。吴中复与朋友来到村头一间老屋中，见到一位老大爷，吴中复开口道：“老大爷，今年您贷过青苗款吗？”老大爷回答：“贷了一点，说是官家放的低息款，算起来比私人贷的还贵。”吴中复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呢？”老大爷叹了口气：“听说这是朝廷为了解救百姓青黄不接所放的低息

款，而到了下面层层加息，到我们手中就是高息了，比到地主家去贷还要贵。”吴中复不语出了门。

吴中复又来到另一家，是一位中年妇女，反映的情况与老大爷差不多。吴中复反问道：“既然官方放贷的利息比地主贵，那还要官方的干啥？”中年妇人认真地说：“这可由不得咱老百姓，都是层层分配下来的，哪家不贷都不行。”吴中复反问：“那会怎样？”“轻者罚粮，重者坐班房，有些人家不想坐班房，把田地交给地主抵债了。”吴中复再问道：“何不告官？”中年妇女回答：“都是一层一层压下来的任务，层层要政绩，官官相护，告他何用！”吴中复边听边咬着牙，最后气愤地走出中年妇女的家，边走边说：“大宋将葬送在这些人的手中，大宋将葬送在这些人的手中！”

吴中复通过深入调查，感到这个变法已经给社会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他对执行青苗法的人说，不要再执行了，再实行大宋就会葬送在你们手中。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只报变法好处，不报实施后的弊病，奏报中多引用吴中复的言词。当吴中复奏报陈述时，神宗皇帝拒听



吴中复书法

奏报，吴中复因而受到贬谪。后来，吴中复遇到关内大旱，百姓流离失所，他痛心疾首。一面想方设法赈灾安民，一面奏报赈恤。然而，有奸臣下去查视，污陷吴中复所奏报是不实之词，神宗皇帝听到奏报，龙颜大怒地吼道：“好个吴中复，朕的法令也敢发难，真是反了！”奏报者还在火上加油：“吴中复还大量挪用公款。”这样一来，吴中复即遭免官。

(通山县史志研究中心)



使，以太子少师致仕。

冯 京（1021—1094）字当世，咸宁县（今咸安区）永安古城南门外冯家塋人。北宋大臣。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己丑科状元，为宋朝最后一位三元及第的状元。历任翰林学士，扬州、江宁知府、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宋哲宗即位，累官宣徽南院

执正不回 系时安危

冯京才华横溢，为官清正，中正不倚，获得“执正不回，一节不挠”“大臣进退，系时安危”的好名声，不仅受到百姓爱戴、外藩称颂，也令当时的神宗赞许有加，在冯京因病未能应召入朝廷时念念不忘，甚至在诏书中写下“渴想仪刑，不忘梦寐”等语。

才华横溢 连中三元

冯京年轻时即有才名。相传，青年冯京曾借宿于咸宁一僧舍读书。寺中僧人养了一条狗，却被冯京和同学烹食，僧人怒而将此事告到县令处。县令知晓冯京文采，有爱才之心，就命冯京作《偷狗赋》，写得好就不追究他的责任。没想到冯京“援笔立成”，其中一句

“团饭引来，喜掉续貂之尾；索绚牵去，惊回顾兔之头”既说清了案情，又暗指寺院养狗不伦不类，才思之敏捷令县令击节称赞，不仅把他无罪释放，还“延之上座”。

后来，冯京果然不负青睐，在鄂州获得解元，又在省试、殿试中拔得头筹，连获会元、状元，被人称为“冯三元”。他的三篇“满分作文”更被大家广为传颂、学习，纷纷夸赞他的辞赋“清婉浏亮，典丽遒密，曲尽声律之妙，逐为多士魁”。宰相富弼欣赏他的才华，先后将两位千金嫁他为妻，留下千古佳话，根据其事改编的南戏剧目《冯京三元记》自宋元一直流传至今。

宋朝是古代中国文人地位高、文学昌盛的朝代，与冯京生活在同一时期的，更有欧阳修、苏东坡、王安石、司马光等声名贯耳、千古流芳的大家。冯京能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脱颖而出、连中三元，“才高八斗”当之无愧。

执正不回 一节不挠

《宋史·冯京传》记载，嘉佑末年，冯京被任命为开封知府，岳父富弼让冯京去拜访当时的宰相、冯京的顶头上司韩琦。但冯京表示：“下官不能随意造访宴请长官”，谢绝了岳父好意。其品行端正，可见一斑。

宋神宗即位后，冯京改任御史中丞。当时王安石正得神宗皇帝倚重，在全国推行变法。但冯京认为市易、保甲等新法，“立法未尽”且“寓兵于农”，背离了唐代以来兵农分离的历史潮流，因此反对这些新法的推

行。他不惧得罪皇帝跟前的“红人”，上奏“论其更张失当，累数千百言”，被王安石指为“邪说”，甚至“请黜出”。

冯京认为御史中丞肩负“纠察官邪，肃正纲纪”重任，要“以身作则”，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甚至“下属”犯错，也归咎于己。宋神宗熙宁三年九月，大理寺上奏指责麟（今陕西神木北）、府（陕西府谷）、丰（今内蒙古五原西南）三州地方官吏玩忽职守。因曾经出任陕西经略安抚使，即便已经调任多年，冯京依然认为自己难辞其咎。在奏章中，他表示，自己曾总揽过三州事务，现在既然三州出了问题，恳请皇帝通过处罚自己，警醒其他官吏不敢偷懒渎职。最终，因神宗皇帝嘉许，“优诏释其罪”。

大臣进退 系时安危

熙宁七年，因郑侠妄议朝政，冯京受到牵连外放出京。虽然远离了权力中心，但是冯京为官一任，造福一



位于咸安区的冯京后人古民居和古民居前的冯京雕像

方，在民间声名远播。茂州蕃人叛乱，朝廷紧急调冯京任成都知府。到任后，冯京拒绝滥杀，并积极与蕃人修好。当时叛乱的头领何丹听说是冯京领兵前来，主动请求投降。冯京否定了下属趁机斩草除根的建议，奏请朝廷“给稼器，饷粮食”，以平息争端，夷人大为感动，拿出犬豕割血受盟，表示“愿世世为汉藩”。

苏东坡听闻此事，曾作《河满子·湖州作寄益守冯当世》赞曰：“见说岷峨凄怆，旋闻江汉澄清。但沉秋来归梦好，西南自有长城。”将冯京喻为“西南长城”。

(刘洋)



方 琼（1068—1126）字益庵，通城县塘湖新庄人。北宋官员。北宋元祐二年(1087)中举，1091年中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其祖父系礼部尚书方迪；其父方琳，进士及第，官至户部尚书。乃历史上著名的宋代“祖孙三尚书”。

13

方
琼

方琼打侄

方琼打侄

方琼的祖父方迪、父亲方琳二公，为官清正廉洁，家风甚严，对方琼的管教更是如此，家教鞭恒悬于堂，一旦犯错便予惩罚。在父祖的严格要求下，方琼的武艺、儒家经义、诗赋和律义水准进步飞快，成为不可多得文武兼备的人才。

徽宗宣和二年（公元 1120 年），方琼任兵部尚书。次年，在平定了方腊起义后，朝廷中一些有见识的官员们辩论和研究方腊起义事件，方琼等人深刻分析原因，上谏撤销花石纲和主持花石纲的机构应奉局，将有限资源转投增强国防军队建设上，但遭到宰相王甫反对。方琼就国防建设书万言上陈徽宗，得罪童贯（宦官）。童贯和蔡京（宰相）谗言徽宗将方琼贬职于京外，徽宗听从，将方琼贬于偏远的利州路巴州。宣和七年春（公元

1125年)秋,金人入侵,东路由燕京(北京)南下,过黄河进犯汴京(河南开封)。方琼奉召勤王,官授镇夷将军,与同乡徐福募集义勇,共赴国难。

钦宗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方琼率领部队到达京城附近,却遇三千余金兵拦截,方琼一马当先,儿子方晞紧随父亲,一路奋勇杀敌。力战三天,双方各有死伤。第四日凌晨丑时,由方琼领三千官兵从南路突袭,徐福领三千士兵从西路,方晞亦领三千士兵绕往东路,分三路杀入敌营。金营顿时大乱,金营虽乱却也很勇猛,激战一个多时辰,部队终于杀开一条血路,进入开封境内。此战方琼部以少胜多,杀敌一千五百多人。

在战斗中,一位叫韩世忠的将领作战勇猛,给方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进入开封,方琼特意查看功劳簿,想对其提拔重用。可簿上韩世忠却无甚功劳。方琼感到有问题,命令彻查。原来,韩世忠的功劳被方琼表侄汪昭冒领。

方琼大怒,当即提审汪昭。汪昭招供:“末将随您从通城起兵勤王,功劳却不如跟随您一同出来的方晞等人,心里不服。武节郎韩将军刚归入您麾下,我见他无权无势,一时糊涂起贪念,听人怂恿,便将他所杀之敌和活捉的30多名金兵全部归入我名下。”

方琼道:“我一直待你如亲子,你怎可如此,坏我军纪?”“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你与我有亲,更应带头守法。人亲法不亲,今日依法将尔斩首,你可认罪?”

汪昭磕头说道:“末将愿认罪伏法,只求让我见过韩将军,当面认罪!”方琼随传韩世忠。

方琼问韩世忠：“汪昭冒领你的军功，你却为何沉默不语？”韩世忠：“末将本随梁方平守卫溶州（今河南浚县）黄河桥，结果梁方平溃逃。我突围退到开封，归入您麾下。败退之将，不敢争功。”

方琼道：“韩将军从溶州英勇突围，有功无过。这次交战，你更立大功。不必顾忌，本帅一向赏罚分明、清明公正，汪昭虽是我的表侄，我也待如亲儿，但也绝不徇私枉法。”

汪昭道：“末将罪有应得，只是对不起韩将军。”随转头对韩世忠道：“韩将军，请受汪昭一拜。”韩世忠急忙扶起。

“将罪将汪昭押出帐外，立刻斩首！”方琼下令。

韩世忠连忙阻止：“尚书大人，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呀！”“汪将军自幼跟随你左右，立功无数。虽一念之差犯了大错，但罪不至死。更何况现在更是用人之时，



方 琼

末将愿以自己微末军功替汪将军抵罪。”众将亦纷纷求情。

方琼沉思了一会道：“汪昭你犯下军规，论罪当斩。但韩世忠等众将求情，韩将军更是以军功替你抵罪。念你往日立下些战功，这次免你不死，但死罪虽免，活罪难逃。还望你日后战场之上，多多杀敌，将功补过。”

随后，汪昭被重责八十军棍，以儆效尤！

钦宗靖康元年（公元 1126 年），方琼、徐福为救徽、钦二帝战死。二帝落泪，随臣落泪，嫔妃哀泣，金军无不动容，下令厚葬，杀马、洒酒祭之。

（通城县史志研究中心）

杨起莘（1203—1259）字莘老，通城县西门外乌桥畈杨家庄人（现隰水镇下湾村接官坳附近）。南宋末期官员。宝祐四年（1256）丙辰科恩赐状元及第。出仕九江府，终于任上。

清白传家状元郎

通城县城东南锡山有一巨石，状如金鸡，相传为女娲补天遗落于此。此石承天地灵气，汲日月精华，化着金鸡昼夜长鸣。一日紫微大帝路过，见其乱啼不止，乃点鸡成石，故名金鸡石。起莘公一日游至锡山，见金鸡石昂首举翼，冲天欲飞，灵感一动，命随行书童取出文房四宝，提笔于石上书斗大“金雞”二字（其字现存），并题七律一首以言志：

千年古石号金鸡，化雨霏霏长羽仪。

不把稻粮为食啄，且将天地作笼栖。

祥云架上非孤立，入晓声中岂乱啼。

过客莫同凡鸟看，等闲飞入凤凰池。

起莘公题字题诗后，即高中状元，金鸡石于是名声大震。几百年来，通城的莘莘学子每逢大考之前都会前往拜谒，以期受到状元公的启发，以状元公的事迹激励自己，得到鼓励和萌庇，沾个喜气，考个好成绩。

南宋理宗宝祐四年，杨起莘高中丙辰科殿试第二名（文天祥同榜第一名），钦赐状元及第，为通城县历史上唯一的一名状元。起莘公中状元后奉旨回乡省亲，邑侯



县城东南锡山金鸡石

为其举行“状元跨马”仪式游街庆祝，行至县城北门，见隼水相隔，行人不便，乃首倡兴建拱北桥，取拱卫北门、面北谢君恩之意。桥为石砌八墩九孔，故时人又称“九眼桥”。人们为纪念杨状元功德，又将桥称为“状元桥”，为通城一家喻户晓之著名古迹，几百年来为通城人民生产生活作出了巨大贡献！该桥于1939年被侵华日军飞机炸毁，今北门九眼桥下游三十米处仍可见古桥墩遗迹。桥成，状元公题诗为记：

九眼悬虹百丈长，架成隼水作津梁。

往来并涉入攸济，指日芳名赛洛阳。

起莘公中状元后，被朝廷任命为九江知府。九江任上，状元公勤政廉洁，严格吏治，大兴教育，关心民生，政绩斐然，仕民爱戴。虽身居高位，却淡泊名利，严于律己，朴素低调。期间因事回通城，县衙依例都安排官轿接送代步。每次行至家门外约两里山坳处，状元公让官轿停下，下轿步行回家。外出官轿来接，同样只



状元坊牌楼

让接到山坳处，状元公从家中步行至此处上轿，带着家眷和行李时同样如此，从不坐着官轿在乡亲们面前显摆，当地人于是将那山坳叫做“接官坳”，一直沿用至今。杨状元不但对自己要求严格，以身作则，还经常不断以历代相传的杨氏清白家风严格教育约束子女、亲属、部下，严禁任何贪腐违法及特殊化行为。为此他专门写了一首《醒世四足歌》，既是自警，也是对子女后人及世人的谆谆劝诫：

茅屋是吾居，休想华丽的。画栋的不久栖，雕梁的有坏期。再休想高楼大厦，只求它能遮能避风和雨，但得个不漏足矣。

淡饭充吾饥，休想美味的。珍肴的不久吃，海味的有断期。再休想鹅掌豚蹄，只求它蔬食菜羹随时济，但得个不饥足矣。

丑妇是吾妻，休想美貌的。俊俏的惹是非，妖娆的

把命催。再休想花容月色，只求她温良俭恭敬妯娌，但得个贤惠足矣。

蠢子是吾儿，休想伶俐的。聪明的招是非，刚强的把人欺。再休想英雄豪杰，只求他安分守己寻生理，但得个孝顺足矣。

(杨伟民)

内部资料 谢绝翻印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

杨 曷（1372—1457） 字文昭，崇阳县桂口人。明朝官员。永乐壬辰进士，历任广西、福建、山东道御史、浙西分按及广东按察使。杨曷博学多才，且为官清廉，守正执法，在朝野之中品望极高。明宣德七年（1432），因“与时寡合，引疾归田”。

守正执法 刚直不阿

21

杨

曷

守正执法
刚直不阿

漫漫历史长河中，有人立即被泯灭，有人却闪亮着永久的光芒。杨曷，一位封建王朝的士大夫，只因守正执法，刚直不阿，为老百姓办了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便被人们永远镌刻在历史的册页上……

杨曷，自幼入家学，倍受封建伦理道德熏陶，常以祖先杨震“辞金拒贿”而自勉。

始祖杨震，汉时官拜太尉，曾守涿郡。有人劝他开产业以遗子孙，杨震不允，说：“要让后世清白，何须以产业遗之！”又有一属吏深夜前来赠金，杨震拒受之。吏说：“黑夜无人知，为何不受？”杨震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谓无知？”吏惭愧而退。自此，杨氏宗祠便得名“四知堂”，世代以清白传家，以廉洁树世。

家训和族规同时陶冶着杨曷，使他从小就立下鸿鹄之志，勤奋读书，长大后要做个像祖先杨震那样的清官。十年寒窗，虽不用“凿壁偷光”，却效“悬梁刺股”，终于功成名就。33岁时中永乐乙酉科举人，七年

后，又中壬辰科进士第。

金榜题名后，杨曷被皇上钦授都察院娴吏职，后授广西道御史。上任不久，便受理江西道判送刑部调斩犯人。虽然是两名小吏，且与他素昧平生，然杨曷认真执法，察觉案情蹊跷，罪证不足，便极力辩明，推翻原判，上书题奏予以平反还职。

后又判送江西妖言斩罪潘赐等 80 余人，杨曷审察案卷，辩明潘赐等 47 人虽称妖言，但实无干犯，不宜斩罪。即极力题奏，终以平反还职。

初入仕途，即辩明两件要案，在朝野引起很大反响，渐至名声鹤起。凡议定大要案，朝廷多推举杨曷。虽然当时刑法严厉，但他一心为民请命，认真监察，先后疏奏朝廷，免死罪者达 300 人之多。同朝大夫莫不畏服于他，尤其是贪了赃的官吏，见了他都自行出首。所以在当时有“不怕朝廷，却怕杨御史”之说。当时有吏为谢杨曷救命恩，赠以酬金，杨曷不受，说：“杨氏素以清廉闻名于世，汝谢我，实是害我也。”其时俸禄菲薄，他洁身自好，乃至贫得不能上朝。

宣德四年，杨曷已近花甲之年，受朝廷敕封，擢升为浙江按察司僉事，分按浙西，遍历郡县。查案访狱，提囚问吏，发现狱吏贪脏枉法，或纵囚，或虐囚。他大力整治，查办革职，部属无不肃然。

其时，浙西境内有百丈山卢弄洞，聚居强盗数百人，经常下山杀人放火，掠夺乡民。官兵多次擒捕皆不能获。杨曷到任不久，守制郎中就多次禀报：强盗又猖獗下山，百姓惊慌，纷纷搬进城来，如之奈何！杨曷闻

报虽然镇定自若，但内心却焦虑不安，常常夜不能寐，思量破贼之法。或许是冥思入窍，或许是成竹在心，竟夜梦神人送诗云：“影入菱花秋月里，人如枯草洛阳边。”他切记在心，悟得其意，次日差捕派兵往围其山，命兵丁一面作烧山之势，一面高叫“杨御史在此！”说来也怪，众贼并不顽抗，各抱赃前来自首。其它郡县闻讯，群盗亦作鸟兽散。

强盗一旦剿获，地域渐趋安宁，百姓拍手言欢，挂旗树匾，为杨曷歌功颂德。然而，杨曷却心事重重。因为，贪官赃吏虽不像强盗明火执仗抢劫，却暗中结党营私，盘剥百姓，实比强盗更恶。尤其是发现布政司胥吏为奸，陋习难改，便想着力整治，张榜告示，明令禁革，举报查办，严惩不贷。虽然他殚精竭虑，心机费尽，然招之而来的却是同僚侧目，部属离心，他实实在在被孤立起来了。封建社会的腐败，剥削阶级的积弊，岂是一个小小的金事所能改变得了的呢？

然杨曷耿介刚直，不媚时弊，壮志难酬，忧患于心，废食成疾，只得于宣德七年告病辞归。

正统元年（1436），大明王朝换了新主。按照惯例，新帝登基，都要大赦天下，启用老臣。少傅杨士奇，少保杨溥，抓住这个时机，向新主英宗皇帝力荐杨曷：有大臣风范，实可大用。英宗原在东宫时，就闻听杨御史的英名，现在有人保荐他，当然大喜过望。他立即下诏，召杨曷入朝晋见。

此时，杨曷已是66岁高龄了。但他仍然踌躇满志，千里迢迢来到京城，已是正统二年阳春三月。秉性难

改，在上殿面见皇上时，他说的竟是乡音土语。近侍问他：为何犹土音耶！答曰：“曷世楚人也，奈何效齐语以媚时耶！”阶下大臣都为之捏着一把汗，英宗皇帝却龙颜大悦，更加欣赏他的耿直，委任以广东按察使，执掌一角天涯的刑法和生杀大权。

杨曷敕封在身，回程辞别浙江父老，又马不停蹄来到广东。刚刚上任，就碰上了一件让人皱眉的事情。

原来是地方上出了一个寇贼张三，游劫乡民，在岭南一带为害不浅。只因他武艺高强，身怀绝技，总兵官安远候亲自剿捕不能获。三司官巡捕十年不获，致使当地军民，谈寇色变。杨曷到任，就接连收到禀报，要求按察司派兵剿捕。

虽然杨曷曾在浙西卢弄洞破获强盗团伙，可这次心里却没有底。因为，卢弄洞的强盗有窠有穴，围山捕拿即溃。而寇贼张三打家劫舍，都是来去无踪，飘泊不定，偌大的广东从何捕起。思索再三，他决定深入民



杨曷纪念馆

间，微服私访。终于发现张三作案有一定的规律。一是被劫都是富豪和不法商贾，二是作案时间多半在朔日的凌晨。

摸清了寇贼的行踪，方好布下天罗地网。他派人一面将张三描影画形，昭示军民，一面募捐富户，悬赏缉拿。果然，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不出两个月，张三在一家酒楼被店主发现，下了蒙汗药，报告指挥刘清三，立即就被缉拿归案。从此，地方宁静，军民安泰。

正统五年（1440），杨曷告老还乡，足迹踏遍崇阳，写下了著名诗作《崇阳八景》，将“桃溪百咏”诗稿编辑成集，并主修了《宣德年志》，为崇阳编修县志开了一代先河。

（刘文景）

刘仕昌（1394—1445）字时亨，号塘湖，通城县塘湖镇狮子山人。明朝官员。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甲辰科进士，历任陕西道监察御史、十三省巡案、浙江副使等职。因受御赐绣衣，人称绣衣公。

御史拒贿宰贪官

这日，刘仕昌奉旨启程，赴任陕西道监察御史。进入陕西地界后，刘仕昌带上卫士何清扮成买卖食盐的生意人沿小路私访行进，卫士杨亮暗中尾随其后，校尉李明则带领其他人马由驿道直行渭南府。

刘仕昌主仆二人沿渭河北岸小路而行，只见一路上人烟稀少，田地荒芜，一片凄怆。刘仕昌心想渭南乃富饶之乡，应是车水马龙繁华一片，可眼前这般光景却是为何？心中甚是不解。

一日，刘仕昌刚转过山嘴，忽见成群结队的鸡在抢吃两床晒席内的鱼虾，连忙停下脚步把鸡群赶走。

刘仕昌赶鸡的声音惊动了山旁茅屋里的主人魏文义。他出来一看，惊呆了：往日鸡群把鱼虾吃个精光也不敢赶，今日两位陌生客人赶走了鸡群，保住了不少鱼虾，便留住刘仕昌主仆吃便饭。顷刻，只见红苕当饭，一碟鱼虾为菜，腥味难闻。刘仕昌挟起一条小鱼放在口里嚼了嚼，问了声：“老人家，这鱼似乎少了点盐。”魏文义道：“客官有所不知，请将就将就吧！”说罢欲言又止。听到这话，刘仕昌想起一路上的光景，疑云顿生，

道：“老人家，我们是湖广人，来这边做点生意，你不妨把原委说给我们听听，如何？”

魏文义心想，二位客官只是过往的生意人，说说也无妨，便叹了一口气道：“我从前在这里的大户苏家做长工，人老了，被辞退，只好回家下河捞点鱼虾度日，但苏家有钱有势，他们家马吃庄稼，鸡吃鱼虾，赶都不能赶。苏家经营食盐，与官商勾结，高抬盐价，斗米斤盐，没人买得起，穷人家只能刮点陈壁上的硝盐调味，很多人得上了大脖子病。”

“苏家如何欺压百姓？”刘仕昌说。魏文义回答道：“苏家有三兄弟，老大苏星是渭南知府，老二苏亮是华县知县，老三苏光是本地迪功郎。苏光横行乡里，要丁要夫，要粮要税，他说了算，百姓敢怒不敢言。特别是去年年底，不知苏家哪来那么多盐，还将盐价提到斗米一斤，发了大财。”

刘仕昌想起临行前刑部曾通报去年渭南抢劫官盐一案，决计顺藤摸瓜。问：“老人家，苏家那么多盐是哪来的？”魏文义道：“不清楚，只知道他家四十多个家丁和长工每日两趟，运了两天才运完，现在就放在他家仓库里。”

听罢老人诉说，刘仕昌叫何清拿了几小袋盐给魏老，征询道：“我们正好也是做盐生意的，麻烦你带我们去苏家谈谈生意，事后我再给几小袋盐作报酬，如何？”魏文义收下食盐，满口应允。

刘仕昌、何清、魏文义三人傍晚时分到了苏家。第二天，苏光出见刘仕昌。几经讨价还价最后确定，苏家

售盐二万斤给刘仕昌，斗米一斤，折合白银一万两，现付银票五千两，五日后钱盐两清。生意谈妥后，苏光一面设宴款待，留宿刘仕昌，一面差人连夜报与苏亮、苏星。

第二天，苏光送走刘仕昌。想起白花花的银子，正在沾沾自喜之时，给苏亮、苏星送信的人回来了，向他呈上兄弟二人的回信。回信吩咐：谨防劫盐事发；银盐俩收，杀人灭口，以免后患。此正合苏光之意，于是他迅速带上家丁，一路向刘仕昌主仆二人追来。

苏光一行在一山道上追上刘仕昌主仆。二话没说，即令家丁提刀朝刘仕昌主仆砍杀。何清见状，将行李放下，手抡铁扁担，左右开弓，打得家丁东倒西跌，仓皇逃命。苏光被何清的铁扁担震得虎口发裂，踉跄二步，跌倒在地，被何清一脚踩住。苏光两眼翻白，断断续续喊：“大人，饶命，饶命！”

刘仕昌走上前，喝道：“要想饶命，你得老实回答问题。”苏光只感到一阵透心凉，魂飞魄散，大喊：“只要大人饶命，我全招了，去年一批官盐运至官池，大哥叫我和二哥带人马扮成强盗劫下官盐，与官盐护送人马一交手，他们就假装不敌，仓皇逃命。只有一卫士阮南持刀抵抗被我等抓获，以通匪之罪现押在华县死牢，等秋后处斩销案。”何清命苏光签字画押后将他押往渭南府。

去渭南府，华县是必经之路。苏光被擒，早有家丁快马飞报苏亮，苏亮密令捕快石元带人拦截。正当双方相持不下时，杨亮赶到，杀退众衙役，活捉捕快石元。一番讯问，石元便将苏亮参与抢劫官盐之事和盘而招。

刘仕昌命将石元一并秘密押解渭南府。校尉李明早已带领人马在渭南府将“御史监察院”行营安排妥当，刘仕昌一到，便命苏知府进见。

苏知府携黄金千两前往参见新任御史。苏知府见过刘仕昌，笑道：“御史驾到，有失远迎，略备薄礼，不成敬意。”刘仕昌命手下收下黄金，道：“府台不必多礼。”随即吩咐师爷开具收据交付苏知府，又命人将黄金收入府库。苏知府手捧收据，面色苍白，浑身发抖。刘仕昌道：“你是不是犯了病，且上前来，我与你看看。”刘仕昌拿着知府的手脉，沉吟片刻，道：“你是盐吃多了，气血不通畅所致，先且回府待命，以后少吃点盐便是。”

苏知府回到家中，想起御史一开口就提到盐字，一定是盐案“东窗事发”。这时，华县来报苏光不知去向。苏知府急请商盐政来府商量好对策后，一同来到行营，参拜御史，告禀次日启斩盐盗一事，并提出请御史大人监斩。刘仕昌听完一一应允。

当晚，刘仕昌召集众人商议，决定将计就计。第二天，华县法场人山人海，戒备森严，苏知府、商盐政、苏知县洋洋得意坐在台上，专等御史来到。午时，御史到。

苏知县上前命衙役将阮南和方来正押上，验明正身。阮南和方来正仰天大呼“冤枉啊，冤枉！”苏知县急命启斩。

御史见状，摆手道：“且慢，阮南、方来正有何冤枉，让他们从实道来。”阮南道：“大人，我本是商盐政部护盐卫士，随同护盐到官池，遇上了劫盐大盗，盐政

弃船而逃，我等奋力护盐，奈何寡不敌众，其他多人逃生，仅我一人全力相护被俘，现官家非但不赏，反诬陷我是盐盗，将我屈打成招，今要处斩。大人，我实在冤枉啊！”

御史又问：“方来正，你有什么冤？”

方来正道：“我本是苏家长工，去年一天，苏光见我女儿方淑芳年轻漂亮，意欲非礼，女儿不从被苏杀死，抛尸荒外。我与其理论，被关进华县大牢，也被诬为劫盐大盗。我只不过帮苏家运过盐，大人，我好冤枉啊！”

这时，法场一阵喧哗。衙役来报，又有人告状。刘仕昌命带告状人上堂。

只见一老妇人带青年男女二人手持状文跪地大喊：“大人伸冤。”

刘仕昌问：“你们状告何人？”

三人齐声说：“我们状告苏星、苏亮、苏光三兄弟。”

刘仕昌收览状纸后，将状文丢给苏知府。

苏知府接过状文，脸色苍白，大汗淋漓，边还状子边喊：“大人，我冤枉啊！”

“是吗，冤枉不冤枉本官自有公断。”刘仕昌亮出尚方宝剑，高声道：“来人，带罪犯，传证人。”

众衙役押上苏光、苏三、苏五、苏十、石元、苏亮，师爷呈上认罪供状、书信证物。

苏知府、商盐政二人一见，顿时如烂泥一团，瘫软在地，刘仕昌命衙役上前除去他们二人的衣冠顶戴。

二人跪在刘仕昌面前，一一从实交代罪行。

这时石元又大声喊：“大人，我冤枉啊！”

刘仕昌问石元：“你有何冤，从实说来。”

石元道：“大人啊，我是奉苏知县之命前往捉拿劫盐大盗，哪知是捉拿大人啊，我是被苏知县蒙蔽利用了。此外，我还要举报知府兄弟加征三倍税捐之罪。请大人宽赦我。”

刘仕昌扬了扬手中的尚方宝剑，惊堂木猛力一拍：“苏星兄弟三人与商盐政狼狈为奸，抢劫官盐，欺骗朝廷，加征税捐，已是罪行累累。又刺杀本官在前，重金贿赂本官在后，罪不可赦，推出去斩首示众。”

御史又将令牌一拍，全场寂静。再宣：

苏十听主人差遣送信，归案后坦白，有立功表现，赦免无罪；

石元受苏知县派遣，解救苏光，能迷途知返并举报苏氏兄弟加征百姓三倍税捐的内情，有立功表现，赦免无罪；



刘仕昌故居

阮南、方来正等人均无罪释放；

随后又命师爷寻找治大脖子病良方，免费给老百姓治病；命打开盐库分发食盐给百姓，分文不取，并免去知府所加三倍税捐。

人群欢呼一片，人心大快……

事毕，刘仕昌将全部案情呈报朝廷，永乐帝大喜，升刘仕昌为十三省巡按，亲赐“代天巡狩”匾额，以示褒赏。

(刘秀保、刘国斌)

王莹（生卒年月不详）字润之，蒲圻（今赤壁市）人。明朝官员。明宣德年间进士，饱读诗书，生得英俊潇洒。据清同治《蒲圻县志》载称他“美姿容，好言辞”。

刚正不阿 秉公除霸

33

王莹

刚正不阿

秉公除霸

王莹二十二岁官居刑部侍郎，虽说年纪轻轻，办事却干练果决，并能秉公循法，不讲私情，在京畿小有名气。

时朝中兵部尚书潘龙在朝中有权有势，育有一儿一女，儿子长得丑陋，又恶习满身，可谓是坏得头上生疮，脚下流脓；女儿却长得貌美如花，传遍京都。

好巧不巧，潘公子寻花问柳，逼死了民妇，被关在刑部牢房，王莹正是审判官。潘尚书先是自恃官大、面子大，通过关系游说王莹释放他儿子。王莹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一个尚书的儿子焉有不按律之理。”尚书见此路不通，又着人抬了金银晚上送到王府，其意不言自明。王莹当即喝令他们抬走，正色道：“我洁白之躯，安受赃银污染。”尚书家人灰溜溜地把金银抬走了。

尚书万般无奈，着急上火，想着这年轻人油盐不进，不知如何是好，想来想去都没有什么办法救自己的儿子。女儿见他日渐憔悴，劝他保重身体。潘龙见到女儿，一下计从心来，想起了美人计。于是托媒说亲，要把女儿许给王莹。

王莹素闻其女美貌，心仪已久，此时如若答应，刚好水到渠成。但这样必然妄法徇私，为做官之耻。他权衡过后，对媒人说：“我在朝为官已两年，久闻尚书千金艳丽无双，早请月老牵线，尚书以故相辞，今其子犯法，又主动结亲宽刑，我身在天子足下，当先尽天子之忠，待斩了潘公子再议亲可也。”王莹为了不使尚书继续纠缠，毅然请出尚方宝剑，斩了潘公子，为京中除了一霸。

(赤壁市史志研究中心)



陆水湖畔



吴廷举（1459—1528）字献臣，号东湖。广西梧州人（其先祖系嘉鱼县人，祖上戍守梧州，遂籍梧州）。明朝官员。明成化十六年（1480年）庚子科举人，二十三年中丁未科费宏榜进士，授官广东顺德县知县。曾任南京工部尚书。

35

吴

廷

举

百折不回尚正义

百折不回尚正义

在嘉鱼县渡普镇的净堡嘴，出了个名叫吴廷举的人，曾担任明代工部尚书。吴廷举的一生就是与阉奸、昏君斗争的一生，他清廉正义、刚正不阿，深受世人称道。

宁愿得罪“宦官”，也不向百姓派工派款

吴廷举在广东顺德县任知县时，一天，巡察湖广的都御史屠滂召见吴廷举，对他说：“顺德大珰（大宦官）嘱我修其家庙，可稍葺之。”意思是，吴廷举所管辖的地方有一位朝廷的大宦官，想让吴廷举向百姓派工派款替那位宦官修建祖先祠堂。但吴廷举当场拒绝，他说：“令非有旧例新恩，一夫不敢役，一钱不敢费。”当时，

明代宦官受宠信、权力大，一般地方官都惧其威势而迁就奉承巴结，吴廷举却宁愿得罪“宦官”，也不愿向老百姓派工派款。

要布就得付银，不要方可退银

皇帝有一次委任一太监驻顺德市舶司（负责检查出入海港船舶、管理外商、征税、收购非卖品等）当提举（司长），按照市舶司提举的惯例“常以银委买葛布充贡”，所谓“以银委买”实则空手套白狼，叫下官向老百姓敲诈勒索。一般情况之下，地方官会命令下属按银数向民间索取所需的葛布，而后把原银拿回完封归还。而吴廷举却不理这一套，当市舶司提举交银与他代买葛布时，他即用其银买二匹（葛布），自送于司（太监），曰：“承委买布不识可否，先买二匹为式，倘以为可买则买之，如不买则还原银。此布出自雷州，非吾邑所产也。”太监大怒，取银离去。太监原想从吴廷举手中诈取南方名产葛布，却料不到吴廷举假戏真做，要实买实卖，要布就得付银，不要布方可退银。

多次冒死疏劾权贵不正之风

武宗正德四年（1509），吴廷举升任广东右参议、琼州兵备副使之职。这时，宦官刘瑾深受皇帝宠爱得以专权。一次刘瑾“差官查盘（广东）省库银解京，额外索取内进人事贺礼银若干”，广东地方长官打算把盐法

道的库银拿去奉献刘瑾。当时盐法道正是吴廷举掌管，他坚决拒绝，并“列疏于朝”，说盐法道库存之银应“留备两广兵兴之资。”理之所在，刘瑾“虽急怒而未有以罪也。”

随后，吴廷举上书揭发奸臣潘忠（太监出身）罪行20条，朝廷误认为他是诬告，便将他押解到京城下锦衣卫牢狱。第二年，刘瑾欲置吴廷举于死地，便把他披枷戴锁罚立在吏部门前，连续十多天不给他饮食，并对他处以械刑。吴廷举有弟弟名叫吴廷弼，是个举人，他不但送饭给吴廷举吃，还在吴廷举接受械刑时卧在械杖下，代哥哥受刑，保吴廷举不死。刑部主事宿进知道后上书朝廷，为吴廷举伸冤。朝廷宰相也出面为其辩解，朝臣纷纷响应。刘瑾只得释放吴廷举，改判他谪戍万里之外的雁门关。吴廷弼背负哥哥到都督府领戍牒，汗泪交织，见到的人无不感叹。吴廷举因被拷刑，罚枷致伤并患病，被遣戍雁门关时，幸得吴廷弼照顾，才捡了一条命。吴廷举在流放途中写了一首《示弟》诗：“万里间关做楚囚，半生辛苦为谁谋，倾危九死过苏轼，患难相扶过子由。心事仰祈天日照，话言敢望史官收。更有一事为君累，葬我云山山上头。”诗中流溢着真挚的感情，同时表达对太监势力的毫不示弱。

不久，朝中有人奏刘瑾图谋不轨等罪行，刘瑾被斩，吴廷举得以赦免，回到故乡。吴廷举为官四十年，归来时依然像当年那样，生活简朴，衣服破旧，衣带穿孔，不作修饰。吴廷举为了兴办学校，创办了咸嘉学社。他拆掉自家的房屋，用来建学校，取名“东湖书

院”，自己还出资购田 170 多亩佃耕于民，除税收之外的多余之资，周济学生。自己在这里孜孜不倦地教学，人称“东湖先生”。



吴廷举所著《湖广通志》

嘉靖七年（1528 年），吴廷举病逝，由于他为官清廉，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没有多余的资产，甚至连装殓都极为简朴。隆庆元年（1567 年），穆宗朱载堉追记他的功劳，后又赠太子少保，谥号“清惠”。

（龙见清）



李承勋（1471—1531）字立卿，号东轩，嘉鱼县朱砂桥人。明代大臣。弘治六年（1493）进士，授太湖知县，累迁南昌知府。1527年，晋刑部尚书，后召授吏部尚书，至北京，又改刑部尚书加太子少保。不久，世宗朱厚熜遂命李以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太

子太保的身份，掌管都察院，专一提督京营。卒后获赠少保，谥曰康惠。

“三部”尚书南昌拒贿

明正德五年（1509年），李承勋由南京工部虞衡司郎中升任南昌知府。接旨后便往南昌赴任，这天，刚走到离南昌20里处，骤见前方一茶馆里走出几个衣着豪华的人来，拦在轿前长揖相迎。为首的人说：“我是宁王府管家，奉宁王之命在此迎接知府大人，请大人在我家茶馆饮茶歇脚！”宁王朱宸濠可是明太祖朱元璋的五世孙，是这一方封地的藩王啊！李承勋听说是宁王的意思，也不好推辞，只得勉强答应。

进到茶馆，管家将李承勋的随从安排在前厅饮茶，

特意将李承勋迎至豪华的内厅。落坐上茶后，管家令人抬出一口沉甸甸的朱漆箱子献与李承勋，说：“南昌物资匮乏，宁王念知府大人初来乍到，肯定有很多拮据之处，特备此供大人贴补之用。”打开箱子，只见满满一箱金元宝灿烂夺目。李承勋早有耳闻：朱宸濠持皇家王爷之势，惯在地方横行霸道，巧取豪夺，历来总是收买、勾结地方官吏，结党营私，鱼肉百姓。心想：“今天还行贿到我头上来了，真是不知廉耻！”于是对管家说：“宁王的茶我喝了，宁王的心我领了，如此大礼，万万不可收！”管家露出满脸难为的样子说：“宁王反复嘱咐，勿请大人笑纳，不然，小的们回去无法交待！”

李承勋于是要来文房四宝，写下一纸文字，封缄，递与管家说：“你将此交与宁王便可交差了！”说罢启程赶路。

管家回到宁王府，向朱宸濠禀明情况，递上信函。朱宸濠细看信函，原来是一首绝句：“古有少陵辞锦被，当朝伯律尚清风。腐儒袍服皇家赐，只蔽羞惭不蔽穷。”莫看朱宸濠心术不正，却也是饱读诗书之人，他明白诗中引用了“少陵辞锦褥”“伯律尚清风”两个典故。

“少陵辞锦褥”说的是唐代杜甫在为官任上以一首五言诗拒收太子张舍人赠送锦褥之事。其诗写道：“客从西北来，遗我翠织成。开缄风涛涌，中有掉尾鲸。逶迤罗水族，琐细不足名。客云充君褥，承君终宴荣。空堂魑魅走，高枕形神清。领客珍重意，顾我非公卿。留之

惧不祥，施之混柴荆。服饰定尊卑，大哉万古程。今我一贱老，祖褐更无营。”李承勋引用这个典故，是婉言表达谢忱，又坚决拒收礼物的意思。

“伯律尚清风”说的是本朝一位叫况钟字伯律的官员两袖清风的故事。况钟在苏州知府任上10年，人称“况青天”。明正统五年，况钟调赴京都，苏州百官百姓万人相送，纷纷赠礼。况钟谢绝了所有礼物，并即兴吟诗一首，倾吐心声：“清风两袖朝天去，不带江南一寸棉。惭愧士民相饯送，马前洒泪注如泉。”李承勋是借以表达誓做一名清官的志向。

朱宸濠看罢李承勋写的诗，深知此人不比之前的官员，是个不好对付的硬角儿，暗暗存心，今后如何设法整治他。

经过这件事，李承勋也料定朱宸濠不会轻易放过自己。但李承勋心想：“我心地坦荡，行稳致远。为人不做亏心事，就不怕你这鬼敲门。”到任后，他特地制作一块匾额，亲笔书写一联：“守斯地，当造福斯地；取一文，则不值一文”隽刻匾上，悬挂于衙堂，既以此明志，也以此警人。

李承勋为官几十年，担任过刑、吏、兵三部尚书，一身清廉自律，布袍蔬食，无治产业，至死却“家无余资以殓”。

(熊国豪)

汪宗伊（1510—1586）字子衡，号少泉，崇阳县天城镇浮桥村人。明代大臣。汪文盛（大理卿）之子，自幼天资聪颖。明嘉靖九年(1530)应县试，被拔为优等，1534年应省试为第一人，1538年中进士，后官至尚书。

清正爱民 守洁终身

汪宗伊一生为官清正爱民，不畏强权，治理有方，任上的一些小故事流传至今。

释盗成良

明世宗嘉靖十九年（1540），汪宗伊任浮梁（今江西修水）县令，期间境内发生大水灾，全县大面积闹了饥荒，老百姓食不裹腹。尽管汪宗伊想法设法救济灾民，然而杯水车薪，终究解决不了大问题，许多灾民为了生存，不惜铤而走险，沦为强盗。一次县衙抓到盗民一百余人，衙役请示汪宗伊如何处置，他潸然泪下，说：“做强盗是要判死刑的呀！我的百姓为了暂且免于饥饿，甚至甘冒死罪为盗，这是多么令人悲伤的事啊！我们要让这些人有改过自新的机会。”于是将这一百多人全部释放回家。当年秋天征收赋税时，有关部门不顾灾情仍按平时税额全额征收，汪宗伊根据实际情况报告上司，并提出五条救灾措施，即：绝常例、禁包揽、革加

头、省自运、复带征。在他的努力下，这些救灾措施得以施行，一些侵害百姓利益的成法被废除，重新核定各种税费，分里甲征收，并在县衙门口张榜公布，以示监督。从此，浮梁百姓不再饱受横征暴敛之苦，生活渐有起色。第二年，境内黎民丰稔有余，许多盗民改邪归正，安居乐业，社会环境日趋良好，民风纯然。

不畏强权

43

汪

宗

伊

清正爱民

守洁终身

因为汪宗伊在浮梁县的显著政绩，朝廷欲将其内召。而此时，对汪宗伊一生影响深远的父亲中丞公文盛因病辞世，汪宗伊按制回家守孝。三年守制期满后被征召入朝，任兵部主政郎中，后改任武选历员外郎署郎中。当时郎署人员众多，汪宗伊大胆谏言，锐意改革，淘汰多余职事冗员一千七百余。此时正值严嵩、严世蕃父子擅权，他们在朝中结党营私，贪赃枉法，陷害忠良。许多没有骨气的大臣迫于权势，纷纷投靠严氏父子，但汪宗伊刚正不阿，坚持节义，严党多次诱惑拉拢他，屡遭拒绝。嘉靖三十二年(1553)，兵部武选司郎中，保定容城人杨继盛因痛恨严氏父子“盗窃权柄，误国殃民”，慷慨上《请诛贼臣疏》，历数严氏父子“坏祖宗之成法、冒朝廷之军功”等十大罪以及“奴才、心腹遍布皇帝左右”等五大奸，请求明世宗“早诛奸险巧佞、专权贼臣以清朝政，以绝边患”。作为杨继盛的同僚好友，汪宗伊给予坚定的支持。而后杨继盛因严嵩诬告入天牢，汪宗伊愤怒冲冠，欲挂冠归里，以示抗议，许多忠

良相劝，才罢此念想。而在应对皇帝关于严嵩之孙严鹄假冒军功一事是否属实的讯问时，有同僚请求汪宗伊为严嵩父子说谎言，汪宗伊严正指出：“焦山杨公是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不畏万死，揭发严氏父子如山之奸，我们这些人有须有眉，怎么能为奸贼所用？况且严鹄小小孩童，乳臭未干，却报一人自斩七首的军功，这是连三岁小孩都不能骗过的事，我宁死也不会为他去打掩护。”于是据实以告，“执论不屈”。严氏父子听闻此言，恨之入骨，于是设计罢免汪宗伊。他坦然面对，道：“不与奸佞为伍，这正是我的意愿啊！”当即辞去官职，带着家人离京回乡。

裁减赋税

汪宗伊在家乡崇阳一呆就是17年。17年中，他朝夕侍奉祖父，教育子女，泰之自若，没有一点失意的样子。一直到明穆宗隆庆四年(1570)才东山再起，出任南京吏部郎中。

1573年，明神宗朱翊钧即位，改元万历。汪宗伊升任光禄寺卿，出任应天府尹。在任期间，他尽力减除不合理的赋役，裁撤各个部门不合理的开支，打击不法官吏，每年节省民财数以万计。当时一名退位官员、江苏溧阳人狄斯彬写了一本《山居野志》，文中斥责四司重复收税，让溧阳百姓不堪重负，而且各乡赋税不均。他看到此书，立刻裁减冗费。每年减去当地百姓谷米九千三百多石，白银六千三百多两。汪宗伊推行的一系列

减赋政策得到了应天府百姓的拥护，受到百姓的信赖。许多百姓家中挂起他的肖像礼拜。不久，他升任大理寺卿，任上“清慎勤敏”，极力除去严苛刑罚，推行宽平政策。后来又晋升户部侍郎。不久又擢任南京右部御史，他简化扈从，裁撤各种不必要的开支，深得万民之心。

整顿积弊

后来，神宗皇帝为了整顿仓场积弊，三次任命他出任户部尚书，总督仓场。明代仓场管理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漕粮运输，二是粮食保管。按照规定，各运粮旗军除了营运正粮之外，可以附带自己的一些土产货物，以便让他们沿途易换盐柴，维持运粮时生活开支。但朝廷规定，各船自带货物不能超过二十石，这对于漕卒们而言，远远不够，以至“各总旗甲人等，在运艰苦备尝，贫困已极”，后来虽然放宽限制至四十石，但依然不能满足漕卒们的生活之需。在粮食保管方面，由于多年积弊，粮食调运保管不善，大量粮食在京仓糜烂，至万历七年(1579)时，京仓中竟然还有隆庆五年的存粮。加之仓场本是营私舞弊之所，大小官员往往在其中大肆贪掠，管理漏洞百出，“如鼠穴矣”。他到任后，立即厘正仓场、漕船积弊。一方面体恤漕卒们生活艰难，奏请皇帝，在不影响正粮运输的前提下，进一步放宽各船自带货物的限制至六十石，并且放宽对超带货物者的惩罚，受到漕卒们的欢迎。另一方面严格财粮制度，让存

粮合理调运，同时竭尽全力堵住仓场缺口，挖出一大批官仓硕鼠，仓场管理日臻完善，仓场也日渐丰盈，“诸所筹划，为国为民，任劳任怨，为时所称”。

热心桑梓

晚年的汪宗伊，宦情日淡，多次上书神宗皇帝，请求告老还乡。但皇帝总是极力挽留，说他“老成清慎，特兹简用”。万历八年(1580)五月，汪宗伊升任南京吏部尚书，主持官吏选拔及考绩调用，权重一时。但他年老多病，致仕之心日盛，当年九月初七，其子汪庭去世，打击甚大，朝廷终于允请他告老归乡。

汪宗伊归返故里后，热心家乡建设。他捐资修建下津桥，方便县人出行。县中因一连多年未有科举及第之人，有人怪罪县学太差，汪宗伊全力捐助县学，并告诫众人说：“你们怎么能专门怪罪地方呢？还是多想想自己的学业是否真的精通了吧。”并且亲自给学生们上课授业。本地官府施政有了得失，他都向当政者一一指出。自己生活俭朴，“几近寒士”，有人问他为何如此，他说：“只有廉正一事，是我终身所墨守的啊！”

万历十四年丁亥(1586)十二月初五，汪宗伊去世，享年76岁，归葬路口洋港。神宗钦赐全部祭葬，建坊开道，指派翰林院学士、国史编修袁宗道撰写墓志铭。熹宗天启初年，复追谥恭惠、资政大夫。

(崇阳县史志研究中心)

李 沂（1555—1606） 字景鲁，号太清，嘉鱼县人。明代官员。万历十四年（1586年）进士，改庶吉士。十六年，授吏科给事中。拜官甫一月，以劾东厂太监张鲸廷杖削籍。著有《中秘草》三卷，《四库总目》传于世。

明代清官李太清

47

李

沂

明代清官李太清

嘉鱼县人民公园南侧辟有“嘉鱼廉文化传播园”。园中建有明代清官李沂的纪会亭—太清公亭。太清公亭坐北朝南，四角八柱，飞檐画壁，处在绿岭之上，小桥流水之中。清风阵阵，荷莲飘香，花草妩媚，姹紫嫣红。亭南上额刻有“太清公亭”四字，亭柱刻有对联：一湾清水通楚北，万古芳名在嘉南。亭北刻有对联：亭风吹榭雨，水月照溪桥，横额为：南嘉聚秀。常有游客到此，坐卧清亭，怀念故人，论道古今。

明代给事中分设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称六科给事中，也即言官。明代设置给事中，驳正百司所上奏章，监察六部诸司，弹劾百官，以其卑微之职，上规皇帝，下制大僚，以区区七品斡旋于九重之上。言官以谏为职，对皇帝的行为有阙必规，有违必谏；对权臣有误必纠，有奸必劾。但他们的规劝和弹劾是否奏效完全取决于皇帝本人的意向。

太清入朝，正值明万历皇帝神宗朱翊时代。万历时期，工商业本来有一定的发展，神宗不但不积极支持，



太清公亭

反而派遣大批官宦充任矿监、税监，分往各地开矿征税。成为明代一大恶政。《明史》上说，皇帝爱财莫如神宗。结果导致了湖广、临清、苏州等地人民展开激烈的反矿监、税监使的斗争。当时朝中诸臣结党营私，争权夺利，斗争更为激化，国家政治非常混乱。太清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入朝为官。

当时东厂太监张鲸，乃神宗亲近太监，此人心机颇深，曾为神宗斥逐异己，扳倒了权势熏天的冯保，干扰过张居正改革，因此深得神宗庇护，掌管内府供用库，藉此我行我素，招权纳贿，劣迹斑斑，引起众多文武官员交相弹劾。但被皇帝予以安慰挽留，反而处罚弹劾的言官。多有言官为此解职罢官甚至性命难保。

明知如此，但李太清忠君为国，无私无畏，仍然继往上疏，直言相谏：“张鲸倚仗恩宠，欺天坏法，胆大心

雄，从未有科道，诸臣所奏八罪，一一有据，招讨法司，必以严究恶党。”“以一阉臣之故，而坏神明之治，坏朝廷之体，天下谓何，后世谓何，忠臣烈士，日夜仰天拊心，必欲殄灭此贼而后已也。臣职在谏垣，君侧有恶，不为扫除，皆臣之罪，故敢直言无讳，伏惟神明裁察幸甚。”直指皇上不惩处张鲸，是因为接受了张鲸的贿赂之故。

李太清犯颜进谏，激怒皇上，神宗怒不可遏，借口李太清是张居正的同乡，无端指责李太清欲与张居正、冯保报复私意不遂，故捏污君父，下令将李太清交锦衣卫镇抚司“好生打着究问”。斥“李沂置贪吏不言，而独谓朕贪，谤诬君父，罪不可宥！”命将李太清下镇镇抚司狱，杖责六十。为避免有关人员与李太清庇护，还特别命司法太监、与张鲸关系密切的张诚监督廷杖，意将李太清置于死地。然而李太清面无惧色，特大声高呼高祖高皇帝一声，天忽霾，杖酷甚，被杖血肉淋漓不觉痛。杖毕送还，因杖苦用被卧，皇上遣官探视，见被褥粗布百结，皆泣去。当是时，天下无人不知，因称颂李太清之刚直而为之涕泪。

李太清为人刚正不阿，得罪了当权太监，此前在皇帝面前诬告，说李太清贪赃枉法，发大财。皇帝信谗言，召太清进宫，反问：“都说你是清官，你家境况何如？”太清答道：“回万岁，托万岁爷福，我家有八十人砍柴，七十人烧火，两只盐船跑水，吃水半边江，屋有千柱落脚，家有万盏明灯。”皇帝细思：何言清官，简直一贪官，该当治罪。少时，先派人探访，再杀不迟，

当即派人到嘉鱼打探。两个官衙前去打探后，回京禀告皇上：“他家甚穷。”皇上欲治李太清欺君之罪，哪知太清解释道：“我家八十老爹砍柴，七十老母烧火，两只鸭子在河中游，靠它下蛋换盐，吃水用的是半边缸，房子用芦苇竹子做墙，夜晚能从房屋缝隙里见到天上星星，岂不是‘万盏明灯’？”皇帝哭笑不得，连说：“李太清，李太清，你真是太清！”

李太清在朝时，曾回老家祠堂湾，四方乡亲前来诉苦：“知县加重粮税，不收谷，只收米，连半头米都不要。”正好，知县前来拜望太清，太清叫家人做粑，说：“得亏知县治民有方，家乡人都吃上了‘金银粑’！今日我们同餐分食，与民同乐！”知县见端出来的粑一半黄一半白，分明是谷糠和碎米做成。太清把粑一掰两块，自己吃米粑，叫知县吃糠粑，噎得知县直翻眼珠子，太清问道：“这味道，比你征收的官粮米如何？”知县明白了，忙说：“李大人，我再不敢征收粮米了！”

万历三十四年（1606）李太清病卒，葬于嘉鱼五里牌萧村后雨山北麓孔家河南侧。即现今太清亭处。

太清其人，顾其名而思其义。太清者，天空、天道也。古云“太清，元气之清者也。”“圣人之道之在天下，犹日月之悬于太清也。”太清一身正气，“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为官之道者，惟太清也！

（李廷雄）

张开东（1702—1781）字宾旸，别名白菴，号青梅居士、海岳游人，赤壁市茅山人。清代旅行家、文学家。曾任蕲水训导。张开东擅长书画，精于诗词，又酷爱山水，常乘独轮车遍游五岳，有《白菴诗集》《海岳文集》等著作传世。

打击权势 扶贫济困

51

张
开
东

打击权势
扶贫济困

张开东为人慷慨好义，遇有困难者，解囊相助，毫不吝惜。乾隆戊戌年（1778年）大旱，张开东除作《救荒急论》劝赈外，还典当了自己的衣物倡赈，得到了许多人的赞许。蒲圻民间至今还流传着许多关于他打击权势、扶助贫困的传说。

小试锋芒

张开东与一批赴京赶考的举人同船由武昌到扬州，以便转运河至京师。在船上，众举人相互谈笑风生，目中无人，实际上有些人文理不通，也在中间风趣取闹。张开东耻其无才，冷笑视之。举人们见其衣帽不整，粗布陋服，土里土气，便对他斥道：“你这土老儿，有什么本领，敢耻笑我们。”张开东说：“笑你们高谈阔论，实则文理不通。”众举人大怒道：“你有何能，可与我们比试。”张开东说：“可以，待我念一诗，看你们谁能替我

记录下来。”对一群举人来说这何难之有，众举人都说“行。”张开东随此行之意念道：“ㄅ一小舟，ㄇ水上溜，ㄊ三下响，啊伙到扬州。”念毕问众举人“写完了没有？”众举人一个个目瞪口呆，互相张望，无从下笔，张开东说：“原来你们也只有这大的本事！”从此众举人对张开东另眼相看，恭维他并以师事之，一路说笑，同到北京。（注：ㄅ——“的掐”音，小得很的意思。ㄇ——“额哑”音，摇桨的磨擦声。ㄊ——“嘟咚”音，船桨的拨水声。）

题匾受皇恩

张开东到北京，原本就不是去赶考的，因他只是一名贡生，他的目的是游玩北京名胜古迹。众举人觉得这个“土老头”很有意思，大家极力挽留他，要他等考期过了再走，张开东也就同意了。三场考过，举人们有的中了进士，有的名落孙山，张开东也打算离京到别处去游历。恰巧乾隆皇帝的生日快到了，大家又要张开东等万岁爷寿辰之期同看热闹再走。那些中了进士的人，为了讨好皇帝，大家凑钱打算给皇上送块金匾。到底写什么，却拿不定主意，有的说写“福如东海”但海有边，不足以说明皇上福大；有的说“寿比南山”也不好，山有顶，不足以说明皇上的寿高；有的说“如山之苞”，也不好。苞茅可以被人们砍掉，冬天也会枯死；有的说“如松柏茂”，都不好。意见难以统一。这时有人想起张开东，就提议去问问这个“土老头”，张开东见这些进

士们急得满头大汗的样子，确实可怜他们，就说“写万寿无疆”可好？大家一听，齐声叫好，于是推举张开东执笔。他也不推让，提起笔来，一挥而就，张开东在蒲圻是个本来已被称之为“神笔”的书法家，这次知道是为皇上写匾，自然写得更加专注。匾制好后，送到乾隆皇帝面前，皇上一见，龙颜大悦，大加赞赏，词提得好，字写得好，于是问是哪位进士题写，大家不敢隐瞒，就照上奏，不想皇上一定要召见张开东。在面圣那天，张开东特地添了件比较像样的衣服，太监将他引到皇上面前，皇帝一见他是个五十开外的土老头，知道他是个“十年寒窗下，苦无进身地”的人，就想破格赐他一个进士出身。问他愿不愿意做官，不想张开东是个怪人，他不愿做官；皇上又问：“不愿做官，想做什么？”张开东随极答道：“但愿游万县足矣。”也是机缘巧合，皇上正高兴，皇上见他一生所愿就是游遍华夏，就叫内监取出一个用金丝编织而成，外面表糊有黄绫，盖有皇上玉玺的灯笼。灯笼可以折迭起来收藏，打开就是一个漂亮的灯笼，皇上说：“你既不愿做官也不勉强，封你为‘海岳游人’赐你一金丝灯笼，见官大一级，遇州支俸，过府支粮，尽你周游全国三山五岳，惩处贪官污吏。”张开东便开始了他的游历生活。

金口惩税差

一天，张开东带着随身书童，雇了只小船，从武昌府出发，溯江西上巴陵，他们经过金口时，只见几十只

民船被拦在金水河里，不准出江，他连忙吩咐靠岸打听，原来是地方官绅在此设卡收税，并借机大肆盘剥乡民，沿江百姓倍受其苦。张开东知道这事后，就找来几个渔民商量一招。阳春三月，青山碧野，繁花似锦，这些税差们正在船中饮酒作乐，忽见一队船飞檐扬帆而来，他们好不欢喜，齐道：“油水来了。”便一齐出动，放下那拦河杠杆，逐船搜查，只见船上尽是黄土拌大粪，差役便向船上索钱，船上人回答：“一个铜子冒得给你们们的。”税差们大怒，将那一船船黄土大粪一顿乱捅，有的推入河中。正在这时，后面一艘民船高悬大清黄龙旗，船头上站着一个麻鞋道服的老人，手持盖着皇帝玉玺的“金丝灯笼”。税差们不知何处大员过境，连忙一齐下跪，只见张开东说：“前面闹什么事儿？”书童回禀：“是税卡征税！”张开东说：“皇太后种花用的粪土也征税？”书童说：“娘娘种花的粪土全被这些税差们捅得稀烂，有的推进河里去了。”张开东大怒说：“快将这些狗头乱棒打死！”税差们一个个叩得头破血流，只叫饶命。



张开东所著《白菀诗集》和《海岳文集》

张开东说：“如此，各打一百大板，杀杀威风再说。”每人一百大板打完，这些如狼似虎的税差一个个皮开肉绽，叫苦连天。以后再也不敢拦河征税了。

作画嫁女

张开东一生不爱钱财，有了钱就救济穷苦人，身边从无积蓄。他十八岁的独生闺女要出嫁了，他却为嫁妆犯了难。与之交好的毕制台知道他的情况，给他准备了一套比较像样的嫁妆，作为赠他女儿出嫁的礼物。张开东接受后从长江水路向蒲圻进发。船行至嘉鱼县鱼岳山下，看到一老妇人坐岸边啼哭。张开东瞧见甚觉可怜，就上前询问，原来老妇人有一女儿，最近要出嫁，由于没有钱置办嫁妆，所以啼哭。张开东听了十分同情，就叫船夫把毕制台送给他的一船嫁妆搬上岸，给了老妇人，自己坐着空船回到了家里。眼看着女儿出嫁的日子临近，自己的女儿给点什么作陪嫁呢？最后他决定画两幅中堂作为嫁妆。一幅画的是圆月亮，一幅画的是木炭。张开东所作书画甚有名气，当时有“神笔”张开东之称。远远望去，一轮满月熠熠生辉，一段木炭大火熊熊。她的女儿拿了一幅去当铺，要求当一百两银子。当铺先生是个识宝的人，二话不说即付银两。如此，婆家也不敢轻视了。

(赤壁市史志研究中心)



叶存仁（1710—1764）字心一，号墨村，咸宁人，寄居江夏。清代官员。历任礼部侍郎、河南巡抚、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尚书、河东河道总督。

不畏人知畏已知

咸宁历史悠久，自宋代建县已达千余年，勇毅笃行、耕读传家的传统思想根植在咸宁人的精神深处，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乏勤政廉洁的官吏故事。

《光绪咸宁县志》人物卷记载了一位鲜为人所知的咸宁籍，寄居江夏的官员，他就是叶存仁。摘录原文如下：叶存仁，生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字心、号墨村，寄籍江夏，遵营田例，议职州同。雍正四年受知礼部侍郎，王国炳保举河工效力，由县历厅，升江南、淮杨，洊升浙江、安徽、河南、广西潘皋，屡著贤声。二十七年擢刑部侍郎，与侍郎阿永阿审理四川南部县案件，二十八年补河南巡抚，又与侍郎阿定猷本县归州盗案，平允无冤，随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尚书、河东河道总督。仁居官甘淡泊不苟取，并蒙高宗纯皇帝御书秉宪额赐之。

叶存仁，雍正年间被补授江苏铜山县令，乾隆元年（1736年）升为邳睢河务同知，此后长期从事地方河道管理工作。不幸的是，乾隆十六年，有人揭发南河道历届道员侵吞库钱粮，叶存仁受株连被牵连在案，遭到免职。乾隆二十八年，他奉命勘察漳河水利。提出开引河、筑土坝、增护城河等建议，被采纳。

乾隆二十八年（1763）正月，河南巡抚胡实琬病逝，刑部右侍郎叶存仁受命代理。四月，乾隆选调他至湖北，奉命与侍郎阿求阿审定归州（今湖北秭归）张洪舜冤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纵盗冤良案。二人会勘此案，功劳不小，乾隆帝命叶存仁回河南任职，十一月，授河东河道总督，奉命审察排浚荆山桥河工程。提出疏通正、副河，使之分流入运河，同时续挑三处支河并加宽湖口闸、滚水石坝的具体方案，亦被采纳。当年十一月，河东河道总督张师载病逝，乾隆下旨，调叶存仁改督东河，这也是对叶存仁不畏强权查贪腐、开河筑坝治水利的奖赏。

叶存仁自小热爱读书，成人以后寄籍江夏，通过寒窗苦读取得功名，著有补拙诗集行世。清朝乾隆年间，他先后在安徽、河南等地，做官三十多年。在水利部、刑部任职期间，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从不收受下属馈送的礼品。

清代每年都要对朝廷外派的官员的文化水平进行评估，强调在廉政操守上优异，鼓励地方官员务实并实干，按照政绩大小，能力优劣安排职务，叶存仁自知年事已高，决定告老还乡。这天他从河南巡抚任上离任

时，部属们派船送行。但船工借口船坏了，需要维修，迟迟没有启程。直到夜半时分，船才开始缓慢前行。夜色中，岸边另有一艘小船快速追来。叶存仁正觉奇怪，细看之下才发现，船上竟是跟随自己多年的师爷。

师爷拱着手诚恳地说：“叶大人待我们恩重如山，实在无以为报，这是我们的一点儿心意，请叶大人无论如何也要收下。”叶存仁借着月光，看到船上几只沉重的大箱子，心里马上明白了。下属们知道叶存仁平时不会收礼，特地选在了晚上。都以为夜深人静，无人知晓，叶存仁一定盛情难却。

叶存仁看到下属们用心良苦，没忍心说他们，但坚决不肯收下赠礼。他让手下拿来笔墨，信手写道：

月白风清夜半时，扁舟相送故迟迟。

感君情重还君赠，不畏人知畏己知。

同仁们读过诗词，就理解了叶存仁的态度和想法，于是，带着礼品驾船返回了。

故事虽然简单，也诠释了做人为官的基本道理，重在慎独，才能流芳百世，万古垂青。诗的最后一句说得很明白：不是害怕别人知道，而是害怕自己知道。《大学》有言：“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意思是说，一个人的内心，一定会表现到外表上来。所以，哪怕是在独处的时候，也一定要谨慎。慎独，是一场战胜自我的修行。不自欺的人，即便独处时，也能诚实对待自己的内心，严于律己，谨守正道。

（万 默）

邱 峻（1858—1946） 字松樵，通城县五斗岭邱家屋人。清朝官员。光绪乙酉科举人，曾任刑部主事、通城县教谕，晚年隐居五峰山庄，耕读行医。

坚贞不屈 毁家抗日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1938年11月8日，通城县城被日军占领。邱峻携家眷避难于岳阳、临湘交界的大云山麓。

日军在占领通城后，为实行殖民统治，在通城组建维持会，企图以华治华。邱峻一生好学，博通经史，文章书法久重士林，医术高超，为人正派，在地方上声望极高。敌酋乌山想利用邱峻的声望，决定将邱峻扶为傀儡，便以官禄为饵，函请他出山“维持”。邱峻以年迈为由，予以拒绝。为防止日军的骚扰和报复，邱峻带家眷躲入深山。

敌酋派人恫吓说：“你出来维持，生命财产都有保障，还可以授予高官厚禄。否则，不但你的家族不能保全，地方也会因你受累。”

邱峻回复乌山说：“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袁粲父子是南北朝时期宋朝的忠臣，褚渊是宋朝的叛臣。袁粲与褚渊同为明帝的大臣。明帝崩逝，太子即位，萧道成弑帝自立，袁粲欲诛萧道成，褚渊泄露其计划，结果袁粲父子为萧道成所杀。邱峻以此回复表示决不屈服日酋威胁要挟。

敌酋乌山气急败坏，派人烧掉了邱峻五峰山庄暮庐部分房屋，并派人给邱峻传信说：“如你觉得自己年老，实在不愿意出来，派你的儿子邱士鼎出山‘维持’也可以。不然，不但要把你的房子烧掉，而且要烧掉你全族——邱家屋的房子。”

邱峻对长子邱士鼎告诫说：“我们是中国人，决不能为日本人办事。我年老，不能杀贼，但决不认贼作父；尔辈应献身报国，以马革裹尸疆场为快！”

日军见引诱威逼无用，便到处搜捕邱峻。为了摆脱日寇的搜捕，邱峻被迫东躲西藏，逃入深山。

1939年2月，日本兵来到邱家屋，烧杀掳掠，大肆纵火，不仅邱峻所住五峰山庄房屋及藏书、著作付之一炬，邱家屋场也全部化为灰烬，而且殃及全村。

事后，邱峻赋诗明志：白发萧萧耄耋年，犹思报国扫狼烟。鹤媒耻作甘鸿仆，玉碎宁为不瓦全。丑虏必然趋末日，铜驼定得见光天。儿曹匪懈闻鸡舞，雪耻毋忘着祖鞭。

(冯立群)



张绍旭（1860—卒年不详）字煦初，咸安区汀泗桥镇彭碑村人。清末官员。光绪年间考中举人，其后曾两次出任河南省荥阳县（今郑州市下辖的荥阳市）知县，在知县任上“实心实政，教养并举”“计划深长，规模宏远”，努力使荥阳人人自立知能，

至今仍深得荥阳人民的爱戴。

61

张
绍
旭

一个在河南廉政勤政播种文明的咸安人

一个在河南廉政勤政 播种文明的咸安人

咸安区有个在河南廉政勤政、播种文明的人——张绍旭。上任之初，即大力兴学、开启民智。经过一年准备，荥阳真正意义的新式学校——荥阳高等小学于1902年招生开学。在学校筹建中，他亲自选校址，丈量土地，指挥建筑，捐资购教材，聘请校长、教师。此后，又开办师范传习所，并附设初等小学。校生分官费和自费。官费毕业后，分派四乡，充小学教员；自费毕业发文凭，并适时给予教授之职。邻近县有向学者，纷纷迁来荥阳，方便上学。此举为河南各州、县创办新学树立了榜样。除办学外，他自掏腰包购置新书新报，无

论城乡士绅，发现有留心时势的就以书报相赠。同时派人到汉口等地采办新书，置于县衙部门，原价出售；捐时报置于人口密集地区，供人无偿阅读，以广荥阳人见闻。

为荥阳经济社会发展培植人才，张绍旭慨然捐资，选派可造之人外出游学、留学，“时则有韩凤楼（民国早期高级将领，曾先后率部参加护国运动、讨伐张勋）、张鸛翎（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是朱德、叶挺在云南讲武堂学习时的老师）、马学骥学军事于日本；楚纬经（曾任国会议员、汉中道尹）、张星灿学师范，马骏、李芳春学农业于保定，蔡绍通学蚕桑于清化；其他如天津工艺、本省法政、巡警，莫不有人。”他曾对人说，荥阳虽小，但人才贮备丰富，十年后荥阳最会出现新气象。张绍旭资助出外游学的学生到底有多少，据不完全统计大概有数百人。与此同时，在他的筹划下，创办自治传习所、宣讲所、养蚕传习所、中等蚕桑实业学堂、公立工艺学堂、女子学堂、简易师范学堂等种种新政，为振兴荥阳经济社会事业培养各类实用人才。这些实用人才和那些外出游学人才后来都为荥阳的经济社会进步做出了很大贡献。

荥阳为半山半川之地。张绍旭到任之初，即劝民凿井备旱。因多种原因，县民没有行动。于是他命人从天津购来抽水机，并严令各村长调查水利设施情况，造出详细的清册，以备区划。出台政策，有志无力者，可以

被担保，待丰收后，以粮食抵还。在他的努力下，荥阳的水利设施日趋完备。

同时，他命人从湖南购买麻种、茶籽、引进种植；号召城关居民充分利用城脚、道旁、沟畔等闲散地带种树造林；根据地下水资源的多少不同，浅水区凿井灌溉，缺水山乡种柿、栽桑；派人去天津学习织细布、毛巾、掐辫等技术，并买回机器，成立工艺局，发展地方工业；利用南大寺（在现在的老城中医院东侧）设立“罪犯习艺所”，组织犯人织布、磨面，使他们衣食丰足。经过张绍旭的多年努力，荥阳的其他百业同教育一样，成效显著。至1920年代前后，荥阳县城附近的养蚕缫丝，遇隆镇（今荥阳市豫龙镇）的草帽业，崔庙镇的采煤、柿饼，贾峪镇的砖瓦灰石，都远近闻名。当时，豫西流传有这样的口头禅：“荥阳三大产，草帽、柿子和教员。”

张绍旭家境富裕，但没有富裕人家的坏毛病。德政碑记“先生家本素封，而自奉甚俭。敝衣疏食，不畜姬妾，子弟浪费一钱必遭呵责。”“政暇手不释卷，於经史子集外，最喜阅西儒法政诸书。”“事无巨细，必尽心经营，如学校屋宇之建造、器具之制造，皆亲自监视指导，求坚可经久。”不仅如此，他还为荥阳的发展捐出大量家财，至于捐了多少现已无法统计。但据不完全统计，仅资助学生游学、购置书籍就有不少于七八千金（相当于现在的六七百万元）。其捐赠的家财除了买田地

用于办学堂、工艺局外，主要用于置办书籍开启民智。据《荥阳县志》记载，张绍旭捐资置办的书籍：经部 62 种 3019 册，史部 118 种 1539 册，子部 56 种 351 册，集部 13 种 215 册，另有捐赠给学校的书籍 122 种 729 册。

张绍旭在荥阳施行卓有成效的德政，让荥阳人对他一直敬爱有加。张绍旭在世时，荥阳人为他建纪念祠堂、立德政碑。1921 年（民国十年），隐退后的张绍旭回荥阳时，荥阳各界几百人欢迎他，以与他合影为荣。现在荥阳市政府网站有专门介绍张绍旭的文章。荥阳市稍稍知道点近代史的人，谈起张绍旭总是满怀敬意和感恩之心。河南安阳市副市长王新亭在任荥阳市市长时把

赞颂张绍旭的德政碑碑文悬挂在办公室里，外派挂职亦随带悬挂，把张绍旭当作他为官的楷模。在一次全市干部大会上，他说：“张绍旭先生对荥阳人民的思想解放，对荥阳教育和实业的宏远规划，成就了清末民国间荥阳的一次振兴，今日荥阳的发展是张先生启蒙的余绪，应该光而大之。”

（吴见知）



荥阳县人民为张绍旭先生立的德政碑



石 瑛（1878—1943）字
衡青，通山县燕厦乡人。近代
民主革命家。1921 年任临时大
总统秘书。同年，被选为国会
众议院议员。1924 年 1 月，在
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
中央执行委员。1927 年后，历
任上海兵工厂厂长、湖北省建设厅厅长、武汉大学工学
院院长、浙江省建设厅厅长、南京市市长、湖北省临时
参议会议长等职。被誉为“布衣市长”“民国第一清
官”。

民国第一清官石瑛

石瑛，是湖北“三怪”之一（与民政厅长严重、财
政厅长张难先并称为“湖北三怪”）。一生特立独行，廉
洁奉公，做出了许多“不合世俗”人情的事情。他力抗
权贵、俭仆为民的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

刚正不阿

石瑛于 1932 年就任南京市市长，当时的市长并不
好当，特别是财政十分困难。一日，人称“龚大炮”的
《救国报》记者龚德柏问石瑛：“石市长，你说过南京市

的税收几乎等于零，请问，你将如何收税？先从什么人收起？”石瑛回答：“凡应交税之人，都应在取税之列，不管是什么人，绝无特权，你们可拭目以待。”龚德柏说：“石市长，我不仅听其言，更要观其行。我龚大炮今天再放一炮，你会不会如前几任一样，施政演说天花乱坠，最终是搜刮民财，自家盆满钵盈，一走了之，为南京老百姓留下重重的债务。而今，南京处在日本的炮口下，只怕是大炮一响，逃跑的是长官。”石瑛大声回答：“我要是贪污一分一文，就是王八蛋！”秘书长赖连告诉龚德柏：“石市长最痛恨贪污，欢迎新闻界监督。”

不久，石瑛把收税作为治理南京的第一步。他知道自1927年南京被定为国民政府首府后，中央机关迁入，富商、官商、洋行、买办、银行都转移到南京，官商及有政治关系的人发财，并逃避税务。而小工商户则破产、失业。要治理就先得将富商的税收起来，对小工商户必须减免税捐，扶持发展。谁胜任这项工作呢？石瑛首先想到了政法出身、精明过人、一身正气、廉洁奉公的胡忠明。没想到胡忠明深知南京税官要与权贵们争斗，不赔命也要丢官，坚决不答应，石瑛两次上门都碰了壁。他回到办公室，想来想去，还是觉得没人比得上胡忠明。

晚上，石瑛在办公室里思索着，问勤务兵小姜：“小姜，有人想当官，有人不想当官，你说怎么办？”小姜回答：“还有人不想当官？那可能是好人，不想当官发财，那就非要叫他当官。”听了这话，尽管是半夜，石

瑛仍向胡忠民家走去。石瑛半夜登门，将收税对于建设南京、对于中国革命、对于抗日的重要性和意义说得人情入理。这种忧国忧民的思想打动了胡忠民，终于答应上任南京税务局长。

胡忠民上任后，石瑛帮助他招收一批积极青年担任税收员，开始工作。先是集中“炮火”大造声势，在报纸上登载市政府的“清查房产契约”“催缴捐款”，并同步登载“减免小工商税捐”的决定，然后就到官商巨富家收税。

一日，税收员来到孔祥熙家，递上缴税通知单，他家的孔小姐不屑一顾地说：“收税？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税收员回答：“我看清了，这是孔财长府上。”孔小姐骂道：“你怕是瞎了眼睛，看清了还来我们家收税？”边骂边将通知单扯丢在地，又加上一句：“快滚，不然叫人打死你！”这是石瑛预料中的事。接着胡忠民带着记者上门，孔小姐说：“哪个来也不缴。”胡忠明说：“孔小姐，国有税法，南京不收税怎么建设，作为党国要员，更要有爱国之心，你们交了，就可带动所有人，这不交税的意图不会是孔财长的意思吧！”

孔小姐回答：“他才不管这些小事！”听胡忠民这么一说，加之有记者在场，孔小姐开始有些犹豫，这孔家抗税，一旦宣扬出去总不是个好名声。这时屋里传来宋霭龄的声音，孔小姐进了屋，不一会就交了3000多银圆的税款。

1934年孔祥熙在拨给南京市的经费中取消了铁道

部给南京市的协助款 12 万元，当时南京市经费困难，正“等米下锅”。一日，正值国民党开会，石瑛挡住了孔祥熙，问：“你为什么取消铁路部给南京市的协助款？”孔祥熙见石瑛来势汹汹，心中不安地回答：“经费困难。”石瑛驳斥道：“南京大到政府机关，小到一般职员，有多少负担，你知道吗？”孔祥熙联想到收税一事，说：“南京的税捐不是很可观吗？”石瑛怒火中烧，道：“是的，不过你要知道，南京市全年的财政收入还不到你家产的百分之一！”随即抓起一个墨盒，朝孔祥熙摔去，孔祥熙的外国毛料西服顿时成了彩服，石瑛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

俭朴为民

石瑛一生勤奋干事，朴素节俭，自用针线补袜，乘火车坐硬席，搭轮船坐统舱，下乡便装简从。抗战困难时期，自己种菜吃杂粮。他常常独自外出调查，为百姓办实事，如除水患、修公路、办工厂、建学堂，一心走“实业救国”之路。

1934 年，石瑛踏上回家行程，路过大冶，本没通知政府，未想到被大冶政府知道了，大冶县长硬是办了酒席为石瑛洗尘。吃完饭，石瑛当即付钱，县长抢着付，石瑛说：“你的薪水有我多吗？”硬是付了钱。到了阳新，县府杀了一头小牛，用十八个菜为他接风，石瑛走进餐厅，见满桌是菜，怒从心起，说：“目前灾情严



位于武汉市昙华林的石瑛故居

重，百姓苦不堪言，已经饿死不少人，你们这样大摆盛宴，吃得下肚吗？又枉杀一头小牛，罪过啊！”说完，愤然离去。他来到县衙后面一条小巷里的小吃店，叫了一碗芥菜粥吃了起来。

石瑛寄回通山老家的东西多半是书，有十八箱。“文化大革命”搜家，搜家的人认为这么大的官，家里肯定有不少金银财宝，他们一箱一箱打开，所见的全是书籍。听到最后一箱里面响叮咚的，惊喜地认为是金银宝物，开启后却发现全是工具，原来是他当年“实业救国”办工厂时用的工具。

石瑛对老百姓和蔼可亲，急人之急，被称为“布衣市长”、“可亲可敬的长者”。他历任要职，可谓高官厚禄，可是他布衣粗食，坐车坐三等、乘船坐统舱，一生

廉洁奉公、安贫如素，不拿公家一针一线，被誉为“民国第一清官”。他病危时对家人说：“我是不同流合污。我如同流合污不至如此，但我还能如此，是他们把我无法。”

(通山县史志研究中心)



董必武（1886—1975）原名董贤琮，字洁畲，号壁伍，湖北红安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奠基者。历任中共汉口地委书记、湖北省政府常务委员兼农工厅厅长、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

共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兼任中国法学研究会和政治学会会长、中共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等职。

71

董

必

武

董必武的家书

董必武的家书

因战争原因，董必武有位堂弟定居在崇阳县华陂公社。新中国成立后，他与堂弟通过书信取得联系。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董必武，在家书中，以一个兄长的身份，从生活细微处入手，娓娓道来，小中见大，字里行间折射出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怀和清廉作风，既饱含浓浓的亲情，又言传影响亲人。

董必武在1951年回复堂弟请托求职的一封家书中强调：革命的目的是求得人民的解放，特别是工人农民劳动大众的解放，假使农村的事情办得不好，革命的果实农民就不能完全享受得到。他还要求堂弟要利用自己

识字的优势去帮助当地政府做一些工作。他在信中劝导堂弟：“弟努力生产、帮助政府收粮，均获成绩，得到奖励很好。农村有劳动模范，弟努力生产，可争取作一个模范，不要抛弃工作已有根基的地方。目前来北京没有必要，我今年虽满六十五岁，还能为人民做些事。你努力生产，一方面为你一家的生活好，另一方面为国家增产纳税以报效国家。”从信的大致内容来看，他始终牵挂的是人民群众，还有对堂弟取得成绩的欣慰和要扎根农村作出奉献的劝导。

董必武虽然没有答应堂弟的请托安排工作，但他时刻关心着堂弟的生产生活情况。1952年2月，董必武给堂弟寄来《农业生产》月刊的合订本一册和一本《四季蔬菜栽培技法》，并购买新的棉花种子一斤给堂弟试种。他叮嘱堂弟说：“你在农业生产方面已积累了一些经验，只要勤耕苦作，和当地农民搞好关系，加入互助组和合作社，和其他农民一道都有生路。”

1954年，崇阳遭遇特大水灾，董必武堂弟再次写信要他给予特殊照顾。他是这样说的：“今年我们国家遭受水灾的地方较多，有些地方灾情较重，政府会有一定的帮助和救济，但受灾人口多，救济有限，主要还是靠自身通过努力生产去渡过灾荒。”他告诫堂弟说：“请你注意，现在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在国家机关工作的人必须为



1954年2月13日董必武给堂弟董贤照写的信

为人民服务，除了法律规定的职权外，任何人没有特权。”最后，他从自己的生活费中挤出一点资金寄给堂弟，并说自己没有更多的力量来帮助堂弟，要求堂弟通过互助组的力量来解决困难。他还强调另一位至亲在北京都住一年半了，也没给予安排工作。

从董必武的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始终将自己视为人民的公仆，把革命的胜利视为人民的胜利，不徇私利，廉洁奉公，始终坚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庞宇峰）



钱亦石（1889—1938）又名定城，字介磐，咸安区马桥镇钱庄村人。现代著名社会学家。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钱亦石一生勤于教书育人，被誉为“红色教育家”。历任湖北省教育厅科员，武昌高师附小教导主任，武汉中学、湖北女师、上海政法大学和暨南大学教师；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党团书记、第八集团军服务队少将队长等职。

清苦治学的红色教授

为救国兴办教育

新文化运动期间，社会上都流行“革命救国”“实业救国”，钱亦石却钟情于“教育救国”。1920年夏，钱亦石以优秀成绩毕业于武昌高师，被湖北省教育厅录用为科员。本着以教育救国的思想，致力普及和革新教育事业。钱亦石在教育厅任职不久，即以精明强干、案无积牍而受到称赞。但是，他最热心的却是教育实践。他的家乡咸宁钱家庄是一个丘陵地区，教育落后，没有学堂，只有私塾。1920年下半年，他支持创办了云庄学校。校门上题着一副“云程而上万里，庄岳之间数

年”对联，激励学生奋发向上。1921年，钱亦石与高等师范校友兴办共进中学和共进书社。同年，钱亦石也被聘为湖北省立第一师范伦理教员和湖北省女师教员，并同陈潭秋等组织湖北新教育社，出版《湖北新教育》。钱亦石还经常在黄负生等人主编的“以改进湖北省教育及社会为宗旨”的《武昌星期评论》上撰文，调查研究湖北教育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倡导普及革新教育。他在《湖北教育经费调查》一文中指出：湖北教育事业不振，原因复杂，就经费而论，数目太少，支配不当，而有人自便图私，从中侵蚀，便是一个主要原因。他列出省教育经费开支的详细数字，以期引起各方人士的关注，给教育一线生机。

热心帮助纾难解困

钱亦石经常自掏腰包资助贫困学生，动用各种社会关系帮助革命青年解决困难。

1923年下半年，钱瑛挣脱封建婚姻枷锁，逃到武汉想报考湖北女师，可她人生地不熟，入学无门。她便去找当时任武昌高师附小教导主任、武昌中华大学教员、自己的老乡钱亦石。钱瑛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钱亦石，钱亦石对这位才华横溢、富有反抗精神的族女非常喜爱和器重，他热情鼓励钱瑛报考湖北女师，并自己出资为钱瑛提供了食宿、补习条件。在钱亦石的帮助下，钱瑛参加了湖北女师的入学考试，考试成绩超群拔萃。可在入学体检时发现因曾经裹足显示畸形，以不便参加

体育锻炼为由将她拒之门外。由于此前钱亦石曾在湖北职业教育研究社、湖北平民教育促进会担任过董事，说服了校方，将钱瑛以第二名的成绩录取进入省女师读书。

何功伟在湖北省立高级中学读书期间由于积极领导学生救国运动，被国民党反动政府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国民党的便衣特务在省高门口守株待兔，要将何功伟捉拿归案，情势十分危急。何功伟为躲避国民党的追捕，连夜从武汉赶到上海，找到钱亦石。钱亦石听完何功伟讲述事情经过后，觉得这个年轻人是个可用之才，便对他说：“你还年轻，连高中毕业证都没有，更谈不上上大学了。你有读书的天赋，书还是要读的。这样，秋季开学你先去读一年高三，明年再考大学。现在我给你找份恰当的工作做一做。”不久，钱亦石将何功伟作为湖北学联的代表介绍到全国学联工作，担任了全国学联的常委。何功伟一边读书，一边干工作，以学生身份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

红色家风永留传

钱亦石一生清贫，1928年他因遭国民党反动派通缉去了日本，其夫人王德训携家返回咸宁县桂花镇乡下，靠亲友资助艰苦度日。直到1930年钱亦石回国后，全家人才到上海定居。夫妇两个加上四个孩子租住在狭小的弄堂房里，生活非常拮据。这时钱亦石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工作更为繁忙，经常有地下党的同志在家



位于咸安区马桥镇的钱亦石故居

中秘会或隐蔽。为照顾好革命战友，钱亦石一家尽可能地节衣缩食，对同志们热忱款待。“九一八”事变后，陈潭秋从东北脱险到沪，董必武从苏联回来，他们在上海隐蔽期间，钱亦石及家人天天为他们送饭。在钱亦石的带领下，他的家人耳濡目染，深受熏陶，支持他的革命活动。夫人王德训相夫教子，操持家务，带着儿子钱远铎、钱远镜及女儿钱韵玲为同志们烧水做饭，浆衣洗裳，望风放哨，有时还为他们传递密信。1938年，钱亦石病故。考虑到钱亦石一生清贫，党组织对他的家人在上海给予一定的安排照顾。王德训虽生活艰苦，但她拒绝了组织照顾，毅然与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的次子钱远镜一起回咸宁开展抗日活动。在咸宁抗日根据地，王德训尽力替游击战士料理生活。移居桂花仙人墩后，中共鄂南特委机关就设在她家里。一次，她为掩护同志转移，拖着缠过的小脚走了两天两夜，后来实在走

不动了，硬是连走带爬坚持到达目的地。在抗日根据地，她深受同志们的尊敬，被大家亲切地称为“钱妈妈”。不久，钱远镜组织起一支抗日游击队，率领部队与敌人进行殊死搏斗，终因敌强我弱，在日寇的疯狂扫荡中，因弹尽粮绝，不幸牺牲。

(刘明恒)



华鄂阳（1895—1930）原名华允臣，通山县燕厦人。革命烈士。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通山县第一个共产党员。1925年9月受党组织的派遣，赴湖南筹建“湖南省济难总会”，任总会执行委员。1927年到江西从事革命活动，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委员、九江中心县委书记等职。1930年7月被以“改组派”罪名错杀，新中国成立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十块银元

1926年1月的一天，夜已深了，可华灿光怎么也睡不着。他是去年9月被儿子华鄂阳接来长沙同住的，说是尽人子之孝，可快半年了，和他同桌吃饭的日子很少，儿子每天天一亮就出门，半夜才回家。华灿光感到很孤单。

一天深夜，华鄂阳头戴礼帽，身穿长棉袍，急匆匆地回家后便悄悄地进了里屋。华灿光盯着问他：“狗子（华鄂阳的乳名），你这个洋学生当上了湖南济难会会长这么大的官，怎么成天不归家？”

华鄂阳一笑：“阿爷（爸爸），当共产党的官不同于当国民党的官只享清福啊，我这个济难会会长就是救济有难的人的，没得闲的啊！”

华鄂阳将在长沙召开万人公葬大会，自己披麻戴孝将被军阀杀害的著名工人运动领袖黄爱、庞人铨的遗骸，移棺厚葬于岳麓山的事告诉了父亲。他动情地说道：“民众赤手空拳地与军警持斗，不少人牺牲了，不少人坐牢了，剩下家中的妻儿老小只能靠讨饭过日子，我们济难会就是号召民众捐钱捐物，救助这些仁人志士家属的。最近就是忙于将因为声援“青沪惨案”而被捕的一百多名学生救出来后，秘密送往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或黄埔军校。你看，这就是我们今天从民众当中募捐来的银元。只是需要救济的人太多，僧多粥少啊！阿爷，您也将家里的田卖几亩，捐点钱吧！”

没想到华灿光一口回绝：“那是我们华家的保命田，还想攒点钱再多买点田地呢！”

“共产党的主张就是打土豪分田地……”

没容儿子说完，华灿光将手一挥，斩钉截铁地说：“不管这主张那主张，我的主张就是只要我还活着，家里的田地就是老子的，我死了才是你鄂阳的。”

华鄂阳是个孝子，父母送他读书、留洋的养育之恩一直未报，他也从不敢违背父亲的意愿。华鄂阳将募捐来的银元放进柜子锁好后，华灿光忽然改了一种语气对他说道：“狗子，这么多银元可得锁好啊，这进出都是有账的吧，以后就让我替你守着吧！”

华鄂阳想了想觉得也好，有老父亲看护那就是铁将军把门了，便将房间和柜子的钥匙交给了他，并叮嘱父亲一定要看牢。

到了6月底，华灿光提出要回老家去，便将钥匙交

还给了华鄂阳。也是巧，适逢月底济难会盘点库存，华鄂阳叫来济难会的庶务一起，一直清点到天亮，就是少了十块银元。父亲是管库的。精细的父亲是不可能出差错的。是少收多记了，还是多发少记了？看着急得满头大汗的华鄂阳，蔗务说：“会长，极有可能是那天救助一百名出狱的学生时出现了差错，要不我再找几个被救济的对象打张领条冲账吧！”没想到华鄂阳却严肃地说道：“即使是错发了，也应该由我个人负责，你在盘存表上写上华鄂阳遗失银元十块，日后我再补上。”

父亲明天就要启程回通山老家了，作为儿子，无论有多忙也得挤出时间送送老人家。当天夜里，华鄂阳替父亲打点行装，忽然从一件夹袄的口袋里发现了十五块银元，可自己明明只给父亲五块银元做盘缠，怎么多出了十元呢？面对着一脸疑惑的儿子，华灿光说：“十块银元有多大的事？是我从库房里拿来的。”

华鄂阳其实早就猜出了个八九分，他轻轻地对父亲说：“这是救苦救难的钱，都是别人捐的，我们一个子都不能动的啊！”

华灿光理直气壮地问道：“你现在是大官了，能救济别人，就不能救济一下我吗？”

华鄂阳劝说道：“阿爷，我们家里有田四十担（合28亩）了，还需要救济吗？共产党是最讲规矩的，动了这钱不但我要赔，而且人家还要说你的儿子做人不清白，当这个会长不够格，弄得不好，我可能就要被撤职处理的，您老人家就不心痛？！”

华灿光惊骇了：“你们共产党就这么严格吗？！”

华鄂阳回答道：“阿爷，共产党不严格能赢得民心吗？我只能给您五块银元，还是我从同事那里借来的，至于孝敬您老人家，以后日子长，我不会有辱华家脸面的。”

华灿光退还了十块银元，又给儿子丢下了一句话：“像这种穷富豪，只有你才肯当！”

（杨华美）

戴德昌（1895—1935）通山县厦铺镇人。革命烈士。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冷水坪党小组组长、厦铺区委委员、修武崇通边区委组织部长、修武崇通县委委员、县苏维埃政府主席。

不沾一粒红军粮

83

戴德昌，出生于通山县厦铺镇芦坪戴一个农民家庭，八岁丧父，由族兄戴义龙抚养，从族兄习武，后入蒙馆、经馆读书8年。1924年，与堂弟戴福昌一道外出经商，先后到过武汉、洪湖等地，接触并被革命思潮所影响。

1926年春，戴德昌和堂弟一起回到家乡，春节期间，中共镇南中学支部党员吉梦来前往他家，两人一见如故，并经吉梦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初夏，中共冷水坪党小组成立，任小组长。他与其他党员一同走村串户，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农民自卫队，并担任队长。北伐军入鄂后，带领农协会员和自卫队员到冷水坪、藕塘、厦铺、杨芳林一带打击土豪劣绅，开仓分粮。1927年8月底，率约百余人的厦铺农军参加通山秋收暴动，攻打县城。

1927年9月，秋收暴动失败后的中共通山县委化整为零，分散到各处做群众工作，扩大党组织。10月，中共冷水坪小组改为中共冷水坪支部，戴德昌任书记。1928年春夏，戴德昌与中共通山县委取得联系，并加

戴

德

昌

不沾一粒红军粮

入县游击大队。1929年秋，受通山县委派遣，再次回到家乡领导革命，任中共厦铺区委委员，带领广大农民分田地，建立区乡农民赤卫队，办学校，建工厂，拥红扩红……大力发展厦铺苏区。



戴德昌故居芦坪

1931年2月，中共修武崇通边区委员会和修武崇通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戴德昌任边区委组织部长。1932年7月，任中共修武崇通县委委员、县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在县苏维埃政府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县苏维埃政府主席。

戴德昌当上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后，更加呕心沥血地工作。他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亲自带领山民开荒种粮，对山中冷浸田研究改进耕作方法，还动员群众贮存干笋、干菜、薯丝、薯片和能食用的野果野菜，贮粮备荒、备战；他重视经济建设，办纸厂，办榨坊，办茶场，办商店，适时组织小秋收，组织各种副业生产，千

千方百计增加群众经济收入，筹集资金、食粮支援红军。

在拥红扩红工作中，戴德昌亲自动员自己的亲戚应征入伍，让妻子纺线、做军鞋，动员老父亲变卖家产、拿出积蓄支援红军。戴德昌的行动带动了大家，1932年底，冷水坪地区一次送优秀青年30余人参加红三师，上交大洋数百元，军粮百余担，军鞋500余双。冷水坪苏区成为鄂南苏区巩固可靠的根据地。

道委机关迁入冷水坪地区后，身为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戴德昌担子更重了，他亲自安排红军后勤机关驻地，动员群众节约粮食和物资，以保证红军的供给。他让自己的亲属住进茅棚，腾出房子给红军伤病员住。他全家带头吃薯渣、野菜，省下粮食给红军吃。他一生只有一个孩子，是个女孩，名叫秀君。俗话说：“米是穷人的大荤。”由于自家的粮食都捐献给了县苏维埃政府，

缺少营养，七岁的秀君发高烧几天几夜。但是，戴德昌一边看着自己的孩子奄奄一息，一边看着自己所掌管的十余万斤公粮，想着前线浴血奋战的红军战士，硬是没有动用一粒军粮给孩子吃。县委其他领导知道情况后，给孩子送来了一碗米粥时，他7



冷水坪革命烈士纪念塔

岁的女儿已离开了人世。

1935年，在国民党的重重包围之下，冷水坪根据地已非常艰难。同年4月，为减轻冷水坪根据地压力，他率二十余独立团战士到外围作战，途中与敌人遭遇，因敌我力量悬殊，全部壮烈牺牲。

(通山县史志研究中心)

钱仲衡（1897—1947） 又名钱钧，咸安区马桥镇钱庄人。开明绅士。在民国时期曾三次出任县长（其中两次是应共产党之邀出任县长），虽然每一次任期都不长，但留下了廉政、勤政、爱民的好名声。

开明士绅廉勤县长

钱仲衡出生于一个书香家庭，毕业于湖北省第一师范学校。他在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与共产党人吴德峰（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武汉市市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友善，又加上受与之感情甚笃的堂兄钱亦石（共产党湖北党部早期创始人、被董必武称为“红色教育家”）的影响，因此，思想正直、开明、进步，心系民众。

1926年8月北伐军攻取咸宁县城后，中共湖北地区执行委员、国民党湖北省党部鄂南特派员、中共咸宁县特别支部书记聂洪钧等人取缔受“孙文主义学会”操纵的地方豪绅组成的国民党咸宁县党部，赶走了反动县长镇泮香。对于临时县长的人选，中共咸宁县特别支部十分慎重，认为，一方面这人选要听从党的领导和指挥，不能独断专行；另一方面又要能在地主和富商中筹粮以应军需，筹钱维持县财政开支。经过反复比较，认为绅士钱仲衡比较合适。在临时召开的咸宁各界各团体代表联系会议上，钱仲衡当选临时县长。

钱仲衡上任后，果然不负众望，工作勤勉，带人一家家上门做工作，讲革命形势和发展趋势，利用自己在

地主豪绅中的威望很快筹集一批钱粮，解决了部队的急需。在此过程中，他要求给每家开收条，不许漏掉一家，做好进出账册，坚决不漏一笔，对钱粮严加看管，不准私拿钱粮回家，任何人动用钱粮都须经他同意。同时要求县政府、县议会节约开支，不得乱花钱粮。有县政府工作人员建议他弄点提成和辛劳费，说前任都是这么干的，被他严厉斥责，不敢再提此事。有个下属甚至偷偷把钱粮送到他家里，他发现后，责令那个下属立即如数取回归还县政府。他约束县政府工作人员不要将手伸到粮库、钱庄，不得搞敲诈勒索，特别是不能对百姓搜刮劫掠，违者严惩。征集来的钱粮很快就交由农民协会组织支前运输队送往北伐前线，保证了北伐军攻打武昌之所需。

他平易近人，主动联系老百姓，询问农民和县城居民的生产生活情况，与出入县政府的百姓称兄道弟，尽其所能地帮他们解决遇到的困难。在他任咸宁县县长的四五个月里，县议会、县政府人员中饱私囊，利用公款吃喝玩乐的现象不见了。

1927年1月，钱仲衡辞去临时县长职务，被湖北省政务委员会调到南漳县任县长。到南漳县后，钱仲衡仍保持清正廉洁、平易近人的作风。当地不少豪绅为巴结这位新来的县太爷，请他吃饭，送他厚礼，都被他委婉而又坚决地拒绝了。为此，有的土豪劣绅在一些事情上故意为难他，想让他知难而退，与他们同流合污，但他坚如磐石，坚守一个知识分子心中的正义和理想。他经常深入民间访贫问苦。为更好地了解民情，他有时特

地在百姓家吃饭，但坚决不让百姓弄酒肉招待，百姓日常吃什么他就吃什么，而且饭后付钱。在处理政务时，总是秉公办理，决不收入钱财，并且多从百姓利益出发。南漳县民众看到了一个不同的颇受人爱戴的县长，不少民众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

可惜不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反动分子和国民党军队在县里横行。目睹了国民党官场腐败、黑暗的钱仲衡回省政务委员会述职后，毅然弃官经商，不久又弃商去咸宁县中心小学任教。

1945年3月，中国共产党咸通阳抗日根据地在大幕井头周召开县政务委员会选举大会。抗战期间多次不顾自身安危掩护鄂南和咸宁党组织开展工作，并受党的委托开展统战工作的钱仲衡被选为县政务委员会主席（即县长）。当选县政务委员会主席后，钱仲衡即紧锣密鼓地开展工作，走村串户指导农民生产，同时积极组织军民生产资料和生活物资的运输购销供应。他还抱病奔走各地，争取团结各界人士，支持抗日游击战争。有人建议他坐轿前往各地，被他谢绝。他说，这会增加县政务委员会的开支，一切要以节约为本，只要还能走，就决不坐轿。他还说，大家都是平等的人，凭什么他们抬轿而我坐轿，难道我的脚不是用来走路的。

6月25日，王震、王首道、张体学等率领南下支队和新四军第四军分区主力，进驻南川董家祠堂和茶地铺郭家祠堂一带休整。休整期间，部队4000多人的粮食供应发生困难，县委决定由县政务委员会主席钱仲衡与县委书记雷同各带一支人马筹粮。钱仲衡带着自卫队



湘鄂赣边军区司令部遗址全景（郭家祠堂）

长钱济民等起早贪黑，四处奔波为部队筹粮筹款。在筹粮筹款时，他始终本着俭朴节约的原则，带头伙食从简、降低薪酬，以节省开支。他说，这样既可以尽可能保障部队的需要，又可减少民众的税赋。在县委、县政务委员会的共同努力下，部队顺利度过了粮荒。

抗战胜利后，中原突围前，钱仲衡根据党组织安排留在汉口隐蔽治病。1946年冬，痛恨贪官污吏的钱仲衡得知咸宁部分学生来武汉控告县长李慧谿贪污，捐款解决这些学生的栈房钱，李慧谿终被撤职查办。

1947年3月，这位廉勤县长在家乡病逝。

（吴见知）



叶重开（1898—1928）名敬堂，崇阳县石城镇人。革命烈士。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 8 月，领导崇阳洪下暴动，并参加指挥通城暴动，后参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1928 年 1 月，在江西遂川的一次战斗中牺牲。

91

赤子红心叶重开

变卖家产干农运

1926 年 8 月 24 日，北伐军攻克崇阳县城后，某团留下党代表车若愚及政工人员匡超然，协助中共崇阳党组织在大沙坪和县城发展党员、组织农民协会。当时在大沙坪福音堂小学任教的叶重开由于受本邑共产党员杨白的影响，对共产主义充满向往。发展党员、组织农民协会都是需要一定活动经费的，为了尽快地将农民群众组织发动起来、把农协会办好，叶重开不顾家人反对，硬是将家中 40 亩水田变卖了几百银元，资助农会开展活动。由于他的大力支持，沙坪农协会很快建立起来，农运工作开展也非常顺利，他本人也经受了组织考验。不久，经匡超然介绍，叶重开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

叶

重

开

赤子红心叶重开

叶重开协助匡超然在大沙坪建立了中共大沙坪支部。

1927年5月初，反动军官夏斗寅宣布与共产党决裂，不顾中共与武汉国民政府合作大局，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率部攻击武昌。被叶挺率部击溃后，其残部窜入崇阳，疯狂镇压革命党人和革命群众。为保存和发展工农武装力量，应对反动派对工农革命运动的反扑，中共崇阳县委根据中共湖北省委、省农协第七次常委会关于加强农民武装建设的指示精神，于5月20日成立崇阳县农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将县保卫总团和大沙坪保卫团合并，组建“崇阳农民自卫军”（以下简称“崇阳农军”）。由叶重开任农协委员长兼队长，雷子权任副队长，龚文谟任文书，胡龙奎任教官。自卫军有80余人枪，建制为一、二、三排和特务排。穿着统一灰布军服，佩戴特定标制，自制军旗，成为一支可以机动作战的武装力量。自此，崇阳农军在叶重开率领下正式打出了自己的旗号。

劫船暴动济穷困

1927年8月上中旬，国民党第十三军方鼎英一部（陈嘉佑两个团）向崇阳逼进，国民党崇阳县政府积极筹备成立九区联防保卫团，反动民团也在加紧集结，妄图扼杀这支新生的农军武装。

正当崇阳农军考虑下步是赴广东追随南昌起义大部队，还是在山林就地隐蔽起来之时，叶重开接到了洪下农协密报：崇阳大土豪、大富商陈新廉（陈永庆的儿

子) 有一批粮食运往武汉, 将在洪下落脚。

陈新廉在武汉搞货物周转, 平时除聘有 20 多名货运主管外, 还训练一支 20 多人(水手兼保镖)的武装押运队, 所配备的武器装备也很精良, 经常护卫木帆船在崇阳至武汉的水路上跑运输。叶重开得到信息后, 立即召集有关人员进行研究, 决定由洪下农协配合在洪下进行劫船暴动。随后, 他亲率农军, 由洪下农协负责人引路到陆水河洪下段设伏。14 日晚, 当运粮船夜宿洪下码头时, 农军 20 余名战士疾速登船, 一阵扫射, 消灭地主武装 10 余人, 缴获武装押运粮船一艘、大米 40 余包、步枪 5 支。叶重开将枪支及小部分大米用于农军补给, 大部分大米由洪下农协分给当地贫苦农民。

抛家弃子勇赴死

崇通农军智取通城县城, 帮助建立通城县劳农政府后, 自身也面临着敌强我弱、枪支弹药缺乏、队伍何去何从的问题。

恰逢其时, 未赶上南昌起义的武汉警卫团与平江工农义勇队合攻修水县城后, 以受编不受调为条件, 接受朱培德“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番号, 正驻扎在修水招兵买马。师长余洒度派人到通城, 与同是黄埔二期同学的王武扬(中共通城县委书记)、刘继宋(贵州贵阳人, 共产党员)取得联系, 有收编崇通农军的意愿。于是, 崇通农军与省委派驻通城县的特派员邬一心(化名龙在田)决定, 派罗荣桓、谭梓生同刘继宋到修水考



位于崇阳石城镇石下村的叶重开故居

察。余洒度安排师部书记（秘书）谭政接待，并答应给崇通农军派两名教官及补充部分枪支弹药，从而确定了崇通农军向修水转移的意向。

1927年8月26日，正当崇阳农军开拔向江西转移之时，叶重开的妻子邱福梅带着五岁的女儿寻到通城，哭诉魏祥志（魏石峰之兄）派团丁抢走家里的财产并将叶父关押之事，要叶重开回家解救。听到妻子的哭诉，叶重开虽然心里非常难过，但他还是硬起心肠对妻子说：“我的一切已经交给了党，除了跟党走到底外，已经别无选择！你回去吧，把碧伢（女儿小名）带好。”说罢，便毅然送别妻女，带着队伍踏上了艰难的转移之路。9月29日，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经过三湾改编后，参加秋收起义的崇阳农军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并在保卫或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历次战斗中大部分牺牲，幸存者寥寥无几。叶重开也于1928年在铜鼓县的一次战斗中，为掩护同志转移时不幸牺牲，年仅30岁。

（崇阳县史志研究中心）



罗荣桓（1902—1963）原名罗慎镇，字雅怀，号宗人。湖南省衡东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政治委员，第一军团、江西军区、第八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和总干部部长。1955年授元帅衔。

清正做人 廉洁齐家

1927年7月下旬，罗荣桓受湖北省委派遣到通城组织秋收暴动。8月20日与王武扬、叶重开一同率领通城、崇阳农军发动秋收暴动，智取通城县城。暴动成功后，成立通崇农民自卫军，罗荣桓任党代表，这也是他军事生涯的第一个职务。罗荣桓元帅一生清正廉洁，严管家人，培育了好的家风，留给后人无穷无尽的精神财富。为缅怀革命先辈，现将罗荣桓元帅的四则小故事以飨读者，学习罗荣桓元帅清廉节俭、公道正派的崇高品格。

严拒大衣皮鞋

1937年9月，平型关大捷，八路军115师缴获了大批军需物资，师供给部给师、旅、团三级首长每人挑选了一件质量很好、较暖和的日本军大衣。当战士把衣送到罗荣桓的办公室，罗荣桓说：“我身上已有一件大衣，拜托你把衣送回供给部，请他们分给更加需要的同志。”整个抗战期间，每年冬天罗荣桓都是穿着这件旧大衣。在东北工作期间还是穿着这件褐色的旧大衣，在“平津战役”中多次与傅作义的代表谈判，他仍然穿着这件旧大衣，直到解放后，中央军委规定统一着装，罗荣桓才换上后勤部统一缝制的军大衣。

1942年春节期间，罗荣桓到制鞋厂检查生产，慰问工人。一位班长看到罗荣桓的鞋子破了，便拿出一双新鞋，让他试穿。罗荣桓穿上新鞋走了几步，班长问：“首长，合脚不合脚？”罗荣桓肯定地回答：“合脚，穿起来挺舒服的。”班长诚心诚意地说：“首长，你脚上的鞋该换了，只要不嫌弃，这双鞋就送给你了。”罗荣桓听了，连忙把鞋脱了下来，一边拍掉上面的灰尘，一边严肃地说：“不行、不行，我们办的厂都姓公，都是为抗日服务，为大家服务，如果今天到鞋厂来，穿走一双鞋，明天到那个猪场牵走一头猪，那像什么话。”坚决把鞋退了。

不当部长当园长

罗荣桓妻子林月琴在山东时就在部队组织部门工作，到东北后，因为要照顾生病的罗荣桓，还陪同他到苏联做手术，工作一直没有着落。从苏联回国后，东北野战军政治部组织部把林月琴安排在组织部任副部长。罗荣桓对妻子要求参加工作很高兴，但对她任副部长表示异议，他对妻子说：“你在山东曾做过组织工作，这个岗位对你合适的，就不要当副部长了吧！可以把部队家属组织起来，办学校、幼儿园。孩子们的教育很重要，我们这一代打了天下，还要他们去建设啊！”林月琴这位女红军出身的干部，便辞去职务，创办了一所子弟学校。全国妇联领导人蔡畅曾表扬她们为孩子们办了一件好事。新中国成立以后，总政干部部又安排林月琴继续办学校，罗荣桓也很支持，于是她负责筹备了北京第十一学校。

不能免费坐火车

罗荣桓元帅不仅对自己严格要求，对亲属、子女的要求也非常严格。弟弟罗湘和二哥罗晏清是他当时最主要的亲属。罗湘是黄埔军校毕业，解放前夕，是地方组织某部的干部，在接受解放军整编时，领导机关准备任



通城秋收暴动纪念馆

命他为某部师副政委。罗荣桓闻讯后，认为罗湘还不是共产党员，坚决不能当副政委和部队干部，需要学习，改造思想，于是罗湘被送到军政大学学习。二哥罗晏清与罗荣桓相处甚密，1950年1月陪罗荣桓女儿、女婿到北京，在罗荣桓家住了一段时间，罗荣桓便动员二哥罗晏清回到家乡，在土改中接受群众教育。为防止亲属来京找自己谋个一官半职或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罗荣桓打电话给衡阳铁路局局长，要他劝自己的亲属不要到北京来找，不能免费坐火车。

临终嘱咐

自从罗荣桓病危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对他的病情都非常关切，指示医院大力组织抢救。1963年12月的一天，罗

荣桓在弥留之际，拉着夫人林月琴的手，对这位经过长征的红军女战士说：“我死以后，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搬到一般的房子去，不要搞特殊。”然后，又嘱咐孩子们说：“我尽力争取不死，继续为革命奋斗，如果死已经来临，我也决不畏惧，决不发愁。我给你们留下的只是党的事业，别的什么都没有，我的遗言只有一句话，永远跟着共产党走……跟着毛主席走……”

(通城县史志研究中心)



钱 瑛（1903—1973） 名生桂，号镜霞，又号寒松。咸安区马桥人。无产阶级革命家。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湘鄂西分局职工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省总工会常委、秘书长，中共潜江县委组织部部长、县委书记，鄂中区党委书记，中共西南工委书记等职。1954年担任监察部首任部长。周恩来同志赞扬她“铁面无私”，邓小平同志肯定她“大公无私，能坚持原则”，干部群众将她誉为“女包公”。

钱瑛回乡

1957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监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兼党组书记的钱瑛回故乡咸宁。离开北京前，毛主席还交给她一个任务，到基层了解一下合作化运动的情况和老百姓的生活。在短暂的时间里，钱瑛串农门、听民声、反腐败、反官僚，留下了许多佳话，表现了一个革命老前辈、老党员的高风亮节。

先换衣服再下乡

到了咸宁县城，钱瑛向县委书记王秀生和其他干部

说明了来意，她说：“我这次是在云南考察工作后，顺便回家乡看看。离开北京前，毛主席还交给我一个任务，到基层了解一下合作化运动的情况和老百姓的生活。”

说完，钱瑛问王书记：“我要的衣服带来了吗？”县妇联主任罗主任赶紧上前，把一件按照钱瑛嘱咐准备的蓝布褂子递给钱瑛：“带来了，带来了，就怕钱部长穿上不太好看。”钱瑛套上那件褂子，左看右看，高兴地说：“不错，很合身。”钱瑛换衣服的举动，立即把与地方干部的感情距离拉近了许多。罗主任笑了：“钱部长穿上这身衣服，哪里还像北京来的大首长，跟我们乡下人差不多！”钱瑛意味深长地说：“这就对了，这样我才能听到老百姓的真话，了解到真实的情况，共产党与老百姓都需要这种亲近感。”

钱瑛随王书记到会议室休息40分钟，即向力稼庄出发，去看望阔别多年的乡亲。在力稼庄，大家奔走相告，来看在北京做高官的钱瑛。见她还像从前一样亲切，拉起话来便倒肠倒肚。

找个农户吃便饭

到了午饭时间，贾支书说：“钱部长，我听说你来了，就让村里安排了饭，到时候边吃边给您汇报吧！”

钱瑛和随行人员围着桌子坐下，但见好菜堆满了一桌，有蒸鸡、烧鸭、全鱼、红烧肉……钱瑛说：“伙食不错啊，我不信你们每天都有这些菜吃吧？”贾支书面有

难色了，说：“这……您是贵客，几十年回来不了一次，就多弄了几个。”钱瑛说：“我去看看大家都吃的是什么？”

贾支书跟着钱瑛进了樊大姐的家，只见桌上摆的是干萝卜丝、豆豉、苦菜汤、红苕。钱瑛说：“我就在樊大姐家吃，你们也都在这里吃，村里的那桌饭就请军烈属、五保户们吃吧！”

钱瑛拿起一个红苕，咬了一口，问：“区乡干部的工作作风么样？”贾支书说：“作风还行，基本能和老百姓打成一片。”樊大姐直率地说：“也不是都行，有些干部蛮粗暴。”贾支书却连忙给她使眼色制止。钱瑛鼓励说：“樊大姐，别怕，你说说看。”见钱瑛这么说，樊大姐大胆地说：“区里的一位魏副书记，外号‘将军书记’，爱摆架子，爱搞形式。那年的水利工地上，男人赤膊挖土方，他强迫女人也要向男人学习。”钱瑛听后，眉头打结：“还有什么？”樊大姐看了看贾支书，咬咬牙，说：“他狠得很，动不动骂人，绑人。”

钱瑛忍不住了，几口把一个红苕吃完，说：“这样的干部还了得！我倒要见识见识他是何方神圣！”

“将军书记”遇钱瑛

1953年以后，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基本上完成，但是，少数工商业还在改造中。咸宁百年老字号“荣恩堂酒坊”这时也正

在改造之中，负责这项工作的就被称为“将军书记”的马桥区委魏副书记。

魏副书记错误理解党中央政策，且工作方法简单粗暴。魏副书记在大会上要求“所有的私营店铺招牌都要给我取了”。荣恩堂的老板向魏副书记求情说：“‘荣恩堂’的牌子已经挂了一百多年了，就不用摘了吧？”魏副书记回答说：“那些东西都是旧社会的尾巴，别舍不得，再疼也得割掉！”有人发牢骚说，人还是旧社会过来的呢，干脆都枪毙算了！魏副书记勃然大怒：“谁在瞎说？信不信，老子抓你开学习班！”

正在魏副书记要砸“荣恩堂酒坊”招牌之时，钱瑛到来，予以制止。钱瑛愤怒地质问：“谁给你的权力，要摘掉这些老字号的牌子？这些老字号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呀！中央号召公私合营不假，但并没有说要把老字号都砸掉。要像你这样割旧社会的尾巴，北京的全聚德烤鸭、同仁堂药铺、盛锡福鞋帽店，是不是都要把牌子砸了呀？”魏万堂蛮横地说：“北京的事我管不到，在马桥这块地盘上，我说了算！”钱瑛亮了身份后，才制止住砸牌行为。

回到县里，钱瑛把一封撕碎了的信交给了县委书记王秀生。这封信是“荣恩堂”的负责人出于无奈写给“将军书记”的，“将军书记”看也不看一眼，就将信撕了丢在地上，恰恰被钱瑛捡起。钱瑛交代说：“你们看看，这封信上写的什么？我把这封信交给县委，希望你们认真查一查，如果属实，那就不光是官僚主义的作风

问题，而是涉嫌敲诈勒索。在我们共产党的队伍里，绝不能容忍‘将军书记’这样的败类！”

结果，“荣恩堂”依然傲立，而一个没有理想信念、没有党性修养、没有百姓情怀、没有领导水平的干部——“将军书记”轰然倒下——被开除公职。

不徇私情扬正气

钱瑛身边有个女孩叫小芳，是她的外甥女，在回乡这几天，一直陪伴着钱瑛。

有一天晚上，小芳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钱瑛说：“你有什么事情就说吧！”小芳吞吞吐吐地说：“我有个隔房的表哥，在合作社当社长，去年秋收后，私下里卖了社里的两千斤稻谷，把卖稻谷的钱拿去做生意，结果全部赔光了。钱赔了不说，乡里知道了这件事，把他告到县里，听说要判他坐班房。瑛爷，你是北京来的大官，能帮忙说说话，救救他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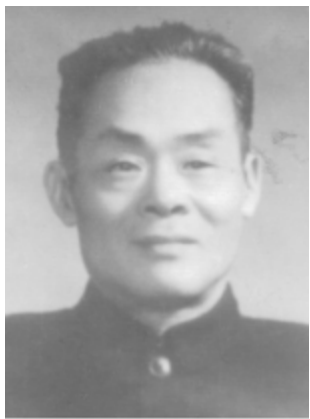
钱瑛一听，眉头皱了起来，神色也变得严肃：“小芳啊，我看你这个表哥的胆子有点大哟，一个合作社的社长、共产党的干部敢私吞集体的财产，这叫什么行为？”小芳还想求情：“瑛爷，他就是想做生意，私自卖了两千斤稻谷当本钱。”钱瑛说：“那稻谷可是全体社员的集体财产，他怎么能私自处理呢？说得好听一点叫私卖稻谷，说得准确一点，他的行为就叫贪污！”

小芳被吓着了：“照您这么说，他就没有救啦？”钱瑛肯定地说：“有救！”钱瑛看了小芳一眼：“转告你的表哥，让他老老实实向组织上坦白，向法院认罪，改造好了还可以继续为国家做事嘛。”小芳想：这叫什么救呀？于是，硬着头皮继续求情说：“您就不能出面跟县里说说？放过他这一次。”钱瑛语重心长地说：“小芳啊，封建社会都要讲‘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何况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更不能容忍任何人犯了法而不受到法律的制裁。”

小芳低着头不说话了。钱瑛拍着小芳的手：“小芳，你知道瑛爷这个监察部长是做什么的吗？”小芳摇摇头。钱瑛引导说：“我这个监察部长，就是要监督检查各级党员干部是不是真心在为老百姓操劳做事，如果谁利用手中的权力欺压百姓，谋取私利，违反党纪国法，别说合作社的社长，就是县长、市长、省长，我也要一查到底！”

钱瑛对“社长贪污案”的处理，不仅教育了社长本人，也教育了小芳，更教育了几代人，也将世代地流传下去。

（徐赐甲）



聂洪钧（1905—1966）曾用名聂鸿钧，咸安区官埠桥镇泉水湖村聂樊人。近代官员。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鄂南区委书记、红二方面军政治部统战部部长、中共长江区委书记、中原军区鄂东军分区政委、湖北省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省委常委，中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粮食局局长、国务院粮食部副部长等职。

“平凡”人的“不平凡”

聂洪钧同志把自己定位为“平凡”人，从他为自己的两个儿子起名为“平”和“凡”，就可以窥其心地。在他去世前的 30 多年中，他是我党的高级干部，从 1929—1947 年的 18 年中，他调动工作达 35 次，即使职位下调或临时任务，他从不挑选地区和名位，他努力学习，尽心工作，并注意团结同志。聂洪钧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对功绩的谦让和严于自我批评的精神，以及正派的作风和端正的学风，都带有坚强的党性和鲜明的个性特点，是一位我国近代史上可圈可点的人物。

言传身教

1953年1月聂洪钧调任中南财委副主任兼粮食局长，来到工作地武昌，聂洪钧马上要求见秘书。这时，一位年青小伙子来到他的面前，紧张地搓着双手，不安地自我介绍：“我叫晏鸿亮，今年21岁，刚出大学校门，工作经验少，希望能够胜任您的秘书工作。”聂洪钧和蔼地对秘书说：“你作为青年学生干部，对革命的认识较少，缺乏党史知识，这是由于工作经历短造成的，要学习克服缺点，尽其所能多做一点工作，同时还要坚持向老同志学习。”

晏鸿亮作为他的秘书，从老首长言教和身教中学到许多优良作风。聂洪钧同志一个人住在武昌，从早到晚忙于工作。自己收集资料，调查研究，亲自听汇报、开座谈会、做笔记，自己起草讲话稿和报告，写好后交秘书誊抄，他从来不用秘书或省政府办公厅人员代为起草讲稿和文件。一次，聂洪钧来到浠水对合作社开展调查研究，晏鸿亮也跟着去了。浠水县委县政府领导召集了各方面的人员参加调研会，对于省里下来的大领导亲自来指导合作社工作，大家都非常兴奋，来了满满一大屋子人。于是，就按预定计划开会。聂洪钧同志的讲话虽很简短，但是扼要有力，抓住了听众。大家不停地询问政策，聂洪钧同志耐心地一一解答；对于合作社的管理

问题，聂洪钧问的问题非常细致，面面俱到，回来他亲自写材料、写报告，没有安排秘书代写，有时写好了让秘书抄抄而已，这种工作作风是现在少有的。

聂洪钧同志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和高贵的品质、为人与做事的风范和准则影响晏鸿亮以后几十年的革命工作。

淡泊正直

聂洪钧为人正直，于世无争。一次他与曾传六一起去看戏，他们去得很早，戏院前排有很多好位子空着，曾就要去坐，戏院管理人员见他们穿着朴素却不让坐，这时，聂洪钧劝慰曾传六同志说：“不要争了，咱们不要这种待遇也罢。”并且自己很快走开。他不争权、不争地位，有分歧，他主张由实践检验，敢说真话。1956年11月份的一天，聂洪钧和曾传六相约游中山公园，两人在一家茶社里坐着聊天。曾传六刚从两湖和广东检查工作回来，聊起检查工作情况，曾说道：“我到湖北沔阳检查工作并召开座谈会，结果会未开完，农民都走光了，抛下我和县长两人在那里。农民和干部的关系远没有革命战争年代亲密了。”聂洪钧听后半晌没说话，心情沉重地回到了单位。他马上拿笔写下了《干部与农民关系有感》的短文，在文中他这样表述干部与农民关

系——“如何取得农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的确，现在应当引起最大注意。听任农民生活困难而不想法予以改善，则农民就会更加离开我们，因此，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的作风并认清其危害，应是当前的迫切问题，不容迟疑”。这段话反映了聂洪钧同志追求真理的勇气和决心。

高风亮节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天，咸宁县横沟桥镇镇政府门前锣鼓喧天，人声鼎沸，人们兴高采烈地奔走相告：“聂主席要回来了。”时任湖北省政府第一副主席聂洪钧因多年未回家乡，思念家乡亲人，想抽空回家看看，省政府办公厅根据惯例通知了地方政府。县委领导带领一班人站在路边远远地望见一辆黑色小轿车急速驶来，大家连忙迎了上去，这时，小轿车并未在门口停下，而是在前面掉了个头后又快速离去。原来，聂洪钧同志坐在车内途经横沟桥镇，看到很多群众敲锣打鼓举着标语欢迎他，立即告诉司机：“我个人的事情是小事，不能扰民，回省城。”至此，聂洪钧自参加革命到去世前都没有回过聂樊老家。新中国成立前是因为革命工作繁忙和战事吃紧，不能抽身回家。新中国成立后是担心扰民而没有回家，这也成了他终身的遗憾。



《聂洪钧回忆与文稿》 省领导到下面检查工作，地方上习惯总是送些礼，有的收几盒檀香扇，有的带回几筐桔子，但聂洪钧同志从来不收礼。有次到汉口开会，当地领导为尽地主之谊请大家到名店吃饭。聂洪钧同志对秘书说：“今天你请客，明天他回请，吃来吃去都是吃公家的，此风不可长。”坚决让当地领导取消了宴请。

为了公私分明，聂洪钧坚持自己记财务帐。家乡咸宁常有人来找他办事，聂洪钧一贯秉公办事。有次张公聂樊村村委一班人与邻乡闹纠纷来找他撑腰，他说：“我是省主席，不是县管，不能插手，更不能偏袒。”因此村里人一直“抱怨”他不为家乡办事。

由于病魔缠身，聂洪钧身体每况愈下。但他还是坚持参加政治学习，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他还挤出时间，把自己半个多世纪的生活和斗争的经历回忆整理，写下了《半世略记》《大革命风暴在咸宁》《鄂北斗争》《红十军攻下蒲城》等回忆录和专题文章，为后人研究中共党史留下了极为宝贵的资料。

(咸安区史志研究中心)

徐万益（1905—1933） 原名万一，通山县畈泥乡茅田村东塘徐家人。革命烈士。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4月，任通山县委白区工作队队长。1933年1月，任通山县委副书记，10月当选为县委书记，12月，被以“改组派”罪名错杀，解放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铁面万一

徐万益出生时家有薄产，父母勤劳，持家节俭，经济条件尚可。万益进私塾读书三年后，就随父母下地劳动，供哥哥徐作金读经馆。他农忙种地，农闲入山狩猎，经过十几个春秋的艰苦磨炼，徐万益成为当地的劳动好手。他为人正直，办事踏实，但性子很急，一件事未做好，他就日不睡夜不眠地干，村里人都叫他“火炮万一”。

1926年秋，通山大革命运动兴起，中共通山特支派共产党员江福来到茅田发展党组织，建立农民协会。徐万益被吸收为积极分子，担任村农民自卫队队长，他带着自卫队员在全村打土豪斗劣绅，实行减租减息、禁烟禁赌，工作很有成效。一天他得知老屋土豪徐二棍携带田契借据外逃咸宁，遂带上两名自卫队员连夜追赶40余里，将徐二棍抓回，乡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抓住这个时机召开群众大会，清算徐二棍的剥削罪行，没收

其财产分给贫苦农民。清算徐二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农民的革命斗志，使城东农民运动蓬勃发展。1927年春，区农协会成立时，徐万益当选为执行委员，担任区农民自卫队队长，区共青团组织根据徐万益的表现，吸收他为共青团员。从此，他成为区委书记江福来的好助手。

从1927年冬天开始，徐万益在县委领导下，带领一支农军分队，协助板桥区委书记江福来、游击队长章继林战斗在消水山麓富水河畔的板桥地区，为建立一块巩固的赤色区域而浴血奋战。不管环境怎样艰苦，他始终保持旺盛的战斗精力。1928年夏，他奉命侦察五区民团的活动，带领几个战士身穿便服，多次深入西坑潭了解情况，协助江福来等人处决了五区民团两个最反动的分队长，吓得五区民团团长吴礼启进县城躲避。经过艰苦战斗的考验，徐万益已具备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1929年1月，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少共板桥区委书记。

1932年4月，徐万益作为地方武装的代表，参加了通山县党员代表大会后，调至县委白区工作队任队长。在白区工作队队长任上，他办事雷厉风行，也十分注意政策。工作队到白区筹款，筹款对象是当地地主，他每次都是先了解该地主在群众中的印象，对于地主本人参加劳动，剥削群众罪行较轻的，在打土豪筹粮活动中就通知自愿出钱粮；对剥削群众厉害，罪行累累的，毫不犹豫把土豪抓起来，发动群众清算他们剥削与压迫农民的罪行，追获现款和粮食；对外来做生意的商人，



通山富水河

以礼相待，耐心宣传党的经济政策，只收一定数量的营业税，并鼓励他们来苏区贸易，他还主动协助县转运局，作好商品交换所的物资运送工作。在白区工作期间，他经手的钱粮折价上十余万元，家里却是顿顿红薯、南瓜、稀饭，从不挪公款一文钱，不管亲朋好友，还是领导和同事，从不外借一文钱，向苏维埃政府交账时，账目清楚明白。因此，人们又叫他“铁面万一”。

1933年10月，鄂东南道委任命徐万益为县委书记重组通山县委。徐万益临危受命，与县苏维埃主席邓寿山、副主席徐作金、军事部长许金门等人团结一心，在主力离开河北苏区期间，坚持在大幕山与敌人浴血苦战两月之久。在一次血战中邓寿山等人生死不明，徐万益只身从咸宁亲自回大幕山寻找失散的战友。政治保卫局却以“改组派”余党罪名将他拘捕审查，并于12月的一天黑夜将他处死。



鄂东南政治保卫局遗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山县人民政府追认徐万益为革命烈士。

(通山县史志研究中心)



陈寿昌（1906—1934）浙江镇海人。革命烈士。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调中共中央特科从事情报工作。1933年7月，任中共湘鄂赣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1934年2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同年6月，兼任红十

六师政委，11月在战斗中牺牲。省苏维埃在崇阳、通城交界处建立寿昌县，以资纪念。

115

陈

寿

昌

陈寿昌廉洁闹革命

陈寿昌廉洁闹革命

陈寿昌，出生于浙江宁波镇海县城关镇的一个书香之家，自幼勤奋好学，少年怀抱爱国志向。17岁就投身工人运动，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内历任各种重要职务。1934年任湘鄂赣省委书记、军区政委兼红十六师政委时，为配合红军主力北上，他率部留守湘鄂赣，在崇阳与通城交界处指挥作战身负重伤，因流血过多壮烈牺牲，年仅28岁。崇阳大地至今流传着陈寿昌先烈的英勇奋斗和廉洁闹革命的故事。

陈寿昌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艰苦朴素，严于律己，廉洁奉公，无私奉献，对革命充满必胜的信念。1929年农历正月回家乡同胡有娣结婚后，三年没添置过一件新衣，当时党的经费困难，他变卖妻子结婚时的



陈寿昌烈士墓

首饰以接济一家生活，一次还将兑换首饰得来的 96 块钱全数送交给党组织作为活动经费。那时候上海乘电车很便宜，三、四个铜板就可坐很长一段路程，但陈寿昌却舍不得花，除急事外，多数时间是步行而不乘车，有时在路上买个大饼充饥。他常对妻子说：“我们青年生活苦一点没什么，将来会好的，到过好日子的时间不远了！”有时他抱着孩子自言自语：“我们一定会成功，小囡，好日子你一定能看到！”

1931 年初，湖南党组织从土豪劣绅处没收了一批金银珠宝，需要设法从武汉转运到上海，作为党中央的活动经费。党组织把这一重任交给了陈寿昌。那时的武汉正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反动派的黑名单上就有陈寿昌的名字，要去那里执行任务无疑是九死一生。陈寿昌毅然接受了任务，化装成一个阔老板，把 24 岁的

自己装扮成近 40 岁的人，携同妻子胡友娣和党组织派来的警卫员，一起到武汉，接收了足足装了半个枕头套的金银珠宝。有一天，妻子胡友娣发现金银珠宝中有一小小的金响铃，就对陈寿昌说：“这只小响铃就留给女儿戴吧！”平时爱笑的陈寿昌，却十分严肃地说：“这是同志们流血牺牲得来的，怎么可以随便拿呢。”说得妻子愧疚地红了脸。他把这批从土豪劣绅那里没收来的金银珠宝，机警地上多处银楼兑换成钱钞，陆续汇给在上海的党中央。因为有坚定的信仰，所以他时时、事事以自己的行动践行“身许马列，报效工农”的诺言。而这件事情足见他廉洁自律的高尚品格。

(吴梅芳)



叶发全（1910—1937）又名叶香园，通山县兰田叶家村人。革命烈士。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任钟家畈乡党支部书记，1931年6月任独立红三师九团排长，1934年10月，受组织委派返回大幕山组织红军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担任大幕山游击队队长。1937年6月，牺牲于曾家山。

无私无畏叶发全

叶发全的父亲叶正美，是一位忠厚纯朴的贫苦农民。家里田无一升，地无一合，全靠给地主、山霸做长工月活维持生计。由于家境贫寒，叶发全六、七岁时就砍柴供灶。九岁那年，他父亲一病不起，丢下他们母子三人去世了。这以后，叶发全就挑起他从山上砍来的柴禾，夹在村里的叔叔伯伯们中间，翻山越岭到县城或附近的集镇上去卖，换来粮食、食盐和其它生活用品，帮助母亲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艰苦生活的磨炼使叶发全不仅身体强壮，还能识字立据，养成了豪放的性格与天不怕、地不怕的无畏精神，村里老少都很器重他。

表叔“认栽”

1928年6月初，18岁的中共党员叶发全，带领农协协会会员深入黄沙铺兰田村，宣传发动农民投入抗租抗债和减租减息运动，慌了手脚的土劣山霸们一方面对叶发全恨之入骨，一方面假意应付，暗使坏招，甚至铤而走险。

这天，不法土豪徐昌志暗中勾结反动民团，花钱请来两个团丁，带着枪和他一起下村公然上门逼租逼债。叶发全闻讯后当即带领4名农协会员埋伏在路口旁，敏捷地将徐昌志一行3人抓获，缴了他们的枪，两个团丁经一番教育后被当场释放。吓得瘫软在地的徐昌志，被叶发全拎了起来，夹在右腋下，一口气连翻两座山来到曾家山的一个山洞里。

“你是要财还是要命？要财今天就是你的末日，这个山洞就是你的坟墓！”叶发全怒发冲冠，对着趴在在地上已吓得浑身发抖的徐昌志厉声喝问。

“要命……要命……请表侄看在亲情的份上高抬贵手。只要饶我一命，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徐昌志磕头如捣蒜，连连拱手作揖。

原来，这徐昌志是叶发全堂叔的一个亲戚。按辈份，叶发全应称他表叔。当时的各级农会都拥有对土豪劣绅的生杀权，徐昌志栽在叶发全手上，算是倒霉透了，他了解这个身怀武功、性情暴烈的年轻后生的秉性。

“和我拉亲带故没有用，你不要抱任何幻想。限定你在明天傍晚以前挨家挨户把逼来的钱和粮食退还！不然，随时取你的人头！”叶发全不容置疑地说。

“一定！一定！”

这一招还真灵，保住一命的徐昌志回去后，没等到第二天下午，不仅上门退还了所有的债款和租金，还把佃农一年的地租和欠债全免了。周围村子里的土劣山霸们见叶发全连自己的亲戚都不放过，一个个大惊失色，收敛了许多。

怒杀表弟

1935年秋，叶发全的表弟孟阿黑因经不起艰苦环境的考验，带枪叛离游击队投靠了敌人，当了敌人安插在东坑尾一带的秘密坐探，他多次出卖组织，甚至带着敌人偷袭红军和捕杀我地方党组织负责人。

遵照湘鄂赣省委“分头隐蔽，寻找战机，严惩叛徒，打击首恶”的指示，叶发全迅速投入惩恶除奸斗争，他决定第一个铲除的目标就是孟阿黑。

母亲听说后对叶发全说：“他毕竟是你的亲表弟，你就留他一条命吧！”

“他害死了那么多革命同志，罪不可恕。”

“如果硬是要杀他，你也回避一下，不要亲自出面。”

“正因为他是亲戚，为防止他继续作恶，我更应该亲手除掉他。”叶发全耐心地说服了母亲。

但由于孟阿黑早有防备，狡兔三窟，行踪不定，叶发全一直没找到除掉他的机会。一个月后的一天夜里，叶发全终于从线人那里得到了孟阿黑于夜间潜回家中的消息，立即带领几名游击队员，连夜摸到他的家里，从床上拎起这个睡梦中的叛徒，吓得孟阿黑跪在地上连声求饶：

“表哥饶命…表哥饶命…”

叶发全浓眉倒竖，怒目圆睁，大声吼道：“害人虫，留你不得！”

话音未落，但见手起刀落，一颗人头滚落地下。叶发全大义灭亲，严惩了这个可耻的叛徒。

三天后，叶发全等人又化装潜入九折，顺藤摸瓜，夜袭联保处，处死了伪保长孟文明。不到一个月，根据群众的秘密揭发和游击队掌握的线索，先后将敌人安插在钟田畈、大屋陈等地的密探钟瑞南、陈家高等人处死，使兰田一带十多个自然湾的控制权又重新掌握在游击队的手中。

(朱冬石)



张进 (1910—1985)

字侠生，赤壁市车埠白驹桥人。教育家。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咸崇蒲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嘉蒲临工委书记

兼挺进队政委、武昌县长、工委书记、长江地委秘书长等职。解放后，任华南工学院院长、党委书记，中共广东省第二届候补委员，广东省第一届人大代表、第五届人大代表、常委。著有诗集《晚晴楼吟草》。

廉洁奉公的教育家

张进十五岁时就读于董必武主办的武汉中学，开始接受革命思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领导下，张进与杨乡朴、孔罗荪等人创办战斗书店，发行进步报刊，宣传抗日主张。1938年，张进在鄂南区特委领导下，先在咸宁、蒲圻一带从事王劲哉部队的统战工作，后到新四军豫鄂支队（后改为五师）参加开辟江南地区的工作。1949年，张进随第四野战军南下，6月留在江西吉安地委任宣传部部长，后任省委宣传部秘书长、副部长兼省文联主席。1953年全国大专院校调整，张进奉调去广州筹建华南工学院，

任党委书记兼副院长、院长，直到 1984 年离休。

在“文革”期间闲赋几年后，张进于 1971 年秋恢复工作，担任华南工学院革委会副主任。当时，他已是年逾花甲的老人，患有冠心病、动脉血管硬化、低血压等多种疾病。但是，他全然不顾年老体弱，仍是忘我地工作。有天晚上，学院要讨论毕业生的实习问题，张进事先表示要参加，同事们见他身体不好，都劝他在家休息不必参加。正巧那天晚上下着瓢泼大雨，外面漆黑一片，大家都以为他不会到会，谁知他比别人到得还早，而且还利用开会前的空隙时间找老师谈心。

张进恢复工作后，组织上补发他在被“审查”期间扣发的工资，总共七千多元，除了亲人治病用去了一部分，他将五千元交纳了党费。他觉得那几年自己“靠边站”，没有为党做什么工作，理应少取报酬。

张进的儿子张佐生，原来在上海工作，为了便于照顾父母，组织上主动把他调到广州，按政策可以留在学院内安排工作，专业既可对口，又可照顾家庭。张进认为调回广州已是组织上照顾，安排到学院就不必了。他婉言谢绝了组织的好意，还是让儿子按分配到省电视台工作去了。

张进生活很俭朴，他自己住的一间房只有七平方米，家具仅有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一个小书架、两把木靠椅。1981 年他应邀出访香港，学院按规定发给他服装费，他不肯要。大家劝他说：“您这不是代表个



张进编著的诗集《晚晴楼吟草》

人，要顾及学院的面子。”他这才勉强接受，但只买了一套中山服。他一生唯一的“奢侈品”是一件呢大衣，那是在北京开会时，因天冷衣服不足临时买的，回广州后再也没有穿过。

张进一生生活俭朴，廉洁奉公。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寻找真理，追求进步，投身革命的理想和情操，足以成为现代青年的楷模。

(赤壁市史志研究中心)



戴荣生（1911—2003）通城县五里镇戴家巷人。红军战士。1926年秋，参加通城农民自卫军，后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警卫团副连长、中央特务营副连长。解放后，戴荣生主动回到农村落户务农，直至去世。

125

淡泊一生的老红军戴荣生

1927年7月下旬，湖北省委派罗荣桓来到通城，发动秋收暴动。8月20日，罗荣桓、王武扬、叶重开等人带领农军智取通城县城，戴荣生积极报名加入了攻城突击队，随队伍一道捣毁了通城县国民政府，解除了县团防局的武装，取得了暴动的成功。

暴动成功后，戴荣生随罗荣桓、王武扬率领的通崇农民自卫军转移到江西修水，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秋收起义。不久，升为班长。在上井冈山途中，路过芦溪时，遭到国民党军的伏击包抄。在突围战斗中，身为班长的戴荣生带领全班战士猛打猛冲，拼命突围，不但全班无一伤亡，并且保护毛委员安全杀出敌人的包围圈。事后，部队要给他记功时，才发现这个“宝伢子”没有正经八道的名字，于是罗荣桓说：“你大难不死生存下来，还光荣立功，你大名就叫‘荣生’吧！”此后，宝

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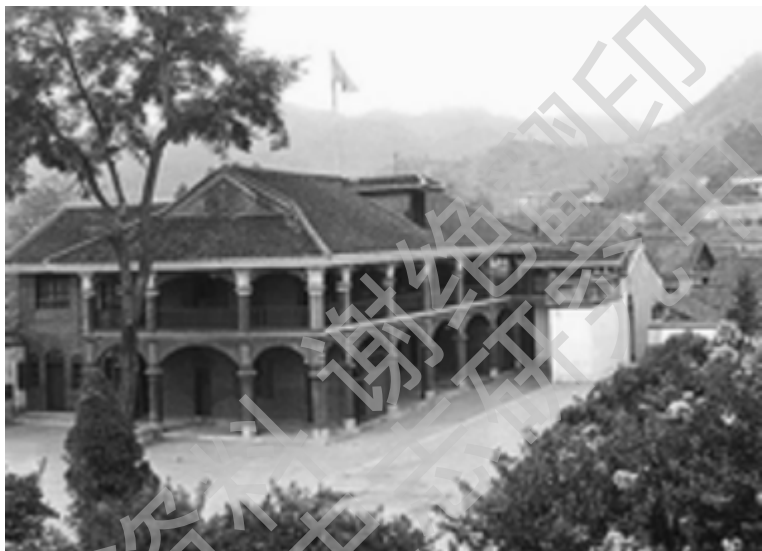
荣

生

淡泊一生的老红军戴荣生

伢子便有了自己的大名——“戴荣生”。

在中央苏区，戴荣生屡立战功。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戴荣生随中央红军主力踏上了漫漫的长征路。遵义会议召开时，作为中央特务营的副连长，戴荣生在会议室正门口站岗，担任会议的安全保卫工作。



遵义会议旧址

遵义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同志组织了举世闻名的神来之笔“四渡赤水”。第一渡赤水后，在贵州习水县土城镇青杠坡发生的土城战斗，是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的一次重大军事行动。在这次战斗中，戴荣生身负 15 处枪伤，左手被打残，身上到处都是枪眼，简直打成筛子一样。后来是战友把他从死人堆里拖出来，渡过赤水河，来到四川古蔺太平渡一个叫陶场坝的地方，找到当地党组织，把他安顿在一个姓马的人家后，部队继续向前进发。

伤稍好后的戴荣生，到处寻找部队。由于自己没读过书，只会说通城话，与四川人沟通十分困难，加上虽然刚养好伤，身体还没恢复元气，经过一路忍饥挨饿、日晒雨淋，他又病倒了。走投无路，他只好放弃了寻找部队的打算，最后流落到四川省古蔺县建新乡定居。

1949年，戴荣生利用他残疾人的身份作掩护，白天给地主放牛，晚上串联穷苦农民讲革命道理，宣传革命思想，团结农民与地主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同时把古蔺县最大的土匪头子黄银彬的行踪和活动规律摸得清清楚楚，等解放军打到古蔺时，戴荣生带着解放军一举击毙了黄银彬，肃清了古蔺境内的土匪势力。

古蔺解放后，因为戴荣生是负伤失散的红军战士，又在剿匪战斗中立了功，政府就给他安排工作。首先是安排在县里的伐木场当场长，因为左手伤残，砍树不方便。他说：“我打仗还行，砍树不行。”然后，县里又调他到县人武部当部长。干了几个月，他找到县委，说自己没文化，干不了。县委领导问：“你干不了，那到县盐业公司当经理怎么样？”戴荣生一听直摇头：“盐业公司是做生意的，更要文化，干不了。”县委领导为难了：“这也不行，那也干不了，那怎么办？”“什么怎么办？我回乡下种田不就得了！”于是，他辞去官职回到曾经养伤的建新乡落户当农民。

1986年，国家核定了戴荣生的身份和经历之后，认定他为老红军，落实了相应待遇。这时候，他的儿女们最大的30岁，最小的才17岁，都是青春年少时期，他们就想借父亲是老红军的身份，要求政府安排工作。

戴荣生一听，立即制止说：“想要政府安排工作？门都没有。都想去参加工作，还要不要农民？田还要不要人种？都不种田吃什么？我们当年就是为了能分到土地，能不饿肚子，能不露肉受冻才闹革命的。你们现在这样子，有吃有穿，不急不愁，真是天堂般的日子，还不满足？”儿女们都知道父亲的脾气，也不敢多说什么。

有了待遇，有了钱，但戴荣生从来不以老红军自居，事事牢记罗荣桓政委当年的教诲，时时不忘记自己是红军战士，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国家发给他的钱，他一分都不给儿女。他说：“你们现在的日子跟我们那时候比，完全是在蜜罐里。这些钱是共产党给我的，让我保管的。我们打天下就是为了穷苦大众，革命者不能有任何私心。”于是他把享受待遇的钱全部分给了有困难的乡亲们。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戴荣生既不给儿女们花一分钱，也不找政府安排子女的工作。除了长子当兵复员回家安排工作外，其余4个子女全部在家务农。

2003年10月，92岁的戴荣生无疾而终，带着他一身的硝烟、一身的战功和对故乡的思念，走完了他传奇而坎坷的人生。

遗体火化之后，儿女们从戴荣生的骨灰里扒出了4块隐藏在他身体内一辈子的弹片。这，就是戴荣生留给后人们唯一的财富和念想！

（李斌、冯立群）



谭质夫（1913—1934）原名谭家文，通山县大畈镇高坑村人。革命烈士。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3月，任通山县县苏维埃政府司法裁判部部长，执法公正，苏区人民称赞他是“红色法官”。后历任通山县独立团团团长、红三师八团团长兼政委、修武崇通工作

团主任等职。1934年4月中旬，牺牲于崇阳县白霓桥。

129

谭
质
夫

少年英雄红『法官』

少年英雄红“法官”

1930年3月，中共大冶中心县委与红五纵队党委组织武装大示威，谭质夫带黄沙大畈、梅田、万家等地近千名儿童团员参加了这一行动。他们在官埠桥、横沟桥等处破坏铁路，打击民团，曾智擒横沟民团十余人，缴枪十余支，受到指挥部的嘉奖，17岁的谭质夫被誉为“少年英雄”。中共通山县委根据谭质夫的表现，破格吸收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3月下旬，通山县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大会召开，谭质夫出席了大会，并当选为县苏维埃委员。通山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谭质夫任县司法裁判部部长。这位年仅十七岁的苏区法官，没有辜负工农贫苦大众的希望，认真执行上级苏维埃政府的政策法令，坚定不移地依靠

人民群众，严厉惩办破坏新生红色政权的反革命分子。他审理案件，重证据，重调查研究，铁面无私，苏区人民称赞他是“红色法官”。



通山县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大会遗址

1930年冬，通山军民在第一次反“围剿”中，活捉了大畈民团团长袁观统，并把这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交给县司法裁判部审判。消息传出，袁观统的亲属四处活动，托人在谭质夫面前说情，要谭质夫念在袁观统姑表至亲份上饶袁一死。谭质夫耐心向前来说情的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历数袁观统屠杀无辜、破坏革命的种种罪行，要求大家不要怜惜毒蛇一样的恶人。冬月的一天上午，通山县苏维埃政府在大畈举行群众大会，公开审判袁观统，依法将其就地正法。县司法裁判部秉公办事，为民除害，人心大快，大家同声称赞司法裁判部是苏区的红色法庭。苏区内一些难解决的民事纠纷，也找县司法裁判部裁决。

通山一带，历来有养童养媳的陋俗，虐待童养媳的

事情屡见不鲜。苏维埃政府建立后，颁布了《婚姻法》，提倡婚姻自由，蓄养与虐待童养媳的事例虽有减少，但积习已久，很难根除。1931年2月，大畈的一个叫章如意的童养媳，不堪公婆虐待与小丈夫的欺凌，到县司法裁判部告发。县司法裁判部调查后，严肃处理，解除了“小男大女”式的婚约。政府还给章如意发了新衣、新鞋袜，让她进列宁学校读书。不久，章如意自由恋爱结婚，成了苏区妇女运动的积极分子。消息传开，人们为谭质夫编了一首山歌：

苏区有个司法部，
年轻部长谭质夫，
秉公无私会办案，
婚姻自主真幸福，
不受封建黄莲苦。

（周法浩）



何功伟（1915—1941）字超寰，又名何伟、何明理，化名何斌、何彬，笔名丰烈，咸安区桂花镇柏墩村中田畈人。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烈士。1936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6月任中共湖北省委员会委员，同年7月任鄂南特委书记。

1939年9月到湘鄂西区工作，历任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区党委书记、鄂西特委书记。1941年1月在恩施被捕，同年11月17日慷慨就义。

用生命诠释忠诚信仰

年少求学寻真理

1915年11月21日，何功伟出生于一个书香之家。他六岁读私塾，勤奋学习，追求进步，仗义疏财，富于正义感。他对歌颂苏武、文天祥等英雄的书籍爱不释手，这些民族英雄的高大形象和动人事迹在何功伟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他把爱国救国和以身报国的火种深埋心间。

1927年7月，何功伟从咸宁县高小转入武昌湖北省立第四小学寄宿读书，养成了他独立生活和思考的习

惯。1930年夏，何功伟考入省立第二中学，品学兼优，成绩名列前茅。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他组织同学参加抗敌后援会，宣传抗日。1933年秋，他以优异成绩考入省立武昌高级中学。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关心国家大事和民族的未来，从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中，逐渐产生了对共产主义的向往，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1935年12月，北京爆发了“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何功伟在武汉积极响应，被选为“武汉学联”常务干事。1936年8月，他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何功伟逐渐成熟起来。他从一名爱国主义者成长为一名担当重任的共产主义革命战士。

游击战争显英勇

1938年6月，中共湖北省委正式成立，何功伟任省委委员。7月，省委根据中央“有计划地建立几个游击区”的指示精神，安排何功伟任鄂南特委书记，回鄂南重建党组织和人民武装，开辟鄂南抗日游击根据地。

回到鄂南后，何功伟联合好友雷荫民发展党组织，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党的主张。同时，他还发动当地知名绅士、怀有爱国思想的族叔何寰楨等一起抗日。为壮大抗日游击队伍的力量，何功伟率抗日游击队登上了柏墩挂榜山，建立了一支拥有300多人的抗日游击大队，即咸宁县国民自卫队第二大队。

咸宁抗日游击大队登上挂榜山后遇上了吃粮问题。何寰祯问何功伟：“300 多人的队伍吃是个问题，粮食怎么解决？”为了给抗日游击队储备粮食，何功伟率领 30 人下山，要求管家把自家仓门打开，运了四十担米和二十多件御寒衣服上山。上山后，何功伟、何寰祯率领抗日游击队在挂榜山九龙寺举办游击队干部培训班，指挥队员们在丛林里进行军事训练，为鄂南抗日武装培训了大批的游击队骨干。同年 11 月在挂榜山，何功伟率领游击队在山上设下埋伏，打得敌人仓皇而逃。何功伟带领鄂南人民打响了咸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第一枪，大大鼓舞了鄂南人民抗日的斗志。此后，游击队活跃在咸通公路两侧的高山密林中，不断地打击敌人。

以身许党鉴忠心

1939 年 9 月，中共南方局派何功伟到鄂西工作，他常跋山涉水来往于宜昌、巴东、建始、恩施一线，宣传党的政策，传达中央的指示，撰写《革命气节教育提纲》，为增强共产党员的无产阶级革命自觉性和自我牺牲精神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1 年 1 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在恩施大肆搜捕共产党人。1 月 20 日，他们逮捕了时任鄂西特委书记何功伟，把他关进了恩施方家坝监狱。

敌人为了劝降何功伟，用尽了各种手段。最后，竟找到了何功伟的父亲何楚瑛，妄图利用父子亲情来软化



何功伟写给父亲的遗书

何功伟的意志。

何功伟察觉敌人的意图后，给父亲写下了诀别信，劝阻父亲不要前来探望自己，可这封信落到了陈诚的手中，当陈诚认真地看到何功伟写下的“苟义之所在，纵刀锯斧钺加诸颈

项，父母兄弟环泣于前，此心亦不可动，此志万不可移”时大为震撼，他说：“这么难得的人才，为什么我们国民党里没有？”并亲笔批示：“至情至性，大节大义，其伟人也！”

4月9日，何楚瑛怀着悲痛的心情，见到了遍体鳞伤的爱子，国民党特务知道何楚瑛救子心切，告诉他说：“只要你能劝说何功伟登报申明脱离共产党，我们马上放人，不仅放了他，还送他出国留学。”何楚瑛反复劝说何功伟，告诉他国民党开出的优厚条件，何功伟根本不为所动，他告诉父亲：“您不要相信他们的鬼话，我抗日无罪，为共产主义献身死而无怨，您就只当少生了我这个儿子。”

两个人当面讲不通，何楚瑛一字一泪写信劝说，何功伟收到信后，也给父亲写了一封回信：“自省爱国无罪俯仰无愧，故能饮苦酒以自甘，宁杀身而不悔，而儿

子所以始终背弃大人养育之恩，断绝妻子之爱，每顾而不悔者，实不愿背弃绝大多数人之永久利益，以换取吾一家之幸福也。儿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此志不渝。”

最后一次探视的时候，何楚瑛声泪俱下对何功伟说：“你是我最喜爱的儿子，我这是最后一次求你，你难道真的忍心舍弃老父、弟妹、妻儿?! 陈诚主席说了，不要你写自首书，只要你点一下头，就可以跟我回去。功伟，你就点一下头吧!” 说完这番话，老人竟“扑通”一声跪在了儿子面前，何功伟心如刀绞，他赶紧搀扶起父亲，斩钉截铁地说：“爹，我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头可断，不可点!” 同时，何功伟也给妻子许云写了诀别信，信中写道：“告诉我所有的朋友们，加倍努力吧! 把革命红旗举得更高。好好地教养我们的后代，好继续完成我们未竟的事业。”

敌人无计可施，11月17日，何功伟被敌人押到恩施方家坝后山五道涧刑场。在临刑的100余级台阶的石板路上，敌人放言只要何功伟回一回头就不杀他，但遍体鳞伤、拖着沉重脚镣的他从容不迫，自始至终没有回头，高唱《国际歌》，慷慨就义，年仅26岁。

一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中国青年的楷模——何功伟，始终筑牢了清廉自律的底线，始终经受住了各种诱惑和考验，始终坚守住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用他年轻的生命谱写了一曲为共产主义理想而英勇献身的壮丽颂歌!

(周子逸)



赵国泰（1915—1974）崇阳县华陂大眼泉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1930年参加红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历任晋察冀军区直属游击军政委，安东军区独立一支队司令员，志愿军

50军150师师长，50军副军长兼参谋长，旅大警备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37

赵

国

泰

一心为民的开国将军

一心为民的开国将军

1960年3月，因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和“大跃进”人为灾难，农村人民公社大食堂已陷入无米之炊的困境。生产队社员只好吃树皮草根充饥，不少地方饿死了人。开国少将、时任50军第一副军长的赵国泰挂念家乡亲人和父老乡亲。他带着警卫、秘书等七八人，风尘仆仆回到家乡。崇阳县政府闻讯，赶紧组织人员盛情招待。酒席上摆的是蒸鸡、烧鱼、炖猪蹄等四荤八素。面对满桌鱼肉，赵国泰只是象征性地动了动筷子，他担心乡下父老正挨饿。他知道农村亩产万斤稻谷是谎言，从家书上听说家乡还饿死了人。饭后，县里干部又陪着赵国泰逛街，了解地方民情风俗。夜间，崇阳县城的十字街上，有几盏昏黄电灯，这是城西香山水库发的电，电

力严重不足。商业局奉县里指示开了夜市。赵国泰随几名陪同干部走进十字街副食商店，见柜台上一排摆开七八个大玻璃瓶，瓶内装着饼干、云片糕、京果、麻花、馓子等副食品，还有纸包的水果糖。这当儿，有两个青年先后进店买了一包副食。赵国泰心中纳闷，难道家中谎报灾情？县里商店还摆着副食品嘛！

几天后早晨，一个身穿褪色旧衣，头戴破帽的中年人，进了刚开门的十字街副食店。这个中年人就是前几天晚上来过的赵国泰。他回乡后见生产队食堂停了火，村民都是野菜拌糠当餐，村里有两个老人饿得小腿浮肿。他把带回家的大米分给了困难群众，但只是杯水车薪罢了，他想到县城试试，看能否买到一些副食，看望村里几个病饿卧床老人。这天，他带两名警卫员步行20多里进了城。

时间到了8时半，开门抹了一阵柜台的两名营业员，懒洋洋立在柜台边发呆。赵国泰掏出几张10元面额的钱，对一名女营业员说：“同志，我买5斤饼干，5斤麻花，6斤水果糖，走亲戚分小孩。”女营业员前几天夜间未上班，不知穿着寒酸的是位军长。她上下打量了一下面前的人，说：“同志，这些摆在柜台上的东西，是县里为迎接从东北回来的赵军长，才摆上柜台的样品，不能卖！”“啊，赵军长能买的美食，平头百姓就只有看的份？这是县里什么人搞的鬼名堂？”听到店里有人吵闹，一个留着分头，穿灰色中山装的中年人从里面出来了。他以为是外地过客，出来打圆场。说：“老同志，崇阳经济困难，粮食紧张，食品缺乏，柜台上的货

真的不能卖!” “不卖摆着干啥? 叫你们主任出来, 崇阳乡下饿死了人, 店里摆的副食品却不卖, 这还了得?” “哎, 你这人管得真宽。本人就是主任, 共产党员, 卖与不卖, 得由我作主!” “好, 我今天就要作你一回主, 要你这耍威风的主任滚下乡去!” 当时, 店门外的警卫员怕首长吃亏, 早有一人前往县政府找县长。不一会, 县长进了副食店, 见店里主任和赵国泰闹得剑拔弩张, 一脸尴尬。连声说: “赵军长, 县里工作未做好……” 赵国泰从衣袋里掏出两个榔树皮和野菜做的团子, 塞给县长, 说: “县长大人, 这是我老乡亲们吃的, 你吃两个试试!” 在赵国泰要求下, 店里百余斤副食糕点, 全部都对老百姓开放。

(崇阳县史志研究中心)



张体学（1915—1973）原名张体照，河南省新县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解放后历任湖北省委副书记、湖北省省长、省委常务书记、代理第一书记、武汉军区党委副书记，省军区党委书记兼政委等职。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届中央委员，全国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

张体学省长在咸宁廉政勤政轶事

张体学同志在担任湖北省省长期间，多次到咸宁县（今咸安区）调查研究。咸宁人民心中留下了关于他的生动幽默的故事，更留下了他勤政、廉政、善政的崇高形象。

喝杯绿茶也付钱

1959年底，咸宁县横沟公社少数干部作风恶劣，不关心群众生活，造成肝炎、浮肿病人增多，加上医疗条件的限制和抢救不力，出现了死亡现象。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事件，当时，湖北省称之为“横沟事件”、“五

九事件”。为此，湖北省省长张体学专程到横沟公社调查研究。

1960年3月2日，春风小雨。上午8时，张体学一行来到横沟公社办公室。接待他的是公社副社长胡扬祖。当接待员递上一杯碧绿色的茶时，张省长看到杯中茶叶色泽鲜明，清香扑鼻，便问胡扬祖副社长：“今天这茶叶是公家的还是你自己的？”胡副社长不好回答，只得支吾。于是，张省长严肃地说：“你们为了招待省长，花钱购买茶叶，不应该呀！我看，谁喝谁付钱。今天我喝了，我付钱。”他随即叫随行的工作人员按茶价付了款。

随后，张省长在会议室听取了中共咸宁县委书记王秀生和横沟公社党委书记余传群的工作汇报。（横沟公社是原来的横沟区，下辖张公、窑嘴、贺胜、余花、孙田、横沟六个管理区。）听完汇报后，已是春雨绵绵。张省长打着雨伞，卷起裤脚，在王秀生、余传群同志的陪同下，深入到横沟公社孙田管理区检查夏收作物的田间管理。他们行走在泥泞的田埂上，边走边看，边问边议。张省长指着红金大畈麦田对王秀生等同志说：“这畈麦子不错。当前已进入春耕大忙季节，春争日，夏争时。要加强小麦的田间管理和春耕备耕工作，及时春播，力争夏粮丰收，以度春荒。”

吃饭要付油盐钱

1961年上半年的一天，张体学省长到咸宁县横沟

区横沟公社光明大队检查防汛抗旱情况。到了中午，陪同的咸宁县委书记王秀生要张省长到县里吃饭，横沟区区长罗发贵要省县领导到区里吃饭，而张省长说：“就到群众家吃。”光明大队第二生产队孙家湾的孙志煜家很卫生，人又热情，成份又好，社队干部就安排张省长到他家吃饭。孙志煜弄了八菜一汤，其中有一碗肉，一碗蛋。饭后，张省长问：“多少钱一餐？”县、区干部连忙说：“按上级规定，每人1角2分钱、半斤粮票。”张省长说：“这只得1角2分钱？除了米外，还有菜、油、盐，我看，至少要交两元。”这餐饭，张体学和他的秘书、司机3人共付了6元钱，县、区干部每人也付了2元钱。孙志煜执意不肯收，但张省长的态度很坚决，他只好收下。他说：“在我家吃饭的干部都是按规定交钱，从来没有一餐交两块钱的。”

这天下午，张体学省长在横沟区检查完后回县。为了招待他们一行，县招待所弄来两斤白米煮了饭。咸宁县委一位分管机关的领导提前到招待所看伙食，发现白米饭后说：“张省长最反对搞特殊，如果看到自己桌上是白米饭，其它餐桌上是沏米饭，他不但不吃，而且还要批评我们。”开饭后，张省长边吃沏米饭边问县领导：“你们平时吃的都是这种饭？”县委领导回答说：“是的。”那两斤白米已经煮熟成饭，不能拿去丢掉。当几位搞接待的同志和炊事员躲在食堂后面正在吃这白米饭时，张省长端着饭碗来到这里，幽默地对几位吃白米饭的同志说：“你们的饭好白啊，我们吃的这样的饭。你们晓得怎样

对付我张体学。”张体学这有口无心的玩笑话，既使吃白米饭的人很尴尬，也使县委领导难以为情。饭后，张体学省长叫秘书到招待所会计室，将这两天吃的分主食、副食、佐料、燃料等，一笔一笔算好，然后按人按餐分摊。他说：“我们公吃公摊，摊多少就交多少。我带头交，你们县委也不要讨这个好。”秘书报帐：“每人每餐两块一角钱。”张体学说：“我的天啊，像这样吃法怎么吃得起？得亏国家给我这么高的工资。”坐在一旁的县委领导又感到不好意思。

真的派人查水库

1962年春，横沟区横沟公社光明大队杨四塘水库被洪水冲垮，张体学省长在横沟区听到汇报后，亲自来到这个水库实地察看。他问陪同的横沟区区长罗发贵：“这冲垮了的堤什么时候能够修起来？”罗发贵区长稍微愣了一下，满有信心地说：“十天之内修起。”张省长问：“能不能保证？”罗发贵点头：“保证！”张省长高兴地说：“好！你们要利用当前的晴天抓紧修，以便蓄水。”张体学走后，横沟区组织劳力突击，只9天时间就修好了。第10天，曾随同张体学一起到横沟的秘书和省政府另外一位干部，在横沟桥火车站下火车后径直来到区公所。这位秘书对罗区长说：“张省长特地派我们来看杨四塘水库堤是否修好了。”罗发贵说：“修好了。”张体学的秘书说：“那就咱们一起去看看。”随即，他们三人一起步行到杨四塘水库。张体学的秘书看到十天前的垮堤焕

然一新，新堤不但比老堤高，而且更扎实，便高兴地对罗区长说：“你说到做到，很好。你的任务完成了，我们的任务也完成了。要是堤没修好，你不好交帐，我也不好办。我跟张省长说你的堤没修好，张省长就要批评你。不如实汇报，他就要批评我。水库堤修好了，你好我也好。”

偏往劣质茶园走

1972年春的一天，省长张体学带全省各地区的地委书记到咸宁县参观国营贺胜茶场和浮山公社茶场。此前，咸宁县委安排县委书记赵金印与农办主任周运忠一起负责接待，他们把茶叶长得茂盛的地方定为参观路线。

那天上午，赵金印、周运忠和国营贺胜茶场场长刘光耀一起在贺胜茶场门口等候。全省各地的地委书记先到贺胜茶场，他们参观后坐下来休息时，张体学才来。他不要赵金印、周运忠带路，不走赵金印等人原定的参观路线，偏偏要往茶叶长得最差的茶园经过。刘光耀场长连忙上前客气地对张体学说：“首长，请往这边走。”张体学却仍然按自己定的路线走。他在茶叶最不好的地方停下来，问刘光耀：“这片茶可能是你们茶场最差的茶吧？”刘光耀点头称是。张省长又说：“你要带我去看的地方茶叶肯定是长得最好的吧？”刘光耀又点头称是。张省长说：“要使长得差的长好，长得好的更好。”他一边参观茶场，一边向赵金印了解咸宁县的多种经营情

况。赵金印有问必答。接着，张体学来到浮山茶场。浮山茶场场长怕说他们没有“以粮为纲”，有点缩手缩脚。而张体学却肯定了这个茶场，并表示要在全省推广他们的经验。

不许县委“开后门”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粮食比较紧张。当时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大米要粮票供应。细米也可以吃，但不要粮票供应。少数家大口阔的干部由于供应的大米不够吃，就利用职权买细米，而且是质量比较好的细米。听说咸宁县个别干部“开后门”购买紧俏物资，张体学于1962年下半年的一天，亲自到咸宁县调查研究。在县委会议室，他亲自主持召开区委书记和部办委局负责人会议。会议一开始，张省长问在座的干部：“你们哪一位是粮食局长？”咸宁县粮食局长孙永章立即站起来，把眼镜取下，一边点头一边说：“我就是。”张体学接着问：“县委在你们那里‘开后门’买细米了吗？”孙永章吞吞吐吐地说：“没——没——没买。”张省长批评他：“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吞吞吐吐就说明有问题。”孙永章这时果断地说：“没有。”张省长说：“今后查出来就归你负责。”此后再也没有干部去“开后门”买细米了。张省长又问：“哪一位是商业局长？”商业局长谢有田站起来说：“是我。”“县委有没有人到你们那里‘开后门’买烟？”谢有田吸取孙永章开始回答的教训，十分干脆地说：“没有。”张体学严肃地说：“没有就好。希望你说的

不是假话。”接着，张体学站起来，边做手势边大声地说：“今后，不许县委‘开后门’。凡是在机关部门‘开后门’的，各部门都要大胆地揭发，我给你们当后台。如果有人打击报复，就找我张体学。”此后，咸宁县领导“开后门”的现象大大减少了。

(陈大银)

李振周（1920—2009） 山东临清县（今河北临西）人。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历任通山县委书记、湖北省统计局局长、省计委副主任、省劳动局局长、省计委顾问、省顾委委员。1984 年至 2004 年扎根大幕山义务造林 10100 亩。1999 年，被中共中央组织部评为“全国离休干部先进个人”。2001 年，被中共湖北省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扎根大幕山的“林农厅官”

1984 年 9 月，李振周进驻通山县大幕山，开始为期 20 年的义务植树造林。浩瀚大幕山，一棵棵大树成为他无言的丰碑！

厅官当林农

烈日下，大幕山林木葱郁繁茂。与 30 年前的荒山相比，已大不同。

当年，李振周进山，有人以为他是想捞一把。他与县政府签订了一份协议，都是讲他的义务：“我上山植树，一切生产生活资料自理，不要照顾，不要补助，造林成材后，一切归大幕山林场所有，不记名利，不要宣传。”

造林第一站，李振周选在柳杉湾。他划定 100 亩荒

山作为实验基地，这里位于海拔 800 余米高的山坡，荆棘丛生。不要说造林，就是年轻人上去走一圈都非常吃力。

一次，李振周不小心踩上松动的石块，滚落十几米。脸被划破了，手脚也被山石撞出血，他艰难地挪到路边，几个小时后，才被人发现。

为了节省时间，李振周搭起草棚，中午在棚里吃个馒头、打个盹，下午继续干活。那些年，他正月上山，年底下山，很少回武汉。

百亩计划完成后，1992 年，李振周又提出万亩计划，他担任指挥长，从勘察、规划、施工到采种、育苗、垦复、栽树，始终冲锋在前。他拿着一根长木棍，跑遍了所有山头，200 余万株树，每栽下一棵，他至少去看三次。

期间，李振周的妻子上山探望，见他双手布满老茧，耳朵鼻子都冻伤了，劝他回武汉休息，他坚决不肯。“战争年代，那么多战友牺牲了。我只有多做些事，才对得住他们。”2004 年，万亩造林计划完成。此时，李振周身体已多处不适。

自建小竹屋

“他作风纯粹，一尘不染。”

“他对自己要求严格，几乎苛刻。”

这是林场老职工对李振周的普遍印象。

大幕山里，至今保留着一间小竹屋，是李振周住过

的地方。屋里还有他用过的满是破洞的毛巾，以及一些锈迹斑斑的劳动工具。

当年，林场知道他是老领导，想安排他住宾馆。他坚决拒绝，自费 2600 元，请人帮忙建了这间竹房子。生活使用的桌椅、沙发、锅碗等，全是他从武汉背过去的。

竹屋每两三年得翻修一次，林场多次提出他们承担费用，李振周婉言拒绝。一次，趁他回武汉，场里将竹屋大修缮。李振周回来后，让经办人列出维修费用，打电话让老伴把钱汇到林场。

还有一次，大伙随他到县城看望住院职工。从医院出来，已临近中午，有人提出，找个小店吃个饭，李振周不同意：“一顿饭可以买不少树苗，克服下，就回去了。”等赶到林场，已是下午 2 点多，上食堂台阶时，李振周扑通一声瘫倒在地。场长孟祥合说：“李老呀，何必这么认真！”李振周说：“吃自己的饭，安心。”

长期跑基层

李振周身材笔挺，喜欢抿着嘴、绷着脸，话不多，严肃古板，是同事的共同记忆。

原省计委老同志回忆，李振周求真务实，是个实干家。“真就是真，假就是假”是李振周经常挂在嘴边的话。

哪怕一个很小的数据，李振周都反复核实。1961 年到 1963 年，他背着水壶，拿起草帽，到田间地头了

解农作物生长情况，详细记录农作物从播种、栽苗到收割的全过程。他研究制定“农产量调查法”，撰写《抽样调查与摸底》一书，引起较大反响。

一个初冬，他到一小煤窑调研，走到井口，脱了衣服，钻进矿井。黑漆漆的巷道令人窒息，借着微弱的矿灯，李振周与矿工攀谈。深入了解矿工劳动环境后，李振周在一次全省大会上动情地说：“必须加大力度改善工人生产条件，否则我们有罪啊！”

他上山造林后，一位记者报道了他义务植树的事迹，将他栽种的 100 亩写成了 120 亩，李振周非常生气，打电话到报社痛批浮夸。1999 年，省计委又先后五次派人上山，要拍事迹片，李振周均未答应。后来，省电视台上山拍了点劳动场面，播出后，李振周急忙向支部写检讨。

定下“三不准”

李振周的二女儿李小群，在战争年代，被父母寄养在老家。由于吃不饱饭，李小群患上软骨病。解放后，



2013 年，李振周先进事迹报告会

在洪山礼堂举行



李振周同志造林处

父母来接她，她已因骨折终身残疾。

李振周的儿子刘小洪（随母亲姓），20 多年前下海经商。当时，李振周给刘小洪定下“三不准”：不准打着自己的名号找关照；不准找他的战友、同事帮忙；商品不准推销计委系统所有单位。

李振周于 2009 年 1 月去世，他留下遗嘱：将自己的骨灰撒在他亲手栽种的树林中，不准立碑，不准堆坟头。按照李振周的遗愿，房子和积蓄全部给女儿李小群养老，如未用完再作为特殊党费上交。

（廖双河）



唐光友（1926—2020）湖北省丹江口市人。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阳新县人武部副部长，咸宁军分区后勤部副部长、咸宁军分区副司令员等职。被表彰为“雷锋式干部”“人民公仆、老兵楷模”“拥政爱民模范”“学雷锋标兵”“先进离休干部”，荣获独立功

勋荣誉章、全国一级星火奖章、湖北荆楚雷锋奖、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等。2019年国庆前夕，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倾尽一生报党恩

一心向党 不忘初心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咸宁市慈善会收到最特殊的一笔捐款，当属来自老党员唐光友的11800元。

这11800元是唐光友临终前的所有积蓄。其中10000元是工资，1800元是春节时市领导慰问的2000元，给了老伴100元，给了女儿100元，剩下的全部捐了。

2020年春节前后，唐光友的身体状况一直不佳，

处于半昏迷半清醒状态。尽管如此，老人仍对新冠肺炎疫情牵挂在心。2月16日晚，他一清醒过来便要出去捐款，被老伴拦住。

2月17日一早，老伴拿着11800元现金来到咸宁军分区干休所，工作人员赶紧用自己手机帮助办理了银行转账手续。病床上，唐光友看着电子转账单的截图，舒心地笑了。一周后，唐老安详离世。

早在1985年，唐光友就被查出患有食道癌，医生认为最多能活3年。哪知，他坚持锻炼，与癌症抗衡，30多年来除身体有些消瘦外，病情一直控制得很好，被誉为“抗癌司令”。

“请医学专家把我的遗体解剖进行研究，看对病症患者有没有作用。”2月23日晚，遵照唐老2012年就立下的遗愿，他的遗体捐赠给咸宁市红十字会供医学研究，成为目前我市年纪最大的遗体捐献人。

“唐老就是一位在物质生活上把自己压榨到最低点，却把奉献的能量释放到最高度的老党员。”咸宁干休所所长陈金龙说，老首长唐光友是在倾尽一生报党恩。

唐光友出生在佃农家庭，家有9口人，父亲和两个兄长惨遭兵匪杀害。历尽苦难的唐光友，直到1948年家乡解放后参了军，人生才看到曙光。

1949年3月，因作战勇敢，唐光友荣立二等功，被批准入党。那一刻，唐光友暗下决心：今后不管有多大的考验，都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1959年，襄阳发生水灾，时任湖北襄樊公安大队某中队中队长的唐光友，率先冲进咆哮的洪水抢救群

众，差点被洪水吞噬；1974年，时任咸宁军分区后勤部副部长的唐光友，带头冲进失火仓库去救火，肩部被倒塌的屋梁砸伤，险些丢了性命……

从襄阳到郧阳，到阳新，到咸宁，从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唐光友工作多次调动，每次危险面前都是冲锋在前，总是走一路好事做一路。他说：“我所做的，都是党章上写的。”

“他把‘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这句话抄在日记本上，也刻在了心里。”湖北省军区政治工作局主任黄明村说，几十年来，从一名年轻战士到军队领导干部，唐光友的初心从未改变。

一切为民 执着奉献

都说唐光友一辈子最听党的话，但他却“违背”了一次组织的决定。

2020年春节前夕，市委书记孟祥伟和咸宁军分区司令员来承坦前去看望唐老，得知医院都下了病危通知书，但他却坚持病情略有好转就出院，当即指示由市委和军分区联合下文，让唐光友服从组织安排住院治疗。

唐老收到《关于要求唐光友同志服从命令配合治疗的决定》时，正值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期，他坚定地拒绝：“现在医疗资源紧缺，患者这么多，把床位留给更需要的人。”

即使生命垂危，唐光友心里想的，还是他人。就这样，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违背”了组织的意

愿。

“回顾几十年的追求，我逐渐理解雷锋生为人民生、死为人民死的价值观……”唐光友的女儿唐建辉捧出父亲的日记说：“我们对父亲的举动，深表理解。”

春节前夕，尽管唐老已经病重，但他仍不忘困难儿童和群众。1月19日，他特地安排女儿唐建辉参加唐光友基金儿童服务站挂牌仪式，资助了6万元，并反复叮嘱一定要把基金用好。

“一生捐款240多次，仅离休后捐款就超110万元。”咸宁干休所政治协理员李磊列了一份唐光友捐款清单：

1981年，听说国家出现财政赤字，唐老拿出全部积蓄和给女儿办婚事的钱凑成1000元捐款。不料钱被退回，他就认购了1000元国库券，是当年咸宁个人认购国库券的第一人；

四川汶川地震、青海玉树地震分别捐款3000元，交特殊党费3000元；

新中国成立60周年交纳特殊党费1万元；

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召开前夕，分别捐款10万元，用于救助困难群众；

建党95周年，捐资30万元与驻地街道办事处一起设立“唐光友关爱救助基金”，帮助孤寡老人和困难儿童；

2019年国庆节，新中国成立70周年，捐款30万元用于扶贫攻坚

……

这些捐款的来源，是组织授予他的奖金，还有他的工资、津贴等。“没有那些钱，我冻不着、饿不着，但它却能改变其他人的命运。”唐光友总是这样解释。

唐光友从1958年当连队干部起，就开始接济五保户。1972年，他一调到咸宁军分区后勤部任副部长，就上门照顾驻地张家湾、陈家湾的五保老人，先后为7位孤寡老人养老送终。

自己有空就去帮忙挑水打柴，请医送药；吩咐女儿前去帮忙做家务，送蔬菜；逢年过节，送猪肉、送白糖、送鸡蛋……五保户的左邻右舍都说，“这比亲儿子还亲。”

在日记中，唐光友这样写道：“一个人活在世上，就要对党对社会对人民作贡献，这样才能感受到自我存在的价值。人不能都名扬天下，但奉献的快乐却可以为千万人所享受。”

一身清廉 善良纯粹

“六十年代当连长，家当一担挑；七十年代任军分区后勤部长，家当一板车；九十年代，家当也不足一卡车。现在，家里只有一台液晶电视算得上现代家电。”咸宁军分区《关于深入开展向唐光友同志学习的决定》中，如此描述。

走进唐光友的家，会发现这个描述毫不夸张。小餐桌是上世纪60年代自己手工打造的，破旧的藤椅加了块垫子继续用，冰箱是儿子淘汰下来的，老式的棕绷床

窄小的床头已经磨光，唐老用过的老花镜腿上绑满了布条……

“前年，家里的电扇坏了，我看不过去，给家里装了空调，可父亲总舍不得用。”女儿唐建辉说，父亲一生节俭，常年穿的是旧军装，不让母亲添置衣物，儿女买的新衣服试试就又放回箱子。

有一年，3个受他资助的贫困生分别考上了清华大学、厦门大学和武汉大学，他们特意和父母一起前来向唐光友报喜。当看到老两口就着咸菜吃馒头后，他们不禁泪流满面。

唐光友历任战士、公安队副队长、队长、副大队长，独立营副营长，阳新县人武部副部长，咸宁军分区后勤部副部长，咸宁军分区副司令员。但他的家人从没沾过“一点光”。

唐光友与家人约法三章：私事不准用公车；用药不准超标准；生活上不准向组织提任何要求。

大儿子唐建国从部队退役，被父亲“推荐”去当铁路检修工；二儿子唐建江高中毕业，被父亲动员去新疆支边；小儿子唐建海退役回乡，在保险公司干外勤，不幸因车祸去世。女儿唐建辉则在知青下乡两年后招工到咸宁机械厂当工人，下岗后四处打工补贴家用。

当年，唐老查出患有食道癌时，组织提出让他去武汉休养，把女儿调到身边照顾。他坚决反对：“不能因为我是模范就搞特殊。武汉不去，女儿不调。”

唐光友任咸宁军分区后勤部副部长时，到当时的武昌县英雄大队蹲点一年多。群众关心他的吃住，全被婉

言谢绝。群众把鸡蛋放在他碗底，一经发现立即给住户孩子吃。

咸宁市社会福利院院长张开平曾在干休所当了四年司机班班长，但他没有给唐老出过一次车。“按照他的级别，完全可以派车，但他怕费油，坚持‘能给国家省一分是一分’，出门都是步行。”

“我当福利院院长不久，唐老拉着一大车印花被子来了，福利院 30 多位老人，一人一床。可唐老自己盖的被子，还打着补丁……”提到唐光友，张开平默默地抹眼泪。

唐光友一生简朴，对公对己从不乱花一分钱。有一次，他带一名干部出差，回来后会计报销 12 元出差补助。他坚持退款，会计不好处理。他才变通办法买了“毛主席著作”送给驻地附近的民兵。

“钱是身外之物，我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应该公来公去，全部用到党的事业上……”正如唐光友同志生前在每次报告中所讲，要像雷锋一样，在工作上要向积极性最高的同志看齐，在生活上要向水平最低的同志看齐。

(王莉敏、李磊、赵莎)



胡 海（1930—1989） 通城县石南镇人。195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中国工商银行通城县支行正行级调研员。因长期带病工作，积劳成疾，1989 年 11 月 14 日，心脏病突发，倒在岗位上，以身殉职。

159

严于律己的金融战士

胡

海

严于律己的金融战士

凡与胡海同志接触过的人对胡海有一个共同的评价，就是：“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

胡海因工作需要常到企业转，即使超过开饭时间，也不吃饭。他不到其他单位买便宜货，即使老父亲长住在他这里，也不找粮食部门买 1 斤平价粮。

1978 年，胡海在杨泗庙工地任副指挥长，因接待中央和省里的同志，他派人去买 20 个开水瓶。那时物资不丰富，开着汽车跑了几公里才买齐，在运输途中不小心碰破了一个瓶胆。事后后勤组的一个同志见胡海没有开水瓶，就把这个开水瓶外壳给他，让他配个瓶胆凑合着用。他非常感谢，自己配了个瓶胆，但是一定要照价付外壳钱，不管你怎么坚持不收，他硬是按开水瓶价格减去瓶胆价补齐了外壳价 2 元 8 角钱。

胡海坚持信贷原则，该贷的则贷，不该贷的坚决不贷，从不以权谋私，以贷谋利。他自立了一个规矩：凡

是上门找他贷款的，提包带裹者不得入门；送物送礼者什么时候拿走礼物，就什么时候视情况给你办手续。有人趁他不备在家送礼的，他亲自退还，无法查清送礼的人，就交给单位处理。

1989年正月初七。县通用机械厂一位业务员为了感谢胡行长多年对厂里的关心和支持，自己买了点水果点心想表表心意，胡海硬是不准进门，后来还是他老伴打弯说：正月开初，新年新岁，拒人于门外不好，你先请他进来，把东西让他带回就是。那位同志坐了一会，在胡海坚持下，只好原物带回。

胡海对子女和亲戚朋友更是要求严格。

1979年2月，儿子胡建勇上了越南前线。胡海写信给儿子说：“你要在前线英勇杀敌，绝不能当逃兵，给家乡父老丢脸，要以实际行动争取火线入党。”

大女儿胡建潮有一次到烟草局办理烟草准卖证，不知是谁，用她的名义批了两条香烟。胡海把她找来，严厉责问，女儿解释没有这回事。他不放心，直到女儿流着眼泪说“请您相信您的女儿，是不会骗您的”，他才放了心。

胡建潮有一次托人为其表兄贷了600元的款。下班后胡海知道了说：“这不符合原则，你要给我追回来，而且现在就去。”建潮拗不过父亲，只好骑车往返十几里，连夜把这笔款子追回来，胡海又担心女儿，女儿前脚走他又后脚去接。

当时，住房实行单位分配制度。胡海家住房是三室一厅，因老父亲长住在一起需一间，儿子在部队回来结

婚用一间。胡海夫妻要一间。已长成大人的小女儿建明就没地方住了。于是把她安顿在家中堆放杂物的阁楼上，一住就是五个春秋，直到建明结婚“出阁”，才结束这段阁楼生活。建明曾对父亲说：“我到银行工作五六年，也算一个老职工了，人家比我后来几年都分了房子，我为什么不能分到住房。”胡海对他说：“孩子现在行里房子紧张，你要理解，不是你不该分房子，而正因为你是我的女儿，你就要支持爸爸的工作，为行里分忧。再说我家已有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住得挤是家里的实际情况造成的，我们不应该再向组织伸手要房子了。”

胡海同志对自己和对子女严格要求，对亲友也不含糊。1984年，他家乡土垌村想找他贷3000元的款经营小卖部，他耐心解释那不是工商银行贷款的范围，又热情地介绍他们到当地农行营业所和信用社去联系。凡是他的亲友要贷款，他是瓜田李下，各避嫌疑，该贷的按程序找组织，不该贷的谁说情也无用。

胡海同志情操高尚，心怀坦白，在荣誉和职务上不向组织伸手，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他任副行长长达24年之久，前后经历7任正行长。他对每一任行长，不论资历深浅，年龄大小，都服从领导，甘当配角，积极主动搞好一班人的团结，共同做好工作。

1990年7月16日，中共咸宁地委、咸宁地区行署作出《关于在全区开展向优秀共产党员、忠诚的金融战士胡海同志学习的决定》，要求在全区广泛深入地开展向胡海同志学习的活动。学习他立场坚定，在思想上和

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政治觉悟，学习他四十年如一日，忠于党的金融事业，勤勤恳恳、默默工作的奉献精神，学习他立党为公、清正廉明的高尚情操，学习他不计名利、顾全大局、团结同志的磊落情怀。

(冯立群)

孙荣归（1954—2005） 崇阳县白霓镇歇马山村人。先后担任县机械厂财务科长、副厂长、厂长，县工业局副局长，安监局纪委书记兼工会主任等职。

甘于奉献传佳话

孙荣归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上个世纪 80 年代，他在县机械厂从事财务工作时就以勤学苦钻成为有名的“铁算盘”，厂里因此成了全县首批会计达标企业和财务管理先进单位。由于工作出色，1991 年，孙荣归被提拔为厂长兼党支部书记。组织的信任，成为他忘我工作的动力。他强化管理，勇于开拓，企业很快红红火火，成为县里的四大纳税大户之一，工人们脸上挂满了笑容。机械厂连续三年被县委、县政府授予“先进单位”、“优秀企业”称号。他也多次被县委县政府评为“劳动模范”、“优秀企业家”。1993 年 10 月，他被提升为县工业局副局长。

90 年代中期，由于市场原因，机械厂生产经营一下跌入低谷，组织上考虑再次推选孙荣归出任厂长。

“老孙啊，你放着清闲的副局长不干，降格去冒这个险，是哪根神经在发烧啊？”……

一时间，风言风语铺天盖地。开始，孙荣归有些犹豫，后来他想到自己曾是这个红火企业的厂长，想起那些曾经与他并肩战斗的同事们，现在遇到了困难，组织

上信任他，职工们看着他，要是推托，怎么过意得去？

孙荣归说：“人嘛，能上就能下。”于是他走马上任了。

孙荣归在机械厂当厂长期间，厂里有七辆货车一辆小车，他家从化肥厂搬到城里，却租用几辆板车拉家具。一次，他父亲病了，夫妇俩用板车将老人从白霓拉到县里来治疗，不巧在路上被厂里一位老工人看到了，问他：“老孙呀，你一厂之长，用一下厂里的车要啥紧，哪个没有三短两急的，何必吃这个苦？”孙荣归摆摆手。

他妻子的厂里发五包化肥抵工资，孙荣归和妻子用板车拉回家。路上又有熟人笑他。孙荣归说：“是我爱人抵工资的化肥，又不是厂里的，怎么好意思用厂里的车去拉呢？”那人叹了口气：“老孙，你是死脑筋！”

1998年5月，孙荣归再次“降格”下派到八一煤矿任副矿长。那期间，他在矿山一住就是几个星期。短短4个月，就使矿里的财务管理走上规范轨道。“我是去搞事，不是去赴宴，哪能挑肥拣瘦呢？……”人家问他时，老孙就这句话。

孙荣归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管得住自己。机械厂修建新车间，一建筑老板洽谈基建项目，将一块价值2万多元的金表送到他家，他当即把他轰了出去：“你走吧，我不跟你谈这事了！要搞只能按规矩招标。”事后这位老板感慨：“搞建筑这么多年，像这样的领导实在少见，老孙是个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人！”

孙荣归的爱人下岗多年又体弱多病，两个孩子都在上学，生活非常艰难。和他一起共事的人都知道，孙荣

归给自己牢牢套着一个紧箍咒。1996年，县委三级干部大会表彰有重大贡献的企业法人，奖励他一万元钱，他分文不动上交财务室。当时职工和亲属想不通，说：“这明明是政府奖给你个人的钱啊！”老孙说：“功劳大家都有份，我怎么能一个人塞了腰包呢？”

孙荣归是个朴实的汉子，他总是理解别人的难处。单位职工家有什么红白喜事，他第一个带头串串门，送个人情。可他的孩子考上了大学时却不请客。有人劝他，他说：“人家子女都在为钱闹慌哩！我哪好意思请啊？”

说到孙荣归，职工田卫国眼泪总是忍不住。在机械厂任厂长时，老孙想方设法筹措了几十万元钱，做了一幢宿舍楼。厂内按政策分给他一套，他坚持要把房子让给缺房户。职工们感动不已，趁他出差之际，自发把他的家具搬进了新房。谁知，一向温和的孙荣归回来后大发脾气，硬是退了出来。

在他去世后，人们才知道，担任多年厂长、掌管年进出资金数千万元的他，一生没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住的是水泥砖砌的未装修的房子，吃的是摇井水，睡的是硬板床，骑的是自行车，看的是黑白电视机。去世前，他家没安装电话，他更没用过手机……

“我没有什么贡献和作为，却跟单位上添了这么多麻烦……”

从2002年至他去世，孙荣归连续三年担任县安监局驻港口乡小沙坪村“三保三落实”工作组组长。这期间他象个地道的农民，在公路建设大会战中，挑土，抬

石，与群众一起挥汗奋战了两个多月，修了4座水泥桥、10多公里的村级公路。

有一年早稻成熟前期，稻飞虱肆虐，他带领群众一连20多个日夜劳作在田间地头。特困户张百龙家无劳力，缺农药和机具，他既送药，又帮他打药，不畏高温酷暑，反复数次，终于保住了张的庄稼。这期间，他身感严重不适，腹部剧烈疼痛，有时眼冒金花，虚汗直淌，人家劝他休息，他说：“这是老毛病，不碍事的……”在他的带领下，该村120多亩水田全部插上晚稻并喜获丰收，可孙荣归倒在了病榻上，而这一倒下就再也没有能起来……

孙荣归病重后，尽量不找单位的麻烦。他说单位很困难，下岗职工多，工资都发不出，怎么能提过分要求？从崇阳转院至温泉，再转到武汉，都是自己搭车转院。单位多次要派车，他都拒绝。时任安监局局长丁坚行说到孙荣归用车的件件往事，不禁失声痛哭。孙荣归的女儿考上了大学，局里安排了小车送他们父女俩去武汉。孙荣归说：“不麻烦了，搭车也蛮方便的。”当司机清晨开车去接他们时，他果真半夜里带着女儿搭班车走了。还有一次，他妻子去看望在武汉上大学的女儿，坐上了局里的小车，孙荣归把她从座位上赶了下来：“去武汉的领导多，坐不下，你还是搭班车去吧！”其实不是坐不下，他是不想让公事私事掺和到一起，让别人说“闲话”……

当他知道自己已是肝癌晚期后，说什么也不在医院呆下去了。他对曾来看望他的领导说：“我得这个病，拖

累了大家。不要治了，为我再花钱，已没有任何意义了！”领导和亲属不听他的，他就绝食以对。三个月过去，他骨瘦如柴，时常痛得在病床上翻滚，额上渗出豆大的汗珠。

一天，孙荣归预感自己不行了，他把妻子喊到身边说：“我这一辈子没给你和孩子们留下什么，对不住了。你要孩子们好好学习，走好自己的路，将来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还有，你一定要替我转告组织，我没有什么贡献和作为，却跟单位上添了这么多麻烦……”2005年1月3日，他怀着对事业的无限眷恋和对家人的愧疚之情，永远离开了人世，将廉洁奉公、甘于奉献的精神永远留了下来。

(苏浩武)

红心胜白银

1931年，鄂南正处于国民党围剿革命根据地的困难时期，缺医少药、弹药也不足，各革命根据地都急需粮饷以解燃眉之急。恰在此时，蒲圻农军和活跃在蒲圻的鄂南警卫营在小柏一带打土豪，获得一大批宝贵的银元，共计一万四千四百余元。在当时这可是一笔实实在在的大财富。面对从未见过这么多银元的警卫营战士和农会的农民兄弟，真是“开眼”了，也犯难了，怎么保护好和处理这么多数量的银元，一时还真不好办，因为太多，拿不动，带不走，无处存，当时的汤农咀农会主席想到一个法子，将在蒲圻随处可见的楠竹砍来几根，将银元放入竹筒内，寻一僻静之处沉入湖中，并做好标记，再行请示上级处置。

当时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围剿红军的困难时期，银元这种硬通货正是红军所急需的。时任蒲圻中心县委书记的高飞随即命令马本立、徐志椿两人：率领鄂南警卫营手枪队，设法将这些银元安全送到湘鄂赣省苏维埃！

马、徐两人接受任务后，围绕如何安全送往省苏的问题开展了讨论。从蒲圻小柏到省苏所在地江西万载，关山阻隔，路途遥远，土匪出没，白军袭扰，如果请脚力搬运，护送的人少了不安全；护送的人多了，目标太

大，也不安全。马本立、徐志椿两人反复商量，决定给48名手枪队员每人发4升炒面，各带三百银元，放在一个长布筒里，缠在腰上，奔向万载，这样一来行动便捷，机动性强，并且银元分散在48人身上，纵使出现意外，也可将损失降到最低。拿定主意后，他们从湖水中捞起装有银元的竹筒，将银元按数一一发给众人装好。一路上手枪队员昼伏夜行，白天躲在山上吃炒面、喝泉水，晚上沿着山边赶路，整整走了5天5夜，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一万四千四百多块银元一块不少，安全送到江西万载，受到了省苏的表扬。



中共蒲圻中心县委金盆王家驻地遗址

这次行动虽然没有激烈的战斗，但警卫营战士和农会会员体现出来的组织自觉、纪律自觉、坦荡情怀无不让人动容。他们无私无畏，在如此之巨的真金白银面前丝毫不为所动，自己拿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这些钱财，在漫长的转运过程中，没有一个人动过一块银元；他们不畏艰难，啃了几天的干炒面，喝了几天的生凉水，昼伏

夜行，硬是一块不少地完成送钱的任务；他们信念坚定，在白花花的银元面前，他们心中那跳动的红心是那么强劲，他们那崇高的理想信念和高尚的情操，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铭记。

(赤壁市史志研究中心)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1944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南征。1945年1月，由王震、王首道领导的八路军南下支队，与李先念、郑位三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在鄂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大悟山会师后向南进发。为了保证南下支队胜利渡江，新四军部队决定派张体学率领十四旅四十团和四十一团配合南下支队，挺进鄂南，建立敌后根据地。

当时，由于崇阳高枧、大源、金塘一带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日军无法直接入侵，这些地方成为国民党鄂南行署和崇阳县政府的临时驻地。1945年3月6日凌晨，八路军南下支队和新四军十四旅先头部队到达崇阳金塘，在击败国民党驻军之后，大部队兵分两路，直捣国民党时驻大源鄂南行政专署和高枧崇阳县政府，抓获行政专员龚薰南、鄂南银行专员李经世和崇阳县县长李揆廷及其他大小官员300多人。我军以抗日大局为重，对所有被俘官员以礼相待，经过政治教育后全部予以释放。

八路军南下支队和新四军十四旅所到之处，用写标语、贴布告等形式大力宣传抗日主张。在崇阳县博物馆至今还留存着一块当时写在木板上的标语——“新四军是老百姓的军队，不抽丁，不派款，不拿人民一针一



召开抗日宣传群众大会

线”。3月8日，部队在大源林家大屋门前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抗日的主张，大源群众、地方绅士和国民党官员参加了大会。王震和张体学在会上讲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是抗日的队伍，是劳苦大众的子弟兵，是爱国爱民的；八路军、新四军来这里打日本鬼子的，他们很快就要完蛋了。”与会群众喜形于色，会场不断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被俘的龚薰南、李经世、李揆廷也在大会上发了言。李经世说：“有了共产党，抗日有希望，中国有希望。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了不起，我今天才真正认识到。”

南下支队和新四军十四旅旅部驻扎在大源林家老铺，张体学住在老铺对面吴家湾。阳春三月，正是犁耙水响的季节，可田畈上却看不见农民忙春耕。张体学安排警卫员找来几个在家的老婆婆一起座谈，了解情况。座谈中，张体学向一位年纪稍大的老婆婆轻声问：“老婆婆，春耕正忙的季节，你们的人都哪里去了呢？”老婆



不要踏麦苗

婆想了想说：“外出挑脚、帮工换盐吃去了。”张体学说：“现在日本鬼子封锁我们，油盐、日用百货都运不进来，等我们消灭了日本鬼子，情况都会好起来的。”另一位婆婆听到打日本鬼子，激动地说：“打日本鬼子好啊。听这里的保甲长说，打日本靠国军，你们是什么兵哪？”张体学说：“我们是毛主席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现在跟国民党的兵合在一起打鬼子。”“啊！难怪你们把专员都放了，原来是为了一条心打日本呀！”张体学说：“是呀！”那位婆婆又问：“毛主席的兵，是不是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朱、毛的兵呀！”张体学回答：“是的啊！我们就是早几年的红军！”一位婆婆松了口气，感叹道：“哎！只怪我们山里人见识短，一听见来了兵就怕得不得了，怕拉丁，明天把男人都叫回来，再不挑脚了。”张体学说：“是的，要迅速回来，安心种田，莫误了农

时。”第二天，人们果然都回家了，热热闹闹的春耕开始了。

八路军南下支队和新四军十四旅不但在舆论上对国民党的反动宣传造成强大的政治攻势，更重要的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博得了人民群众的无比爱戴。他们纪律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买东西都是按时价付款。部队战士除了擦枪、打草鞋、补衣服和学习文化、政治以及军事操练外，每天都安排一定的时间，主动上门帮助群众干活，打柴、碾米、挑水、挑粪、种地、抱小孩子，什么事都干。部队要转移，先要将老百姓的水缸挑满，借用的东西还得一清二楚，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连场外拴马处的马粪也挑到田里。部队关心群众的疾苦，哪怕指战员挨冻受饿，也要想方设法救济特困群众。贫苦农民杨天升的妹妹病亡时，家里无米下锅，首长看在眼里，痛在心上，马上叫炊事员给杨家送去大米2斗5升；杨天升的祖母病在床上，炊事员天天给她送饭。

从这些小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当年人民子弟兵是如何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可以说，这些革命先辈的群众工作经验在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深刻认识到，我们开展工作一定要依靠群众、组织发动群众、服务群众，这是当年我们革命能够取得成功的法宝，在今天依然是我们做好各项工作的前提。

在南下支队和新四军十四旅的支持下，崇阳及边界地区党政军的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建立了崇（阳）通（城）通（山）县抗日民主政府，领导崇阳、通山、通

城三县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不久后，因情况有变，部队决定只留张体学率领鄂东武装在鄂南坚持活动，南下支队继续挥戈南下。经请示部队首长，政府干部随军转移，崇通通县抗日民主政府即自行撤销。此后，4至6月，南下支队多次往返鄂南，重创了崇阳境内日伪军。八路军和新四军虽然停驻崇阳的时间较短，但沉重打击了境内日伪顽势力，极大鼓舞了崇阳人民的抗战士气。

(崇阳县史志研究中心)